

春天小语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回归自然，你将感受到：早春的惊喜，“桃花嫣然出篱笑，似开未开最有情”；仲春的兴奋，“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暮春的惋惜，“东风不惜残桃李，吹作春愁处处飞”。

春天是开始，“春为一岁首，梅占百花魁”；春天是萌动，“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春天是希望，“一日之际在于晨，一年之际在于春”；春天是美好，“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春风是想象，“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春晖是母爱，“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春心是相思，“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春华是绚烂，“春玩其华，秋登其实”。

在歌咏春天而又脍炙人口的小诗中有苏轼的题画诗《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这是一幅怎样的情景呢？

三两枝桃花在竹笋的憧憬中摇荡、在竹叶的激动里弥漫、在竹梢的袅娜间四溢，冲淡竹的荫蔽、冲破竹的群落、冲出竹的“杏墙”，在竹笼外、在江水边、在暖风里像美丽的少女一样招展、触目、惊心。

落日的余晖浸染着江水的褶皱、沐浴着鸭子的嬉戏、感应着温暖的意绪，春天的江水也感知着情调的温馨、感觉着鸭子的敏锐、感受着勃勃的生机，群鸭在江边的水面上急速地游动、敏捷地倒立、顽皮地追逐、张狂地戏耍，啄食蒌蒿满地的晚景、争啖芦苇嫩芽的诗意、渲染“河豚欲上”的情趣。

芦苇的嫩芽、蒌蒿的绿丛、菘菜的远影蔓延、点缀、衬托出三两丛竹的风姿、韵味、气节。江岸萌动的生机与活力引领着河豚成群结队的梦想、人们垂涎三尺的梦寐和惠崇冰山一角的意蕴。

在这充满希望的春天，我们迎来了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30周年，我们迎来了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刊《苏轼研究》创刊5周年，我们迎来了东坡文化发展的春天！大笑！跳跃！欢呼！奔跑！癫狂！都不足以表达我们的情感。

苏轼

研究 SUSHIYANJIU

2010年第1期（总第20期）



目 录

- 编辑出版：《苏轼研究》编辑部
- 主办单位：中国苏轼研究学会
- 协办单位：四川省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
四川省眉山三苏祠博物馆
四川省三苏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 主 编：张志烈
- 执行主编：周成仕
- 副 主 编：宋明刚 蔡心华
- 责任编辑：刘清泉
- 特邀编辑：孙开中
- 编 辑：唐雅兰

地址：四川省眉山市东坡金城三苏纪念馆三楼
邮编：620010 电话：(028) 38299092

Http://www.3sw.com

E-mail:sushiyanjiu@163.com

准印证：四川省连续性内部资料出版物
准印证第 03—006 号

设计：上观设计

印刷：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0年3月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苏学论坛

- 关于苏轼、苏辙读书的天庆观 孔凡礼/4
- 乱弹三章 赖正和/5
- 《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版本考 李咏梅/9
- 论苏轼的批判创新精神 王启鹏/12
- 青松与丝苓(上) 陈慧君/22
- 苏轼与其门生的师友情
- 未尝一念忘此心(上) 王琳祥/27
- 解读苏东坡的道家情结
- 寻找东坡 张龙飞/31
- 三苏遗迹考略一二 乔建功/34
- 竹外桃花三两枝——苏东坡与桃花 刘清泉/39
- 苏东坡与黄州梅花 冯 扬/41
- 苏轼：月亮人生 赵 军/43
- 苏轼重阳诗词悲秋主题初探 袁心澜/46
- 丑怪显坚美，萧淡寓涌动 徐晓洪/49
- 苏轼枯木情结探微
- 苏轼与青神陈公弼父子情缘 吴梁红/55

□顾问：蒋仁富 李 静 苏 灿
（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兴荣 孔凡礼 王水照
刘乃昌 朱靖华 刘尚荣
邱俊鹏 周先慎 曾枣庄

□编委：（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影聪 王晋川 方永江
刘川眉 孙开中 苏 灿
陈 弼 李显平 宋明刚
何家治 张志烈 张忠全
杨胜宽 杨常沙 周成仕
周裕锴 蔡心华

□诗文鉴赏

《寄黎眉州》鉴赏三题 山流水/56

□新书序评

《天涯守望——苏东坡晚年的海南岁月》前言 阮忠/58

□苏学专家

无冕学者，苏学大家 石钟扬/60

——孔凡礼苏学研究概述

海外苏学专家剪影 徐 丽/65

——第九届苏轼学术研讨会侧记

□研究史话

日本苏轼研究述略(二) 池泽兹子/68

□景苏札记

苏东坡的政治人生(四) 雷金贵/70

□本期关注

我与“苏学” 王文龙/75

——《苏轼研究论稿》后记

从眉山东坡到蓬安相如 金生杨/78

□苏学动态

儋州市东坡文化研究会成立 韩 子/80

民办馆会，情聚从化 流 水/80

——纪念苏东坡诞辰 973 年活动

关于苏轼、苏辙读书的天庆观

孔凡礼

内容提要：针对赖正和先生关于天庆观的论述，以地方志中“建天庆观的诏令”和建康、吴兴、临安、四明、吴郡、会稽建天庆观的位置，以及苏轼文集里的语句，推断眉州天庆观在眉州城内。

关键词：天庆观 诏令 地方志 苏轼文集

《苏轼研究》2009年第3期刊登的赖正和先生的《也探三苏故居》一文，论证深入，很受启迪。但是，他的关于天庆观的论述，我却有一些不同看法。

宋真宗有大中祥符年号，是因为所谓“天书”降而改定的。《宋大诏令集》卷二有《改大中祥符元年赦》（正月戊辰）。

大中祥符二年（1009）十月十四日，诏令天下建立天庆观，《嘉泰会稽志》卷七引了诏书文字：

朕以亲崇至道，诞为元符。率土溥天，期福祥之咸被；灵坛仙馆，俾兴作以攸宜。庶昭清静之风，永洽淳燕之化。式营仙馆，以介民禧。宜令州、府、军、闾县择地，并建道观一所，并以天庆为观。

这就是说，天庆观的“天庆”，其意为：因为“天书”降，让天下人共同来庆祝，享受天赐福祉。这里，说明了两个问题。

第一，这里明白记载了天庆观建立的时间，正好与苏洵同岁，不过苏洵大一点。赖先生说“天庆观很可能就是坐落在三峰山中的古刹三峰寺”，“三峰寺或者很早以前就叫天庆观，或者由道士占有后改叫天庆观，都是很可能的”。我以为恐怕不大可能。

第二，既然是朝廷十分严肃地发布诏书，自然不可以用佛教的寺庙来替应。要替应，也需要道教的宫、观。如《嘉泰吴兴志》卷六就说湖州的的天庆观，乃以“梁大同二年（536）建旧名玄风观为之”。

那么，眉州的天庆观在什么地方？是城内，还

是在乡下？

《景定建康志》卷四十五说天庆观在建康（南京）府治西北。

《嘉泰吴兴志》卷六说吴兴（湖州）的天庆观在子城一百五十步。

《咸淳临安志》卷七十五说临安（杭州）的天庆观在宰执府。

《宝庆四明志》卷十一说四明（明州、宁波）的天庆观在子城东南一里。

《吴郡志》卷三十一说吴郡（姑苏、苏州）的天庆观在长洲县西南。长洲乃苏州的附郭县。如果说“县西南”是指县城，那就是苏州城内，如果是说县境，那离苏州城也不会很远。

《嘉泰会稽志》卷七说会稽（越州、绍兴）的天庆观府东南五里一百二十步，隶会稽（绍兴府的附郭县之一，另一县是山阴县）。

以上六例，其中建康、吴兴、临安、四明的天庆观，是在州城或府城内。吴郡、会稽的天庆观，虽不在州城或府城内，但离州城或府城不远。

根据以上情况，可以认为眉州的天庆观当在州城内，因为州城内人口比较集中，便于传达朝廷德音，以共享福祉。天庆观与寺庙不同，寺庙可以建在山中灵秀清静之地，有利于佛教徒修养，而天庆观则不然。天庆观建在山中，就失去意义。

还有，吴郡和会稽的天庆观，虽说是近郊，但吴郡、会稽之为州比眉州大，而且生产与人文两个方面素称发达，近郊一样可以迅速得到朝廷德音。

我还想到了《苏轼文集》卷十《范文正公文集序》：

庆历三年（1043），轼始总角入乡校，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人石守道所作《庆历圣德颂》示乡先生。

（下转8页）

乱弹三章

赖正和

内容提要: 读邵玉健、包立本《东坡常州奇缘》、沈亦泉《谈谈苏东坡的三位夫人》和苏肇平主编的《眉山堂苏氏世家》发现瑕疵，缀笔成文，文字严谨，启人心智，“乱弹”不乱谈。

关键词: 读书 疑问 研讨

题记：近来读书，发现一些值得研讨的问题。今择三题，写在下面。

苏东坡当过“常州团练副使”吗？

熟悉苏东坡经历的人都知道，苏东坡一生曾经三次被任命为“团练副使”。

第一次是在宋神宗元丰二年(1080)，苏东坡经过“乌台诗案”的“锻打”后，被“责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第二次是在元丰七年(1084)上半年，神宗手诏将苏东坡“量移”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第三次是在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四月，宋徽宗(其时哲宗已死)以生皇子恩“诏授”苏东坡“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居住”。

今年九月，在徐州参加全国第16届苏轼学术研讨会会有幸得到一册《东坡常州奇缘》^①。该书第六节《常州官职》称：元祐三年(1088)四月，苏东坡在翰林院值夜班，太皇太后问他“前年任何官职”，他回答说“常州团练副使”。该书据此认为苏东坡当过“常州团练副使”，并说好些书中有此记载。

查《宋史》本传，确有相同记载：“轼尝锁宿禁中，召入对便殿，宣仁后问曰：‘卿前年为何官？’曰：‘臣为常州团练副使。’”林语堂《苏东坡传》

第十九章《太后恩宠》亦说，太后“突然问道：‘你前年任什么官？’苏东坡答道：‘常州团练副使。’”能否由此认定苏东坡确实当过“常州团练副使”呢？

我认为还不能。因为其他好些书上有不同的记载。

是夕，苏轼对于内东门小殿，既承旨，……太皇太后曰：“有一事欲问内翰，前年任何官职？”轼曰：“汝州团练副使。”——李焘著《续资治通鉴长编》

四月，入对东门小殿……太皇太后忽宣谕曰：“内翰前年任何官职？”先生曰：“汝州团练副使。”——施宿编撰的《东坡先生年谱》

这天晚上，苏轼在内东门小殿答话……太皇太后急切地问：“爱卿前年做的是什么官？”苏轼说：“臣前年做的是汝州团练副使。”——《续资治通鉴》^②

苏东坡跟太皇太后的一问一答，各书竟有这么两种不同的记载。

我把各书成书的时间排列如下：

南宋史学家李焘生于北宋徽宗政和年间，他用40年时间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当在南宋前期成书；

施宿生活在南宋中期，他编撰的《东坡先生年谱》是在宋宁宗嘉定六年(1214)刊印的，比《续资治通鉴长编》晚出几十年。

《宋史》是元代脱脱、阿鲁图先后领衔，欧阳玄、张起岩等人于元顺帝至正三年至五年(1343—1345)总裁编撰而成的。因卷帙浩繁(共有496卷)、成书仓促(只用了3年时间)，在资料剪裁、史实考订等方面讹舛颇多。

《续资治通鉴》是清乾隆末年，毕沅组织门客历时20年编撰而成的，于嘉庆六年(1801)全部刊印；

林语堂《苏东坡传》成书于上世纪中叶，1947年出版。

通过上面的排列可以看出：《续资治通鉴长编》成书最早，后来的施宿《东坡先生年谱》和《续资治通鉴》的记载与之一致；讹舛颇多的《宋史》成书比《续资治通鉴长编》大约晚150年，林语堂采用了它的记载。

不过，这还不能最终判定哪种说法符合历史真实。

最早记载苏东坡跟太皇太后这次对话的，是王巩的《随手杂录》。它记载道：“子瞻为学士。一日锁院，召至内东门小殿。……宣仁曰：‘有一事要问内翰，前年任何官职？’子瞻曰：‘汝州团练副使。’……”

王巩何许人也？苏东坡曾对皇上说：“巩与臣世旧，幼小相知，从臣为学。”可见他与苏东坡关系密切，非常亲近。苏东坡曾经向朝廷举荐过他，并因此遭到台谏官的攻击，而上了《辨举王巩札子》。他在记录苏东坡跟太皇太后的对话后写道：“子瞻亲语余知此。”可见，他记录的内容并非转述他人所记，而是直接来自苏东坡之口的第一手资料，是完全可靠可信的！

可以说，自李焘始，凡是记载这次对话的作者都是从王巩那儿转述过来的。不过，有的如实转述了，有的则走了样。

如果这还不足以说服人，就再看看苏东坡自己怎样说吧！

苏东坡在量移汝州途至泗州上《乞常州居住表》说：“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但以禄廩久空，衣食不继。累重道远，不免舟行。自离黄州，风涛惊恐，举家重病，一子丧亡。今虽已至泗州，而资用罄竭，去汝尚远，难于陆行。无屋可居，无田可食，二十余口，不知所归，饥寒之忧，近在朝夕。……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饘粥，欲望圣慈，许于常州居住。”苏东坡向皇帝叫穷叫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求皇帝允许他去常州居住。苏辙撰写的《东坡先生墓志铭》说：苏东坡“上书自言有饥寒之忧，有田在常，愿得居之。书朝入，夕报可。”由此看来，皇帝很快就批准了他居住常州的请求。他到了常州，一连上了两首谢表，两表皆说：“先蒙恩授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寻上表乞于常州居住。奉圣旨，依所乞。臣已于今月二十二日到常州讫者。”这段话中的“依所乞”，就是批准他去常州居住的请求。细读这几段文字，都只说苏东坡去常州“居住”，而只字未提去常州当“团练副使”。如果皇帝改命他为“常州团练副使”，他的谢表就

应当改写。

至此，我们不难明白：苏东坡确实没有当过“常州团练副使”。

那么，《宋史》本传为什么说苏东坡当过“常州团练副使”呢？我想可能是因为《宋史》编撰时间太仓促，编撰者把“去常州居住”误为去常州担任“团练副使”，又来不及加以考订所致。后来者采用它的说法，便一讹再讹，也许林语堂就是如此的。我们则千万不要步其后尘！

谈史请勿随意

近读沈亦泉先生的大作《谈谈苏东坡的三位夫人》^③，加深了我对苏东坡元配妻子王弗、继妻王闰之、侍妾王朝云的了解和认识。但又觉得沈先生写作此文有些随意，留下了一些瑕疵。在此不揣冒昧地摘出几个例句，与沈先生商榷。

1. 王弗是他元配夫人，1054年她十五岁时，就在苏轼进京赶考之前，嫁给了这位十八岁的青年才子。

这段话有两个问题。一是关于王弗、苏东坡的岁数。苏东坡在《亡妻王氏墓志铭》中说：王弗“生十有六年而归于轼”。据此可知王弗是在16岁时嫁给苏东坡的。孔凡礼《苏轼年谱》载：苏东坡19岁时娶王弗为妻。也许沈先生说他是以周岁来表述的，但也欠当——苏东坡生于1037年1月8日，到1054年1月8日才满十七周岁呢。须知古人是不以周岁来计算年龄的，我们应该按照古人计算年龄的习惯来计算古人的年龄（孔凡礼《苏轼年谱》就是如此），以免造成混乱。

二是关于王弗出嫁和苏东坡进京赶考的时间。沈先生这段话明明白白地说王弗是在苏东坡进京赶考之前嫁给苏东坡的。其实并非如此。1054年王弗嫁给苏东坡，但苏东坡并没有在这一年进京赶考，第二年也没有进京赶考，而是在第三年即1056年的春天才同弟弟苏辙一道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进京赶考的，这中间跨着三个年头呢。

2. 在这三位夫人中，她（指王朝云）与苏东坡相处的时间最长。……苏东坡的一生能与之终其一生相伴的，以朝云的时间为最长。

这段话说得不准确。王弗二十七岁病逝，与苏东坡共同生活了十一二年。王闰之于熙宁元年（1068）下半年与苏东坡结婚，于元祐八年（1093）八月一日去世，与苏东坡共同生活了25年。王朝云于熙宁七年（1074）下半年苏东坡离杭赴密州前“来归”，于

绍圣三年(1096)七月五日病逝,与苏东坡共同生活了22年。苏东坡在《朝云墓志铭》中说王朝云“事先生二十有三年”,说的是23个年头。从上述时间表可以看出,与苏东坡相处时间最长的是王闰之。

3.苏东坡总是称朝云为“天女维摩”,以赞其圣洁。

苏东坡曾以天女喻王朝云,却未以维摩喻王朝云。

维摩,即维摩诘。《维摩诘经》说他是毗舍离城中的一位大乘居士,跟释迦牟尼同时,善于应机化导,宣扬大乘深义,是佛典中现身说法、辩才无碍的代表人物。《维摩经·观众生品》又说,维摩室中有一位天女,以天花散诸菩萨身。俗语“天女散花”,典出于此。由此可知天女、维摩是两个人。苏东坡《殢人娇·赠朝云》:“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空方丈,散花何碍。”《三部乐·情景》:“何事散花却病,维摩无疾。”《朝云诗》:“天女维摩总解禅。”这三处都用了《维摩经》中的典故。苏东坡自比维摩,而以天女(散花)喻王朝云。沈先生说苏东坡总是称王朝云为“天女维摩”,是误把天女、维摩当作一人了。

4.我看了苏辙写的《东坡先生墓志铭》称王弗为通义郡君,王闰之为同安郡君,而对朝云这位嫂子只字未提,连一个“如夫人”难道都担当不起吗?在其他一些传记上亦直呼之为“侍妾”,使我心上很不是滋味,特别那个“侍”字如蝇在口,不得不一吐为快,因此要为王朝云说几句公道话!

沈先生因为苏辙未称王朝云为苏东坡的如夫人而忿忿不平,且反感称王朝云为侍妾。

究竟应当如何称王朝云?

现在许多小说家甚至苏学研究(自然包括沈先在内)都称王朝云是苏东坡的“第三夫人”。但依我看,这恐怕是从今天的观念、感情出发,而要强做苏东坡、王朝云的“红娘”罢了。

有人说,苏东坡在杭州纳王朝云为妾,沈先生说:“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苏轼37岁,纳王朝云为妾。”有人说,苏东坡在徐州于王朝云满16岁时纳她为妾;又有人说,苏东坡谪居黄州时纳王朝云为妾。各说不一,但都没有举出禁得起考察的史料依据。

王朝云究竟是不是苏东坡的夫人?最好让苏东坡自己来回答——考查苏东坡留下的文字资料,苏东坡除了常常直呼王朝云之名(朝云)而外,还常以侍者、女使、侍妾称之。苏东坡在王朝云病逝后写的《朝云墓志铭》和《惠州荐朝云疏》中均称

王朝云为“侍妾”,这当是盖棺论定的正式称呼(沈先生也许不知道苏东坡本人就以“侍妾”称王朝云,故尔反感此称)。苏东坡没有称王朝云为妻、为夫人,连如夫人也没称,而只称“侍妾”。为什么?因为王朝云不是他的妻、夫人,连如夫人也不是,而只是“侍妾”。这就是历史!无情的历史!既如此,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对王朝云只字不提就不足为怪了(鄙人有《苏东坡与王朝云》一文专谈他们两人的关系,发表在《苏轼研究》2007年第1期上,可供参考)。

今人读古人的文章,谈古人的事,切勿离开古人生活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环境,以当今的文化观念、思想感情去解读和谈论,否则就会犯“强加”的偏差。我们阅读苏辙的《东坡先生墓志铭》,就应当想一想他为什么只字不提王朝云?进而去研究它、解答它,这才是读古人文章应抱的态度。如果仅从个人感觉、感情出发去埋怨、责怪古人,就不会真正懂得古人、古事。

5.她(王闰之)已经暗暗对苏东坡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王弗知道这位堂妹(指王闰之)的性情好,能伴苏东坡过一辈子,尤其是王弗在病中更向她的堂妹和自己的丈夫经常吐露衷情,这样不但苏东坡可以得到一个可靠的伴侣,同时她自己遗下六岁的儿子苏迈,也可更加放心了。

不禁要问,沈先生从何得知王闰之在嫁给苏东坡之前暗藏着的心里活动、感情状态?王弗生病到逝世一直在京师,她怎么能向远在四川青神县的堂妹王闰之“经常吐露衷情”?沈先生从何得知王弗有让堂妹王闰之嫁给苏东坡的“衷情”?沈先生这些文字恐怕是随意推测而写出来的吧?

现在写苏东坡的文章(书籍)出了不少,有文艺作品,也有史料介绍、学术论文。我认为这两类文章(书籍)应当有明晰的界限——文艺作品允许合理描写甚至虚构,而史料介绍、学术论文则应当完全忠于史料,不应根据个人猜测随意描写和虚构。但当今一些史料介绍、学术论文却逾越了这条界限,用写小说的笔法把个人推测的内容随意地写了进去,久而久之使读者莫辨真假,使若干年后的学者再去考辨。这是不慎重的做法。

因此我建议:谈史请勿随意!

苏迈这段文字该如何断句

在徐州参加全国第16届苏轼学术研讨会还有

幸得到一册《眉山堂苏氏世家》④。该书第5页刊载苏迈墨迹石刻拓片影印件一幅，图下释文曰：

郑天觉自除直殿以后笔力骤进，无一点画工俗韵，比来，士人中罕见。出其右者为冰华居士，钱济明作明皇幸蜀图，又作单于并骑图皆清绝可人，予从冰华求此一轴以光画匣。大观三年八月十日眉山苏迈伯达书。

细看影印件上文字，“以光画匣”应是“以光画篋”。匣和篋的音、义都不同：匣音瑕，是较小的有盖的方形器；篋音切，是小箱子。不知释文为什么把篋释作匣。

此释文有4层意思：1.郑天觉笔力骤进，在士人中罕见；2.比郑更好的为冰华居士；3.钱济明作幸蜀图、并骑图皆清绝可人；4.苏迈跟随冰华向钱济明求得一轴。

苏迈这段文字应当是题写在一幅图画之后的，短短的80多字，怎么会表达这样不很贯通的4层意思呢？

我觉得上述释文断句不够正确，因而把苏迈的原意弄歪了。我试断苏迈这段文字如下：

郑天觉自除直殿以后，笔力骤进，无一点画工俗韵，比来士人中罕见出其右者。为冰华居士钱济明作明皇幸蜀图，又作单于并骑图，皆清绝可人。予从冰华求此一轴，以光画篋。大观三年八月十日，眉山苏迈伯达书。

读我断句后的这段文字，其意义是贯通的，就是说：郑天觉笔力骤进，近来少见士人中有超过他的，他为冰华居士钱济明作了两幅画，都清绝可人。我跟随钱济明前去向郑天觉求到这一幅，使我的画篋增了光。

比较不同断句的苏迈文字，可知前一种断句把郑天觉为钱济明画两幅画误为钱济明画了两幅画；把冰华居士和钱济明误为两个人（钱济明号冰华居士）；把苏迈跟随钱济明去求得郑天觉作的一幅画误为苏迈跟随冰华居士去求得钱济明作的一幅画。

2009年12月，于三苏故里。

论文注释：

① 邵玉健、包立本著《东坡常州奇缘》，珠海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② 《白话续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998页。

③ 《苏学通讯》第41、42期。

④ 苏肇平主编《眉山堂苏氏世家》，安徽苏氏宗亲联谊会编辑出版，第5页。

（乐山市文化艺术研究所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上接4页）

《庆历圣德颂》，见石介（守道）《徂徕石先文集》卷一《庆历圣德诗》。此诗有长序，序中纪事时间最迟为庆历三年四月十三日。苏轼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当年在乡校见到，实属不易。乡校当在眉州城。因为是州城，信息快，交通方便。如果是在偏僻山村，恐怕不易见到。乡校是为全眉州子弟服务，自以设在州城为宜。

这样说来，苏轼入乡校和在天庆观读书是同一个时候的事。这只有在州城内才能办到。这也证明，天庆观确实是在眉州城内。

以上我所说的一些话，都和《苏轼研究》目前正在开展着的苏轼故居的问题的探讨有关。苏轼故居是一个很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我这篇短文章，也算是给讨论添一点热闹吧。

2009年12月13日于北京西城

（著名苏学专家、中国苏轼研究会顾问）



第十六届苏轼学术研讨会之后
在徐州苏轼后裔苏化友的农庄“桃花源酒店”做客

《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版本考

李咏梅

内容提要：苏轼诗文集历代版本众多，宋代王十朋集注苏诗本是其中很著名的传本。而王注苏诗中“增刊校正”本不仅在国内广为流传，而且还在海外被翻刻，可见其影响之大。本文拟对《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的版本流传情况加以考证。

关键词：王状元集注苏诗 增刊校正本 版本考

现存最早的苏诗集注刊本是宋代黄善夫家塾本，题名为《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后来宋末元初出现的《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就是在前者基础上增加刘辰翁的批点，并对旧注中的疏误进行校正，同时还对诗的编排次序做了部分调整。此本不仅在国内广为流传，而且还在海外被翻刻，可见其影响之大。本文在以往有限的考证资料基础上，进一步对现存版本进行分析研究，以全面考证该书的版本流传和收藏情况。

1. 元建安熊氏鼎新绣梓刊本

《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最早出现在宋末元初，分七十八类，从宋本仍署“王十朋龟龄纂集”，但增署“东莱吕公祖谦分类，庐陵须溪刘辰翁批点”，元建安熊氏鼎新绣梓刊本即为此种刻本的代表。该本每半叶十一行，行十九字，小字注双行，行二十五字，黑口双边。正文卷首书名下题“宋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兼侍读学士赠太师谥文忠公苏轼”，次署“庐陵须溪刘辰翁批点”，在《诸家姓氏》后列《百家注东坡先生诗门类》，署“东莱吕公祖谦分类”，门类题名“吕祖

谦编”首见于此本。其分类与宋黄善夫本基本相同，熊本“送别”类下无“留别”，“星河”与“月”分编为二卷，故仍为七十八类。此本增收了刘辰翁批点，宋本无刘评。刘辰翁为宋末元初人，批点苏诗应在入元以后，故此本应为元刻本。此本雕刻精良，为元刊之佳者，现存国家图书馆①。

2. 建安虞本斋务本书堂本

建安虞本斋务本书堂本同熊本仍题名《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分七十八类，但只署“王十朋纂集”，不收刘辰翁批点，不标“吕祖谦分类”，同宋本。此本每半叶十一行，行十九至二十四字不等，小字注双行，行二十五至三十四字不等，细黑口，左右双栏，双鱼尾。文中涉宋帝上空一格，遇宋帝讳名有避有不避，卷首书名下题“宋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兼侍读学士赠太师谥文忠公苏轼”，把南宋刻本的“前礼部尚书”改为“宋礼部尚书”，熊本亦如此。

虞本与宋刊本的主要区别在于：（1）书名不同。宋本书名题为“王状元集百（或诸）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虞本则加上“增刊校正”，并删除“百（或诸）家”字样。（2）宋本赵序在前，王序在后，虞本则相反。（3）宋本（黄善夫本）注家姓氏均采用阴文，虞本则采用墨围表示。（4）虞本在诗尾或行间空白处有增注，标以“增刊”字样，并对宋本旧注亦有删改。

虞本的刊刻年代长期以来备受争议。《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把此本列入“宋版集部”，《藏园群书经眼录》也著录为宋刊本。叶德辉则对此进行了反驳，他在《书林清话》中指出：“此（虞本）为元

刻本，虞氏所刻它书有年号者可证。然则秘阁三藏鉴赏尚不可据，如此则其他藏书家见闻浅陋，其为书贾所骗者，正不知有几人也。”^②刘尚荣则遵从叶氏说法，他认为：虞本改旧注“本朝”字样为“宋朝”，改“前礼部尚书”为“宋礼部尚书”，讳字又多不避，“校正”苏诗文字又多据元刻本特有的异文，如《海棠》诗末句虞本作“高烧银烛照红妆”，这是元以后刊本中才有的异文，因此，虞本应是元刻本，顶多是宋刻元递修本^③。此本现存国家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天津市人民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④，北京大学图书馆也藏有此本^⑤，均从《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为宋刊本。

3. 其它刻本

继虞本和熊本之后，还出现了下面几种综合二者之长的版本。

3.1 元庐陵坊刻本

该本仍题名《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分七十八类。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一字，注小字双行，行二十六字，黑口，双鱼尾，版心刻“坡诗”及卷数和页数，首列王、赵序，次列“姓氏”、“目录”、“纪年录”，“姓氏”后有“庐陵口口口口书堂新刊”。今存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⑥。

另《藏园群书经眼录》亦著录了此本，为十三行二十二字，后有“庐陵口氏口口书堂新刊”木记^⑦。此本与上述台湾藏本的版式有些出入，付氏未说明所据何底本而著录，因此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3.2 汪氏诚意斋集书堂刻本

此书的书名、版式、卷数和类别等均同于前庐陵坊刻本，盖是据庐陵坊刻本翻刻的。《天禄琳琅书目》“元版集部”云：“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三函三十册，宋苏轼著，王十朋集注，刘会孟批点，二十五卷……东坡纪年录一卷……今观此书仅二十五卷并非王氏三十二卷之旧……姓氏后有汪氏诚意斋集书堂新刊木记。假名妄作，必是此人特以其书规仿宋槧，恇印清朗，尚属元刻之善者，故存之。”^⑧叶德辉则称：“汪氏诚意斋集书堂，无年号刻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集三十二卷，纪年录一卷。见天禄琳琅六。”^⑨刘尚荣认为《天禄琳琅书目》定为元版有误，应为明成化间刻本，今有诚意斋所刻它书为证，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定为明刻本是有根据的^⑩。国家图书馆和浙江图书馆藏有此本，为二十五卷，十二行，行二十一字，黑口，四周双边^⑪。

3.3 明刘氏安正堂刻本

该本题名为《增刊校正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增加了“百家注”字样，二十卷，收刘辰翁批点。北京大学图书馆存十八卷（一至十二、十五至二十），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三字，小字双行同，黑口，四周双边^⑫。另存日本静嘉堂文库和内閣文库^⑬。

《书林清话》云：“书林刘宗器安正堂……丙戌（当是嘉靖五年）刻增刊校正王状元集诸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三十卷。”^⑭此本比北大本卷数多出十卷，且题名略为不同，为“诸家注”，并有具体的刊刻年代。

《藏园群书经眼录》也著录了此本，半页十二行，行二十一字，小字注双行，行二十五至二十八字不等，细黑口，双鱼尾，四周双边^⑮。

3.4 其它元或明版本

国家图书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联合导航系统还著录了《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的其它版本：

3.4.1 元刻本

收刘辰翁批点，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一字，黑口，四周双边。现存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⑯。

3.4.2 明初刻本

收刘辰翁批点，现存四川省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和眉山三苏博物馆。

笔者所见三苏博物馆藏本，存残本十二册（卷十三、卷十五至二十五），半页十二行，行二十一字，小字注双行，行二十五至二十八字不等。粗黑口，双鱼尾，四周双边。版心上刻书名、卷数及页数。竹纸，色黄，簾纹约两指宽，有白棉纸为衬。手写上版，字体为柳体，刻印精良，墨色较好，颇有宋版遗风。多简体字。百家注姓氏用墨围表示，而“新增”、“新添”等字样则采用阴文。文中有“广复景斋苑藏图籍印”和“梅花草堂秘籍”等藏印。该本各卷书名多不统一，字体亦不一致，盖由多个刻工刻写。此本可能是由几种刊本拼合而成，或者是坊刻本，由于是残本，未见卷首牌记，无法判断具体的刊刻者和刊刻年代，三苏博物馆根据其版式特征，暂定为明刻本。

3.4.3 明抄本

此本现存国家图书馆，半叶九行，行十八字，小字双行同，红格，四周单边^⑰。

3.5 海外版本

3.5.1 日本明历丙申松柏堂刻本

此本在国内罕见著录，故鲜为人知，《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也未收录此本。眉山三苏博物馆藏有此本，笔者亲见，为已故中顾委员李一氓先生于一九五九年十月赠送，是目前在大陆的唯一藏本。

该本半页九行，行十五字。小字注双行同。粗黑口，双花鱼尾，上下双边，左右单边。书高二十六点五厘米，宽十九点一厘米（比国内一般刻本宽），框高二十一点八厘米，广十七点五厘米。版心刻书名、卷数及页数。印纸为日本皮纸（又称东洋棉纸），色泽白中带黄，无簾纹，表面略微粗糙，韧性较强。字体为写刻软体，似赵体，结构方正工楷，隽美秀逸，但略显呆板。朱墨两色套印，正文、注文和片假名用墨色，人名、地名和书名等专用名词用红色竖线画在正文上标识。文中亦有红色圈点，旁注日文为手写上版。

第一册载“东坡纪年录”一卷，署“仙溪傅藻编纂”。此“纪年录”是以段仲谋的《东坡行纪》和黄德粹的《东坡系谱》为基础而编成的。卷末有一双行朱印，文曰：“当山四十八世高岳千峰喜拾”，盖为藏书人印章。

第二册首列王十朋和赵夔分别撰的“增刊校正百家注东坡先生诗序”两篇。次列“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东坡先生诗姓氏”，题署“王十朋纂集”。自黄庭坚起，到王十朋三兄弟止，实收九十六家，盖取全数矣。其中标列了各家姓名、字号、爵里等。后有一翻印牌记，曰：“建安虞氏务本书堂刊”，由此可知此本是根据虞本翻刻的。次列“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东坡先生诗目录”，分七十八类。

书末有牌记，上记刊刻年代为明历丙申年，刊刻者为松柏堂。该页左空白处有李一氓先生的两行朱色注文，曰：“日本明历丙申为西历一六五六年，时清代顺治十三年也。”故此本为清初时翻刻。

此外，该本还藏于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日本的静嘉堂、内阁文库和东洋文库^⑩。

3.5.2 朝鲜铜活字本

朝鲜铜活字本的书名、卷数、类别和编次等与元庐陵坊刻本基本相同，现存国家图书馆^⑪和日本米泽等图书馆^⑫。

综上所述，《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不仅国内版本众多，而且还流传到日本、朝鲜等海外进行翻刻，可见其影响甚广。推其原因，大概是得益于王十朋、吕祖谦和刘辰翁等三人的影响，他们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均为进士出身。该书某些版本仍存在着一些争议，需要今后做进一步

考证。

论文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刘尚荣《苏轼著作版本论丛》，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87、80、82、83、83、83页。

⑦、⑧、⑨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十、卷四、卷五。

⑩、⑪、⑫、⑬、⑭ [2009-05-19]、[2009-05-28]、[2009-05-28]、[2009-06-20]、[2009-06-25] <http://202.96.31.45/libAction.do?method=goToBaseDetailByNewgid&newgid=13232&class=kind>.

⑮ [2009-05-19] <http://rbsc.calis.edu.cn/aopac/controler/main>.

⑯、⑰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三。

⑱《天禄琳琅书目》卷六。

⑲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巴蜀书社，1990年，第89页。

⑳、㉑ [2009-06-29]. http://opac.nlc.gov.cn/F/SAHLI6I2CD3UFQE6FTQ1HXYYJXXNU9FVTKD7HTLCCBSI3LCBHA8-03964?func=full-set-set&set_number=051191&set_entry=000001&format=999

（四川大学图书馆研究员）



我欲乘风归去（刘怀东篆刻）

论苏轼的批判创新精神

王启鹏

内容提要：批判精神就是对错误的思想、言行作系统的分析，然后加以否定，它与创新精神是不可分割的。苏轼的批判创新精神表现在：对传统观念的批判；在熙宁变法中对王安石变法的批判；在文艺创作中对时弊的批判。苏轼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批判创新精神，其主要原因是：一、宋代是一个追求理性，高扬个性的时代；二、受其家族叛逆精神的影响；三、本人聪慧好问和特殊的读书方法。

关键词：苏轼 熙宁变法 王安石 文艺创作 批判创新精神

苏轼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文化名人，除了他的天赋高之外，很主要的就是得益于他的批判创新精神。

所谓批判创新精神，从现代心理科学来说，批判，就是对错误的思想、言论或行为做系统的分析，加以否定。或是对事物的认识，分清其正确的和错误的或有用的和无用的（去区别对待）。①而创新，则是指“抛开旧的，创造新的。”②因此可以说，批判和创新精神是紧密相连的，是不可分割的。对旧事物持批判态度的目的是为了创新，建立新的学说；而要创新则必须具有批判精神。这种关系就是哲学上讲的“破”和“立”的关系。俗话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所以说，“破”是“立”的前提；“立”是“破”的结果。苏东坡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全能的文艺家，政治上的风云人物，其根本原因就是它具有彻底的批判精神，因而能在各个领域建立起自己的新见解。

说苏东坡从小就具有批判精神，是有根据的，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他在21岁参加礼部举行的省试时所写的论文《刑赏忠厚之至论》。这篇论文具有很多优点，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观点鲜明，明确地提出了“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的论点。

加上文字平实，一气呵成，大有孟子的雄辩之风。所以，主考官欧阳修和梅尧臣等考官都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好。其中最能够体现苏轼批判创新精神的，乃是苏轼在论述“奖赏宁可失之过度，刑罚若有疑问时就要慎重，以免滥杀无辜”的道理时，杜撰了这样一个典故：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③

当时，欧阳修、梅尧臣等人都不知道其出处，但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只好说：“此郎必有所据，更恨吾辈不能记耳。”后来放榜了，苏轼登门来道谢了，欧阳修才问他此典出在何书。苏轼说：“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中。”欧阳修找书翻了翻，找不到。过了几天再问苏轼，轼曰：“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妻赐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何经见。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欧阳修听了大惊，佩服道：“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事。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在此文中，苏轼批判地吸收了孔融的思维方法，杜撰了皋陶杀人的典故，使之十分恰当地证明了论点，达到了天衣无缝的效果。自此，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就以其深刻而鲜明的观点，生动而恰当的论据，严密而有力的论证而在文坛上占有其一席之地，令后人都佩服苏轼大胆而深刻的批判创新精神。

一、苏轼批判创新精神的表現

苏轼的批判创新精神是多方面的，现仅从他对传统观念的批判等三个方面来阐述。

（一）对传统观念的批判创新

1. 对宇宙生成论的批判创新

由于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原因，我国古代先民对于宇宙的生成是不了解的，只觉得这个世界很神秘，于是就进行了不懈的探索。老子的《道德经》对这个问题作了研究，但不能解决，只能提出一些抽象的、带有点神秘的看法：“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④“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⑤究竟什么是“道”？什么是“有”和“无”？“道”和“万物”又有什么关系？老子也没有在书中讲清楚。而苏东坡在其著名的哲学著作《东坡易传》中就把宇宙万物之生成这个问题讲清楚了。

苏东坡在解释《易经》之“一阴一阳谓之道”时，就对自然规律这个“道”作了这样的解释：

阴阳果何物哉？虽有萎、旷之聪明，未有得其仿佛者也。阴阳交，然后生物；物生，然后有象；象立而阴阳隐矣。凡可见者皆物也，非阴阳也。然谓阴阳为无有可乎？虽至愚知其不然也，物何自生哉？是故指生物而谓之阴阳，与不见阴阳之仿佛而谓之无有者，皆惑也。圣人知道之难言也，故借阴阳以言之，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阴一阳者，阴阳未交而物未生之谓也。喻道之似，莫密于此者矣。^⑥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苏东坡在解释“一阴一阳谓之道”的“阴”和“阳”时，都是肯定其为物质性的，并不是虚无缥缈的神秘的观念性的东西。所以他在讲了“阴阳交，然后生物”后，紧接着就说：“阴阳一交而生物，其始为水。”这就说明，苏轼认为，宇宙万物的生成是由宇宙的物质运动而生成的。这是苏轼批判地吸收了老子的《道德经》中关于宇宙生成的学说，而创造性地建立起自己的学说的例子。

2. 对传统观念“水”的批判创新

“水”，是一种特殊的物质，由于其流动性，没有固定的形状，具有其他物质没有的优点。所以，我国古代先民从水的性质而看到了它具有人类的许多优点，因而把它比作人类的美德。老子的《道德经》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夫唯不争，故无尤。”^⑦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⑧“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⑨老子的这些言论，都是从“水”的性质出发，从社会学这个意义来说的。而苏东坡在《东

坡易传》中说的“水”，除了从社会学这个角度来说之外，还从庄子的心性之学和现代哲学上的“物质”这个意义上来说。

苏东坡在《东坡易传》中说：

万物皆有常形，唯水不然，因物以为形而已。世以有常形者为信，而以无常形者为不信。然而，方者可以斫以为圆，曲者可以矫以为直，常形之不可恃以为信也如此。今夫水，虽无常形，而因物以为形者，可以前定也。是故工取平焉，君子取法焉。唯无常形，是以遇物而无伤。唯莫之伤也，故行险而不失其信。由此观之，天下之信，未有若水者也。^⑩

“信”，是诚实、不欺之意。《易传》是说宇宙万物都是以固定的形态而存在于宇宙之中，所以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失去它们固有的形态。而苏东坡却找到了水的特例：水，在平常的状态下当然是液体。但，它“因物以为形”。所以，“天下之信，未有若水者”。水的“信”，就是超越了一切“常形”之物的不囿于一切外在事物的一种哲学观念了。它，“无常形”，“遇物而无伤”，最终可以胜物，可以包容一切。这种哲学观念，“君子取法”后，便转换为一种君子的精神品格：办事不能够拘于成法，要灵活变通。所以，苏东坡在注“维心，亨，乃以刚中”时又说：

所遇有难易，然而未尝不志于行，是水之心也。物之窒我者有尽，而是心无已，则终必胜之。故水之所以至柔而能胜物者，惟不以力争而以心通也。不以力争，故柔外，以心通，故刚中。^⑪

从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心与物的关系中，“道”、“水”、“心”是绝对独立自由地存在于万物之中的。由于苏东坡从水的形态中悟出了这一特性，故“外柔刚中”便成为君子精神品格，苏氏之为人是这样，为文亦是这样。这一哲学思想，对后世哲学，尤其是阳明心学，有重大的影响。这是苏轼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老子思想的体现。

至于苏东坡把“水”当成现代唯物论中的物质来看待的思想，更是他的创造。他说：“阴阳一交而生物，其始为水。”^⑫关于万物生于水的观点，苏东坡在好些文章中都表述过，如《天庆观乳泉赋》、《续养生论》等。这一思想，在东坡之前是

没有的。

3. 对人性论的批判创新

在中国哲学史上，人性论一直是不同派别的哲学都在探讨的问题。什么是人性？孟子在《孟子·尽心》中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⑬按照孟子的说法，人们生理上的感受和反应，则是人的天性，而能不能得到这些享受就是命运了。那么，人性的本质是什么呢？孟子认为人性是善良的，而荀子则认为是险恶的；而扬雄认为是善恶混合在一起的；而韩愈则认为人性可分为三个等级：“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与下愚不移。”^⑭

那苏轼是怎样看待人性的呢？他在《扬雄论》中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人将人的“性”与“才”混淆了。他说：“夫性与才相近而不同，其别不啻若白黑之异也。圣人之所以与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真所谓性也。而其才固将有所不同。今夫木，得土而后生，雨露风气之所养，畅然而遂茂者，是木之所同也，性也。而至于坚者为毂，柔者为轮，大者为榼，小者为桷。桷之不可以为榼，轮之不可以为毂，是岂其性之罪耶？天下之言性者，皆杂乎才而言之，是以纷纷而不能一也。”他通过分析得出结论说：“由此观之，则夫善恶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⑮他在《东坡易传》中仍然坚持这一观点：“昔者孟子以善为性，以为至矣，读《易》而后知其非也。孟子之于性，盖见其继者而已。夫善，性之效也。孟子不及见性，而见夫性之效，因以所见者为性。性之于善，犹火之能熟物也。吾未尝见火，而指天下之熟物以为火，可乎？夫熟物，则火之效也。”^⑯这就对原来争论不休的人性论有了一个明确的解答。

苏东坡不满足于这一解释，他在晚年完成的《东坡易传》中还对人性作了专题论述，并引出了“命”和“情”的新命题：

古之君子，患性之难见也，故以可见者言性。夫以可见者言性，皆性之似也。君子日修其善以消其不善；不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小人日修其不善以消其善，善者日消，亦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夫不可得而消者，尧舜不能加焉，桀纣不能亡焉，是岂非性也哉！……性至于是，则谓之命；命，令也。君之令曰命，天之令曰命，性之至者

亦曰命。性之至者非命也，无以名之而寄之命也。死生祸福，莫非命者，虽有圣智，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情者，性之动也，溯而上至于命，沿而下至于情，无非性者。性之与情，非有善恶之别也，方其散而有所为，则谓之情耳。命之与性，非有天人之间也，至其一而无我，则谓之命耳。^⑰

在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苏轼认为人性是不可移易的，而人的善恶则是可以改变的。人的命运，是不可知晓的。人的感情，是人性活动的结果，和人性一样，没有善恶的区别。人的命运和人性一样，是与生俱有的，是不可知晓的。这些论述，在现在看来，仍不失其先进性，可见苏东坡是很善于批判地吸收前人的理论成果的。

4. 更为难能可贵的，他竟然对封建皇权提出了批评

中国社会有着 2 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封建社会，就其社会组织而言，它是建立在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关系之上的。国家关系、君臣关系、臣民关系，实质上就是家庭关系，是父亲与儿子的关系的延伸。所以，封建皇权是至高无上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皇帝是操纵着臣民生杀之大权的，所以，臣民在说话时是小心翼翼的，是不敢得罪皇帝的。否则，就会遭到灭顶之灾。

可是，苏轼自从踏上仕途之后，就一直遵循着孟子关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的“民本思想”，为百姓谋利益。他不顾个人的利益，始终坚持为老百姓说话，并劝说皇帝要关心老百姓的利益。他尚未正式走上仕途，守母丧回京后参加御试制科考试，在策问中就明确地提出：“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⑱这不是对家天下皇权的直接否定吗？以后，在《上神宗皇帝书》中又说：“人主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夫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⑲这不是在教训神宗皇帝吗？元祐二年（1087），旧党掌权，东坡在朝廷任翰林学士兼知制诰，身处高位，可他耿直的性格始终没有改变，不会观颜察色说讨好皇帝的话。而是实话实说。他在《辩

试馆职策问札子二首》中说：“臣闻圣人之治天下也，宽猛相济，君臣之间，可否相济。若上之所可，不问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问其曲直，下亦否之，则是晏子所谓‘以水济水，谁能食之’，孔子所谓‘惟予言而莫予违足以丧邦’者也。”^⑩这，分明又是在教训皇帝，还说要“君臣相济”。这在封建社会中怎能做到呢？古语说：伴君如伴虎。苏轼难道不知道触犯“龙颜”的后果吗？知道的。他在《上神宗皇帝书》的末尾说：“然而臣之为计，可谓愚矣。以蝼蚁之命，试雷霆之威，积其狂愚，岂可数赦，大则身首异处，破坏家门，小则削籍投荒，流离道路。”^⑪可见苏轼在发表这一番言论之时，是作好了获罪的思想准备的。

因此，我们从苏轼的这些言论可以看出，苏东坡批判封建皇权的思想是一而贯之的，且随着时间的发展，他本人社会阅历的增长，批判的深度和力度也是不断地发展的。这些言论既深刻，又大胆。可见苏东坡追求真理的勇气和批判封建皇权思想力度之猛。

（二）在熙宁变法中的批判创新精神

熙宁变法，主要是指王安石变法。因为它发生在北宋熙宁年间，叫熙宁变法更为科学些。传统的说法是：王安石是革新派，而苏轼就是反对派或是保守派。但，从历史事实来看，并非如此。

1. 苏东坡对北宋王朝潜伏的危机有清醒的认识，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

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有识之士都能看到。但是，能够做出正确的分析，并提出解决办法来的，恐怕就很少了。苏轼不仅是看到了，而且还把它写成文章，呈献给朝廷。苏轼的批判精神首先就表现在他对当时的社会潜伏着的危机有充分的认识。

苏轼认为，当时的北宋社会现实是：

国家无大兵革，几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此其有未测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盗贼人民流离之祸，而咨嗟怨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乱臣割据四分五裂之忧，而休养生息，常若不足于用。非有权臣专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亲。非有四夷交侵边鄙不宁之灾，而中国皇皇，常有外忧。此臣所以大惑也。^⑫

你看，苏轼在这里所列举的事实，都是一般人不容易看到的，隐藏在“天下太平”的表面现象之下的，充分体现了苏轼在年轻时期敏锐的社会观察力。面对“外忧内患”的社现实，该怎么办呢？苏轼认为，必须改革：

方今之势，苟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见其可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赞《易》，称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由此观之，天之所以刚健而不屈者，以其动而不息也。惟其动而不息，是以万物杂然各得其职而不乱，……苟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则智者愿效其谋，勇者乐致其死，纵横颠倒无所施而不可。^⑬

你看，苏轼不是鼓动神宗皇帝进行改革吗？他多么希望宋神宗皇帝一声号令，自己就跟着去干。那改革什么？就是苏轼在《思治论》中说的：“今世有三患而终莫能去，其所从起者，则五六十年矣”的“无财、无兵、无吏”这三大困境。^⑭所以，苏轼在他入仕之前，就写了《进论》、《策论》共50篇，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改革思想，并把它们上交给朝廷。这就充分展示了苏轼年轻时对社会的批判精神。

2. 从苏轼提出的社会改革措施来看他的批判创新精神

苏轼针对当时北宋王朝存在着的“冗费、冗军、冗吏”问题，提出了他的社会改革措施，这主要体现在他的25篇《进论》中。其中，“课百官”6篇，“安万民”6篇，“厚货财”2篇，以及“训兵旅”3篇。这些改革措施的提出，都是他基于对社会现实的充分分析后，才有针对性地提出来的。如他提出的“厚货财”的改革措施。首先，他对当时的经济形势作了充分的分析：

夫无益之费，名重而实轻。以不急之实，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岁而郊，郊而赦，赦而赏，此县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数日而待赐，此诚不可以卒去。……天子有七庙，今又饰老佛之宫，而为之祠，固已过矣，又使大臣以使领之，岁给以巨万计，此何为者也！……今为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无益之费，不为不多矣。^⑮

由于“冗军”、“冗吏”，财政开支当然就非常

大了。据此，苏东坡便提出了“厚货财”的策略：一曰省费用。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要节约开支。在哪些方面节约呢？其一就是裁减行政人员及其开支。苏轼举例说：“今河水为患，不使滨河州郡之吏亲视其灾，而责之以救灾之术，徒为都水监。”

“天下有转运使足矣，今江淮之间，又有发运，禄赐之厚，徒兵之众。其为费岂可胜计哉！”像这些机构和人员的设置，苏轼认为都可以精简掉。二曰定军制。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要裁减军队。怎样裁减？苏轼认为：“臣愚以为郡县之士兵，可以渐训而阴夺其权，则禁兵可以渐省而无用。……今之士兵，所以钝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见郡县皆有禁兵，而待之异等，是以自弃于贱隶役夫之间，而将吏亦莫之训也。苟禁兵可以渐省，而以其资粮益优郡县之士兵，则彼固已欢欣踊跃出于意外，戴上之恩而愿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耶？”^{②6}

你看，苏轼所提出的这些措施，既有分析，又有具体的做法，充分体现了他对社会现实的深刻研究和无所畏惧的批判精神。

3. 从他反对王安石变法中的某些措施来看他的批判精神

对于王安石变法，苏轼不是一概反对，而是反对他激进的做法和某些措施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

(1) 两人变法改革的目不同

苏轼和王安石都看到了北宋王朝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现实，都主张改革。但是，两人改革的出发点和目的却不同。王安石改革的核心是“理财”，也就是搜取天下之财以增加宋王朝的财政收入，其目的是“富国”。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②7}明确地表述了他改革的目的。

而苏东坡却认为改革必须首先让老百姓富裕起来。他在《拟进士对御试策》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孔子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管子曰：‘仓廩实而知礼节。’臣不知陛下所谓富者，富民欤，富国欤？”^{②8}这一质问，很明显就是针对王安石的“富国论”而发的。那苏轼提出的“富民”论，究竟有没有道理呢？有的。因为“民为邦本”是我国古代儒家的传统思想，《三国志》说：“国以民为本，强由民力，财由民出。夫民殷国弱，民瘠国强者，未之有也。故为国者，得民则治，失之则乱。”^{②9}可见老百姓富裕了，国家自然就会强大起来。苏东坡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

样做的。他的一生都在为老百姓做好事，故不管他是在生前还是在身后，都受到中国百姓的爱戴和好评。这种做法的本身，就是对王安石变法的批判。

(2) 两人在改革的方法上大相径庭

王安石求治心切，利用年轻气盛的神宗皇帝急于求治建功的心理，就在神宗面前要求他雷厉风行地推行变法。他在《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鼓动神宗皇帝说：“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质，承无穷之绪，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③0}要求神宗皇帝马上实行变法。

而苏轼则反对这种做法，他在《上神宗皇帝书》中批评神宗“求治太速”。在《拟进士对御试策》中又说：“慎重则成，轻发则多败，此理之必然也。”^{③1}他希望神宗皇帝能像老子所说的那样，无为而治，“贵于无迹”。为什么苏轼要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做法呢？因为苏东坡考虑到国民心理的承受能力，他深得“法相因而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辩试馆职策问札子》）^{③2}的道理。从现代教育心理学来说，苏轼的“渐进”改革方式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因为我国有漫长的封建历史，人们长期生活在传统的习惯之中，思维方式都是传统的，所以难于一下子就改变。而用渐进的方式来改变国人的思想认识，是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的。这，亦是苏轼对王安石变法批评的批判精神的体现。

(3) 两人对改革的具体措施认识不同

王安石作为11世纪的中国政治改革家，其推行的变法，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是有历史进步意义的。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王安石本人性格上的一些局限，如听不得不同意见，时人称他为“拗相公”。故新法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是毫不足奇的。即使是变法的措施正确，但是，当时的地方官吏在执行新法时又乘机捞一把，这又使变法走了样。由于苏轼长期生活在农村，任职在基层，对农村的事情比较熟悉。所以，苏轼对新法措施的可行性是比较清楚的。而他对新法所产生的一些弊端提出批评，也是很正常的。

苏轼对新法批评最多的就是青苗法。所谓青苗法，也称常平法。其法是：各路将原常平广惠仓的粮米由转运司兑换为现钱，以前十年中丰收时的粮价作为预借的折算标准，将农户自愿请贷的粮食折成现款贷付；每年分夏料与秋料两次，

在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将钱物贷与请贷的农户，连本外加40%利息随同夏秋二税一起缴还（若遇灾荒则随下次收成时归还）；按户等高低规定借款数额，如本路常平钱额在支借以后尚有余额，则由官府根据二等以上人户数多寡酌量派给。^③这一新法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其规定的利息过高，加上地方官员为了私利，硬性摊派，给农民带来了不少灾难。

苏轼认为，青苗法是政府用放贷取息的手段搜刮民财，为朝廷求利，应当取缔。他在《拟进士对御试策》中说：“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谓之放债取利，可乎？”^④在《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中诉说了地方青苗法执行的情况：“因提举官速要见功，务求多散，讽胁州县，废格诏书，名为情愿，其实抑配。或举县勾集；或排门抄札；亦有无赖子弟，谩昧尊长，钱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诈请，莫知为谁，及至追催，皆归本户。”东坡还说：“臣伏见熙宁以来，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余年，法日益弊，民日益贫，刑日益烦，盗日益炽，田日益贱，谷帛日益轻，细数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最后还用十分尖刻的语言规劝神宗皇帝：“今者已行常平糴余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如此足矣，何用二分之息，以贾无穷之怨。……而以万乘君父之尊，负放债取利之谤，锥刀之末，所得几何。臣虽至愚，深为朝廷惜之。”^⑤可见苏轼对青苗法提出的批评是经过调查的，是从维护朝廷的威信出发的。当然，他的言辞那么激烈，亦足以证明其批判精神的彻底性。

对于免役法，苏轼亦是作了重点的批评，他说：“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倍敛民财，十室九空，钱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相等。”^⑥

从以上数例我们可以看到，苏东坡在熙宁变法中，为了达到富民强国的目的，对王安石变法中的弊端是展开了无情的、激烈的批判，真正达到了“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⑦的境界。

（三）在文艺创作上的批判创新精神

苏东坡是我国的全能艺术家，诗词书画的艺术造诣，在我国的文学艺术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故在文学艺术方面多有批判创新的事例和有关的论述。

1. 对北宋初年浮艳文风的批评，提倡文学要

有为而作

北宋初期的70多年间，晚唐五代以来柔弱绮艳文风相沿成习，无法根除。吟咏风月，拨弄花草，淫巧丽侈的“西昆体”充斥诗坛。范仲淹批评此时的文风是：“文章柔靡，风俗巧伪。”（《上时相议制举书》）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决心要扫荡这种文风，于是发动了一场古文运动。可是，旧弊未除新弊又生。在古文运动中却出现了一种食古不化、怪僻难晓的“太学体”。

嘉祐二年（1057）苏轼举进士第后，在《谢欧阳内翰书》中便对这两种不同形式的文风提出了批评，立志要革除之：

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谕厥旨。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⑧

这是苏东坡对当时文风的批判。那怎样去革除这两种不良的文风呢？苏轼提倡文学要有为而作，反对无病呻吟的文章。他在《兕绎先生诗集叙》中说：

昔吾先君适京师，与卿士大夫游，归以语轼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将散矣！士慕远而忽近，贵华而贱实，吾已见其兆矣！”以鲁人兕绎先生之诗文十余篇示轼曰：“小子识之，后数十年，天下无复为斯文者也。”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枝词以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⑨

这就是早年苏轼向宋初两种不良文风宣战的宣言书，其批判的勇气可见。

2. 对王安石“一道德”的思想专制提出批评，提倡文艺的“百花齐放”

王安石当政后，深深地懂得抓思想舆论的重要，为了使文学能更好地为他推行的政治改革服务，他用行政的手段，限定在举子考试中策论的内容，规定只准发挥儒家的经典，实行思想专制，提出了“一道德”的做法。他说：“今人才之少，且其学术不一，一人一义，十人十义，朝廷欲有

所为，异论纷然，莫肯承听，此盖朝廷不能一道德之故也。”（《文献通考·选举四》）王的意思是很明确的，就是要搞思想一元化，不允许有不同的思想存在。为了进一步强化思想专制，在熙宁八年（1075），王安石亲自主持撰写了《三经新义》，通过神宗皇帝颁行天下，成为举子们备考的必读书目。到了晚年，他又写了《字说》，把它列为科举的主要内容。这样一来，士子们只是传习王氏一家之说就可以了。这种做法，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就是按王安石规定的模式来写文章，只有“一家之言”，一个“面孔”。苏轼对这种现象十分反感，对王安石的这种做法进行多次批评：

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于俗学。俗学之患，枉人之材，窒人之耳目，诵其师傅造字之语，从俗之文，才数万言，其为士之业尽此矣。……王氏之学，正如脱槩，案其形模而出之，不待修饰而成器耳，求为桓壁彝器，其可乎？^④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

④

在《与王庠书》中还说：“今程试文字，千人一律，考官亦厌之，未必得也。”^⑤

那怎样解决文章千篇一律的问题呢？苏东坡认为，品评文章的标准就是“辞达”。他说：“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所谓文者，能达是而已。”（《答虔倅俞括奉议书》）^⑥苏轼认为，作者只要把自己的思想表达清楚了，就是好文章。至于文体格式，则不能强求统一，要“百花齐放”。

3. 不满柳永词的“柳七郎风味”，但亦肯定其有“不减唐人高处”的优点

柳永是北宋初年的著名词人。由于他是第一个大量制作慢词的词人，对传统词的情景交融的手段作了杰出的运用，他的词作又通俗化、口语化，且多是表现城市中下层市民的生活，所以他的词在当时影响很大，以至“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四库全书》主编纪昀在《东坡一卷》中还说：“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可见柳词在当时的显赫地位。

面对柳永的盛名，苏东坡竟然公开批评柳词格调低下的一面，说：自己“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与鲜于子骏书》）^⑦还当面批评秦观学柳永填词：

少游自会稽入都，见东坡，东坡曰：“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少游曰：“某虽无学，亦不如是。”东坡曰：“销魂当此际，非柳七语乎？”^⑧

须知传统词的写作内容都是男欢女爱的风花雪月的为多，东坡的这一批评，肯定是要有非凡的勇气。但，东坡又不是一概否定柳词的成就的，他还赞赏过柳词《八声甘州》中的名句：“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说它们“不减唐人高处”，给予充分肯定。

4. 批判和改造传统的曲子词，以诗为词，确立了词的文学地位

苏轼之前，人们是瞧不起词的，认为它格调低下，只能是在歌楼酒肆中作为“娱宾遣兴”的工具，是文人“聊佐清欢”的工具。而对于词人，世人也是鄙薄他的。欧阳修在《归田录》卷二说，钱惟演晚年留守西京洛阳时，好读书。但是，词却在上厕所时才读的。^⑨

但是，苏轼却不是这样看，他认为：诗词本属一体，都是言情抒怀的工具。他在《祭张子野文》中说：“清诗绝俗，甚典而丽。搜研物情，刮发幽翳。微词婉转，盖诗之裔。”^⑩他下决心改造传统的曲子词，在守密州的时候便创作了豪放词《江城子·密州出猎》，还改造了传统的婉约词，写出了被后人称为“用词写悼亡，是东坡的首创”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从此，他便一发而不可收拾，创作了大量的词。值得注意的是，苏东坡创作的词与传统的曲子词是完全不同的。在创作的题材上，苏轼不再局限于喁喁的男女之情，山水田园、个人抱负、历史故事，都可以入词；在写作方法上，只要是能够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情感的，就可以运用，完全把词当作诗来写，而且在词中还可以发表议论，甚至突破破词谱规定的格律。正因为这样，李清照等人便批评苏轼的词是“句读不葺之诗”。殊不知，正是由于苏轼的这一创造，便把传统的曲子词发展为文人词，使词彻底摆脱了音乐的附庸，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这是苏东坡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最大贡献，其批判创新精神是不容置疑的。

二、苏轼批判精神形成的原因分析

苏轼批判精神的形成，有其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具体说来是：

（一）北宋是一个追求理性、高扬个性的时代

在中国思想史上，宋代的思想特点就是理性化。所谓理性化，就是指用理智的，或主要用理智的态度来把握对象、把握世界。这样，宋人对待传统的思想文化，自然就要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了。

这一特点反映在思想上，则产生了“宋学”。这是宋代学者们创立的一种以义理解说经书的新经学，其奠基者为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北宋五子”。他们对《周易》、《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儒家经典进行了新的阐释，变汉代的推崇“五经”为推崇“四书”，建立了一个由天道、地道、人道相互联系组成的学说系统。在这一过程中，“疑经”是建构宋学的重要手段。如欧阳修著有《易童子问》、《诗本义》、《春秋论》等文，对前人视为神圣的儒家典籍频频发难，并声称：“世无疑焉，吾独疑之”，要“究其所从来，而核其真伪”（《易童子问》）。而此时的蜀学，也体现出宋学的某些特色。苏洵在这股疑经的求新求变思潮的影响下，提出了“务出一己之见”的口号，对经学进行了新的阐释。

追求理性化的特点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则出现了议论化的倾向，“以议论为诗”，议论性散文大量的出现，就是标志。宋人的文学观念是“文以明道”。但是，这个“道”并不是唐人韩愈等人提倡的“文以明道”中的仅仅是指儒家“仁义”的“道”，而是指某种客观事物中隐含的“道理”。如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苏轼的《石钟山记》等著名散文，其记游的目的都是为了说明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道理。

宋代还是一个高扬个性的时代。这就是说，元祐以后涌现出一大批有名气的作家群，他们都以各自鲜明的个性屹立在北宋文坛上。如苏轼的“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等，他们都以善发议论著称于世。他们都认为，文学的要义在于：“发大义，定大策，开人之所难感，内足以正君，外可以训民，使于四方，邻国寝谋；言于军旅，

敌人听命。”（张耒：《送秦观从苏杭州为学序》）所以，他们都不断地寻找机会，以能够表现自己独立的意志，展示独特的才华，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要充分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自我”。最能够说明北宋文人高扬个性的事例，莫过于王安石的《谢公墩》诗：“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王安石字介甫，与晋代谢安字安石的字相同，王安石居住的地方又是谢安原来住过的，两者都相同。但是，王安石却说，我就是我，我就不是谢安。这说明，宋代文人的求异创新精神是很强烈的。

在这种高扬个性的理性社会氛围中，理学家们都提倡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如程颐说过：“学者先要学会疑。”（《二程集》）张载说过：“万物皆有理，若不知穷理，如梦过一生。”（《张子语录》）陆九渊亦说：“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陆九渊集》卷三六）这些言论，毫无疑问都体现出对客观事物的批判精神。作为生活在这时代的苏轼，能不受到这种理学精神的影响吗？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以为苏轼之所以能够有如此敏锐、深刻的批判精神，与他生活的年代是分不开的。

（二）苏氏家族叛逆精神之影响和继承

在苏氏家族中，其祖父苏序和父亲苏洵都是富有叛逆精神的，且都不满当时举子应试时所考的程式性的文章。他们都看淡功名。从现代心理学来说，具有叛逆性格的人，一定是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的。因为他们不满现实，要去反对它，就一定要找出理由来。这样，便催生出批判精神来了。

据李廌《师友谈记》中载：苏轼的伯父苏洵在天圣二年（1024）考中进士时，在眉州地区产生了非同小可的轰动。可是，祖父苏序却淡然处之。当时，“祖父嗜酒，甘与村父箕踞，高歌大饮。忽伯父封诰至。伯父登朝，而外氏程舅亦登朝。外祖甚富，二家联姻，皆以子贵封官，程氏预为之，谓祖父曰：‘公何不亦预为之。’太傅云：‘作官器用寄来。’一日方大醉中，封诰至，并外纓、公服、笏、交椅、水罐子、衣版等物。太傅时露顶戴一小冠子如指许大，醉中取诰，箕踞读之毕，并诸物置一布囊中，令村童荷而归，跨驴入城。城中人闻受诰，或就郊外观之，遇诸途，见荷担二囊，莫不大笑。”^⑩苏序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个性，

富有叛逆性格的人。

苏轼的父亲苏洵也可以说是一个“怪人”：少不喜学，曾废学游荡了七八年。两次应举考试落第，直到27岁后才发奋读书。这既说明了苏洵淡泊功名，亦说明了苏序认同儿子的做法，不加干预，让他自由发展。

苏洵落榜回家后，即取古人之文而读之，并将自己以前为应试而写的几百篇文章烧掉，闭门读书，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而大究六经百家之说。这种批判性地学习古人文章的做法，果然产生了神奇的效果。当他把自己写的文章送给欧阳修等人看时，立即在京城产生了轰动，都说苏洵的文章气势磅礴，大有孟子议论的文风。

苏洵的批判精神还充分地表现在他把自己的“务出一己之见”思想引入到“权变”的思想中，并对传统经学进行新的阐释。他公开宣称：“仲尼之说，纯乎经者也；吾之说，参乎权而归乎经者也。”（《谏论》）^⑩还说“吾观《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详内而略外，此其欲法周公之所为，且先自治而后治人也。”^⑪

苏洵的这种“疑经”的批判精神，对苏轼兄弟有着重大的影响。足以证明的事实是：苏氏父子的创作，有着题材相似，内容和观点相似的特点。如苏洵一生写有《几策》、《权书》、《衡论》、《史论》等文章，而苏轼也写有《进论》、《策论》共50篇，还有论史的《东坡志林》等。他们的文论观点亦有许多相似的，如关于文章要“有为而作”，文章“非能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工”，等。所以，苏轼在《谢制科启二首》中说：“轼才不迨人，少而自信。治经独传于家学，为文不愿于世知。”^⑫而《宋史·苏轼传》亦说：“轼与弟辙师父洵为文，既而得之于天。”^⑬这，就是证明。

苏轼，大概是接受了祖、父辈遗传的基因，他从小亦具有叛逆的性格。他在给刘宜翁和王庠的书信中都说到：“轼少时本欲逃窜山林，父兄不许，迫以婚宦，故汨没至今。”^⑭可见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三）由于苏轼自幼聪慧好问和得益于其特殊的“八面受敌”读书法

苏轼自幼聪慧好问的事例较多，现举2例以说明他的批判创新精神。

其一，庆历三年，苏轼8岁入乡校读书，有一个从京城来的读书人，拿着山东人石守道所作的《庆历圣德诗》给乡先生看。苏轼从旁边看了

几眼，就能够背出它的诗句来了，接着就问先生：里面所歌颂的11个人是什么人呀？先生回答说：“小孩子知道这些干什么。”苏轼接着就说：“如果这些人是天上的，那我不敢知道。如果是我们人类的人话，我为什么不可以知道呢？”可见苏轼从小就是一个寻根问底的人。

其二，苏轼10岁左右的时候，有一次，遵父命以《夏侯太初论》为题作文，令洵赞叹不已。夏侯太初（名玄）是三国时魏国的重臣。当时司马师继其父司马懿之后专权篡政，任大将军。夏侯玄参与了推翻司马师的密谋，事情泄露被捕。临刑时，他脸色不变，举动自如。据说，他平时处事镇定，一次“倚柱作书，时大雨霹雳，破所倚柱，衣服焦燃，神色无变，书亦如故”。苏轼借以评论道：“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⑮这两句话，初次显露出苏轼随机生发，翻空出奇的批判精神。所以，苏轼对这两句话也特别满意，成年后，还把它们写进《黠鼠赋》和《颜乐亭诗序》中。

成年之后，苏轼又总结出其独特的读书方法——八面受敌法。他在《又答王庠书》中说：“卑意欲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求者耳。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此虽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⑯这种读书方法确实“非速化之术”。但是，由于是“每次作一意求之”，这样就能集中精力去研究书中的每一个问题，用批判的眼光去审视书中的材料和观点是否正确，就能够得出自己的新看法，就能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创新。这一读书方法，亦是造成苏轼具有批判创新能力的重要原因。

三、余论

写到这里，本来就应该结束的了。可是，有的读者也许会说：你说苏轼在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方面具有批判创新精神，我信服。但是，说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也具有批判创新精神，我就不敢苟同了。

我认为，具有这一思想的人，仍没有跳出过

去那种极“左”思想框框的束缚，看问题绝对化，不愿意对问题作具体的分析。

我在文章中就说到，苏轼和王安石都是以改革派的面目走上政坛的。在王安石推行变法之前，苏轼就向神宗皇帝写了《进论》和《策论》50篇，具体阐述了他的改革思路，怎能说他是“保守派”呢？至于他公开反对王安石变法中的某些措施，主要是针对王安石不顾老百姓的利益的激进做法而提出来的。事实上，有些地方官是打着变法的旗号来中饱私囊的。苏东坡对这些弊端提出批评，不正好说明了他具有批判精神吗？况且，苏轼只是反对新法中的某些做法，而不是全部。况且，他还维护好的新法。司马光旧党上台后，司马光要全部废除新法，而苏东坡则认为要“参其所长”，不宜一概废除。这就证明了苏东坡是以批判的态度来对待新法的。

对于熙宁变法的功过得失与是非成败，著名的历史学家虞云国先生说过一句大实话：这“是一个说不清的话题。至于经验教训也将是见仁见智的。”（《细说宋朝》）^⑤因为在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夹杂着新旧党争，以后又发展为激烈的党争，这就不仅仅是对待变法的评价问题了。因此，只要我们能够客观地分析苏轼在变法中的表现，我们自然就可以得出较为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

论文注释：

①、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英汉双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版，第1461、302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110、110、299、730、790、741、226、227、115、269、272、305、304、791、303、783-785、791、1423、313、325、1427、1422、1793、1560、1943、1324、1820、1822页。

④、⑤、⑦、⑧、⑨ 李安纲编著《道教三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1、95、20、97、150页。

⑥、⑩、⑪、⑫、⑬、⑭ 东方龙吟点评《东坡易传》，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95、128、129、296、296、5页。

③ 《四书读本》，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348页。

②、⑩ 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6、69页。

⑫ 薛椿荫选注《古语精华》，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页。

③、⑤ 虞云国《细说宋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8、233页。

⑦、⑫ 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813、2828页。

⑧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09页。

④ 欧阳修《归田录》，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页。

④ 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苏轼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88页。

⑨、⑭ 《唐宋八大家散文全集·苏洵散文全集》，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399、385页。

⑤ 王水照、崔铭《苏轼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广东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编辑部编审）



一时多少豪杰（刘怀东篆刻）

青松与丝苓（上）

——苏轼与其门生的师友情

陈慧君

内容提要：本文论述苏轼与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陈师道、李廌等门生相识（道德文章，相映生辉）、相交（元祐唱和，师友欢聚）和相连（朋党之祸，患难与共）的事迹，表现了他们志同道合、情深谊重的师友关系。

关键词：苏轼门生 苏门四学士 苏门六君子

青松出涧壑，七里闻风声。
上有百尺丝，下有千岁苓。
自性得久要，为人制颓龄^①。
小草有远志，相依在平生。
医和不并世，深根且固蒂。
人言可医国，何用太早计。
小大材则殊，气味固相似。

这是黄庭坚最早献给苏轼的诗。他将苏轼比作青松；丝、苓（菟丝和茯苓）、远志等小草比作苏轼的追随者，谦虚地自入于小草之列。“医国”，典出《国语·晋语》：“上医医国，其次救人。”这些小草都可以入药，不仅可以给人治病，使之延年益寿，还可以除弊治国，以此表明作者的远大志向。最后两句是说苏轼与其门生学问有高低，但大家意气相投，所以都投奔到苏轼的门下来了。古诗托物引类，表示了黄庭坚对苏轼钦慕之情以及追随苏轼的心迹。这首诗，形象地道出了苏轼与其门生志同道合、情深谊重的师友关系。

道德文章 相映成辉

苏轼的门生很多，有著名的四学士、六君子以及李之仪、姜唐佐、黎子云、黎子威等，还有所谓的“后门生”，许多崇拜苏轼的“粉丝”也自称其门生，甚至连宋徽宗时期臭名昭著的大奸臣

梁思成，也自称苏轼的门生，这只不过是乌鸦想用孔雀的羽毛来装饰自己而已。然而，话要说回来，在章惇和蔡京、蔡卞兄弟发起的所谓“元祐奸党”的政治风波中，诏令毁掉一切苏轼的著作及碑刻，此人出于对苏轼的崇拜，抢救了一些苏轼的文物，也算做了点好事。苏轼与其门生，既是切磋学问的师徒关系，也是肝胆相照的挚友关系。

苏轼最得意的门生是“四学士”、“六君子”。前者指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再加上陈师道和李廌，即后世所称的六君子。沿袭唐朝惯例，馆职皆称学士。黄、秦、晁、张均进士出身，在元祐时期通过学士院考试都取得了馆职，因而赋之学士称号。不论他们是否进士出身，个个都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不仅在后世，即使在当时也都文名卓著。这些人都是出于对苏轼才学与品人的仰慕而先后投拜在苏轼的门下，从此结下了生死之交。拙文重点探讨苏轼与四学士、六君子感人肺腑的师友情谊。

嘉祐六年，苏轼进京参加欧阳修主持的贡举之后，由于恩师欧的赞赏，即以才学名动京城。但是，由于未及上任即回故乡守母丧，苏轼几乎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直至熙宁变法时期，在对待新法的态度上，他的人品才得到充分的展示。苏轼针对国家严重的三冗（冗吏、冗兵、冗费）状况，向皇帝大声疾呼：“方今之势，苟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见其可也”（《进策·策略一》）。他也充分认识到了社会变革的紧迫性，同王安石的主要分歧在于变法的目的和方法步骤。苏轼主张变法应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按部就班地进行；王安石则主张先富国，制定了各种政策聚敛财富以快速充实国库，再则由于忽略了吏治的整顿，从而加重了新法执行中的弊病。为此，苏轼两次上皇帝书，直言新法的弊端，结

果遭到变法派吕惠卿、李定等人的诬陷，被停职审查，事实证明他是清白的。当时，不仅欧阳修赏识苏轼，许多重臣如司马光、张方平、范镇等也都喜欢他。这不仅仅由于苏轼卓越的才学，也由于他不顾自身安危、敢于坚持真理的气节。司马光直言不讳地对宋神宗说：“苏轼……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虎狼之怒，上书对策，指陈得失，隳官^②获谴，无所顾虑，岂非忠臣？”苏轼自请出京后，历任杭州、密州、徐州等地方官，所到之处办了一系列有利于民生的实事、好事，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由此显示了苏轼耿直不阿的磊落襟怀，以及关注民瘼、尽力为民谋利的民本精神。可以说，苏轼是我国历史上人品、文品及官品俱佳的文士典范。

苏轼与门生的结交是以文学为因缘的，而维系他们师生情谊恒古长青的则是他们共同的道德志向。苏轼的门生都是在变法期间——苏轼通判杭州、出知密州、徐州等地时，甚至贬谪黄州之时，先后投拜其门下并进一步同他发生密切联系的。足可以看出，这些人决非趋炎附势之徒。苏轼对弟子们的要求也是德才兼备，即道德文章俱佳。诚如他对李廌所说：“深愿足下为礼仪君子，不愿足下丰于才而廉于德也。”简言之，不希望弟子有才无德。这是苏轼对弟子要求的箴言。

他的门生也确实如此，不仅才学杰出，而且品德高尚。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师友情谊经受了风云变幻的考验，在文化史上传为佳话。

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四学士中其年最长，只比苏轼小九岁，算不得上下辈份，但他始终以苏轼的门生自居，确实是名谦谦君子。在徐州黄楼庆典上，黄庭坚托友人捎给苏轼一封书信，并附上《古风》二首。《上苏子瞻书》云：“……伏惟阁下学问文章，度越前辈；大雅岂弟^③，博约后来；立朝以直言见排^④，补郡辄上最课^⑤，可谓声实于中，内外称职。凡此数者，在人为难兼，而阁下所蕴，海涵地负^⑥，此特所见于一州一国者耳……”极言对苏轼的人格与文章敬佩之至，表示了自己想到苏轼的门下受教的迫切心情。此前，苏轼已经从黄庭坚的舅父湖州太守孙觉那里读到过他的诗文，“以为超轶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世久无此作。”由此，黄庭坚名声大作。俗话说：文如其人。苏轼通过黄庭坚的诗文，推想出其人品，必定是轻视虚名钱财、自尊

自重之人，是可以深交的朋友。他在给黄庭坚的复信中赞扬了黄庭坚超凡出尘的品格，谦虚地表示自己获得其友谊的欣喜心情。

不久，黄庭坚与苏轼的友谊即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苏轼由于写了一些讽喻新法的诗而被奸佞小人李定、舒亶等告到神宗跟前，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乌台诗案”。苏轼为此蹲国家大牢、贬居黄州前后达五年之久。黄庭坚与苏轼虽未曾谋面，却因诗文交往而被罚金，并且影响了他的官职升迁。此年，黄庭坚任北京国子监教授的任期已满，按例改官，有人推荐他进京任著作佐郎，但由于受此事牵连而改授吉州太和县知县。但是，黄庭坚对苏轼的情谊没有丝毫改变。

在家里，黄庭坚是个孝子，其母病卧期间，他衣不解带，昼夜服侍。在任上，他为官廉洁奉公，同情百姓的苦难。当他上任之时，吉州正推行盐茶专卖新法，由官府颁发盐筴以控制食盐供应。邻近一些县官为了谋取暴利及向上司邀功买好，不顾百姓的购买能力，往往多报数量，然后以高价摊派到户。黄庭坚深入民间进行调查，亲自目睹了广大农民的穷困状况，为了减轻百姓负担，他没有多报盐筴。此举引起了同僚的不满，却得到了当地百姓的赞扬。后来黄庭坚被调到德州德平镇任监镇官，德州通判赵挺之要在德平镇推行市易法，由官府统管市场。黄庭坚否定了此种做法，认为“镇小民贫，不堪殊求，若行市易，必至星散。”由此得罪了赵挺之这个小人，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高邮才子秦观，字少游、太虚，是苏轼最得意的弟子。其性豪放，洒脱不羁，跟苏轼的性格颇为近似。苏轼知徐州任上，秦观进京应举途中慕名前来遇见。献诗曰：“人生异趣各有求，系风捕影只怀忧。我独不愿万户侯，唯愿一识苏徐州”（《别子瞻》）。之前，苏轼已经熟知秦观的词作，戏谑地称其为“山抹微云君”。两人相交甚欢。次年，秦观作《黄楼赋》献给苏轼。苏轼称赞他有屈原、宋玉之才：“雄词杂古今，中有屈宋姿。”

苏轼贬谪黄州后，秦观曾多次寄诗文给他表示慰问。苏轼很受感动，写了著名的《答秦太虚书》：“寄示诗文，皆超然胜绝，亹亹^⑦焉来逼人矣……太虚未免求禄仕，方应举求之也，应举不可必。窃为君谋，宜多著书，如所示论兵及盗贼等数篇，但似此得数十首，皆卓然有可用之实者，

不须及时事也。但旋作此书，亦不可废应举。”苏轼勉励他继续著书立说，并叮嘱他要吸取自己的教训，在文章中不要涉及时事。此时，秦观由于应举落榜有点心灰意懒。苏轼实事求是地劝告他仍当应举入仕，这既是养家糊口的手段，更是报效国家的途径，但应举不中也是常事，不必灰心。后来秦观听从了苏轼的劝告，于元丰八年进士及第，授定海主簿，蔡州教授等职。苏轼被召进京时途经金陵，特意向王安石推荐了秦观的诗文。王读后，也称赞“清新妩媚，与鲍（鲍照）谢（谢灵运）似之。”

秦观对苏轼极为崇拜，见识也高人一筹。在《答傅彬老简》中，他如此评论自己的老师：“阁下谓蜀之锦绮妙绝天下，苏氏蜀人，其于组丽也，独得之如天，故其文章如锦绮焉，其说信美矣，然非所以称苏氏也。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阁下论苏氏而其说止于文章，意欲尊苏氏，适卑之耳……中书之道，如日月星辰，经纬天地，有生之类皆知仰其高明”（《淮海集》卷三十）。傅彬老称赞苏轼的文章如蜀锦般华美，认为这是由于苏轼是蜀人，所以得天独厚。秦观以为此种说法固然很美，但是片面的。苏轼最伟大之处在于其德行崇高，才识卓越，足以担当国家重任。秦观对苏轼的认识确实全面、深刻、精到。可以说，知苏轼者，秦少游也！

晁补之字无咎，自幼即研读儒家经典，13岁师从当时名儒王安国，因而其著述深于经术。晁补之年少时随父亲晁君成任上，在杭州以《七述》谒见苏通判。其著作盛赞钱塘人物之盛丽，山川之秀异。苏轼也曾想作赋赞钱塘，读之叹曰：“吾可以搁笔矣！”称赞他：“于文无所不能，博辩俊伟，绝人远甚，必显于世。”

元丰二年晁补之“举进士，试开封及礼部别院，皆第一。神宗阅其文曰：‘是深于经术者，可革浮薄。’”（《宋史》）由于皇帝的赏识，晁补之遂名满天下，其议论文字在士人中亦风行一时。不久，朝廷召试学官，当时应试者数百人，而所录取只五人，晁补之即在其中，授北京国子监教授。

晁补之“性刚且果敢，勇于为义。其事亲，友兄弟，睦姻族，有人所不能为者……与人交无隐情，见事有不大于义者，必直告人，而受人之尽言，亦未尝愠也。”（张耒：《晁无咎墓志铭》）

他以恩师的为人处世准则，作为自己的榜样，而他的耿直不阿的性格确实如其师。晁补之曾云：“司马温公有言：‘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对人不可言者尔。’东坡云：‘予亦记前辈有诗云：怕人知事莫萌心。’此言予终身守之。”（《侯鯖录》卷三）

张耒字文潜，楚州才子，在这些门生中年龄最小。原先，张耒慕苏辙之名到陈州游学，成了他的门生。苏轼和苏辙许多事情不分彼此，因此不久张耒又拜苏轼为师。张耒给两位老师献诗《秋怀十首》，其一：“少年读诗书，意与屈贾争。口谈霸王略，锐气虹霓横。”他自述怀抱，诗书要与屈原、贾谊争锋，文论要有霸王的谋略，真可谓少年壮志不言愁。苏轼很欣赏他。

张耒身材魁伟，人戏称“肥仙”。他才气横溢，19岁即进士及第。《宋史》评论：“仪观甚伟，有雄才，笔力绝健，于骚词尤长。”张耒性格开朗幽默，又能虚心向师友学习，大家都很喜欢他。苏轼在密州修超然台，张耒为之作《超然台记》。苏轼称赞其人“超逸绝尘”，有秀杰之气；其文似苏辙“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元祐年间，史学家范祖禹在《举自代状》中高度评价张耒：“文章瑰玮，议论闳博，必能发挥典故^⑥，为国光华。”在四学士中，张耒的馆阁生活最长，前后八年，官至起居舍人。但他始终淡泊自适，过着“图书堆枕旁，编简自相依”的生活。

陈师道字履常，彭城人氏。苏轼评论其文“精深雅奥”，其人“高介有节，安贫乐道”。陈师道原先是曾巩的门生，苏轼知徐州时，他又拜于苏轼门下，受命作《黄楼铭》。熙宁中，王氏经学盛行，且作为科场考试唯一的参照范本。陈师道心非其说，遂绝意进取。苏轼对王氏新学也有非议，曾说：“王氏经学并非不善，而患在好使人同己……以孔子之尊，尚不能一统天下，何况王氏乎？”

陈师道性格耿介孤高，在文人中享有很高的声誉。敖陶孙《评集》云：“陈后山如九皋独唳^⑦，深林孤芳，冲寂自妍，不求赏识。”陈师道家境贫困，然傲骨铮铮，从不求助于贵人。秦观说他“伺候公卿之门者，殆难致也。”他曾在京城住了一年多，未尝一至贵人之门。时为枢密的章惇想见他，也不肯登门。后来御史中丞傅尧俞亲自去拜访他，知其穷，怀揣银子准备赠送给他。结果，听了他的议论，越发敬佩他，没敢把银子拿出来。

元祐四年五月，苏轼出知杭州，途经宋州，陈师道时为学官，没得到太守同意越境来见苏轼，并一直把老师送到宿州。本来，他已得到太学博士的任命，由于“擅去官次”，降为颍州教授。但他一点也不后悔，认为“惟其信之笃，所以行之不疑”。次年，苏轼出知颍州，两人共事半年，唱和甚多。不久，苏轼又出知扬州，陈师道上《苏公书》，表示“始终不相负”。由此可见，陈师道笃于情、厚于谊的感人格。

李廌字方叔，少长以学问称乡里，且能刻苦攻读，奋发图强。他年幼时即父母双亡，家贫无依，祖上三世三十六具灵柩未葬。人死后，古代讲究“入土为安”，李廌是孝子，为了募集资金安葬祖先遗体，常登贵人之门，向他们进献自己的诗文，甚至屈辱地当贵人的门客。

苏轼贬谪黄州时，李廌慕名以文章谒见。此时，苏轼已是无权无势的罪官，而他竟然来投奔，表明李廌是一个不畏惧权势的高尚青年。苏轼读了其文，称赞“笔墨澜翻^⑩，有飞沙走石之势”。接着，又抚其背说，“子之才，万人敌之，抗之以高节，莫能御矣。”既赞赏其文章，又提醒他要保持应有的气节，人穷志不穷。苏轼对李廌到处去求助于贵人的做法，自然不屑的，但也理解其为了尽孝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依然留他在雪堂读书。然而，此时作为贬官，他的俸禄微薄，生活艰难，无力资助李廌。由于自己忠孝未尽，无法安心求学，李廌不得不告别恩师，继续客游四方，以完成家事。苏轼无法挽留他，脱下自己身上一件半新旧的衣服送给他御寒，并作诗鼓励他。数年之后，李廌才将祖先的灵柩安葬在华山脚下，然后才闭门读书写作。

元祐初，苏轼回到朝廷，受到司马光的重用。李廌曾多次给苏轼写信，抱怨苏轼没能保举他入仕。苏轼答复：“君子之知人，务相勉于道，不务相引于利也。”鼓励他要靠自己的才学获得官职，不要依赖他人举荐入仕。诚恳地告戒他：“私意犹冀足下积学不倦，落其华而成其实。深愿足下为礼仪君子，不愿足下丰于才而廉于德也。若进退之际，不甚慎静，则于定命^⑪不能有毫发增益，而于道德有山丘之损矣。”希望他扎扎实实地做学问，切忌华而不实，不然，对改变自己的命运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严重地有损于自己的德行。

苏轼本人诗词文赋全能，且有杰出成就，但

在创作风格上，他并不要求门生同自己一致，反而鼓励大家创新，自成一家，因而苏轼门下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可喜景象。弟子们在文学上各有所长，风格各异，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黄庭坚以诗闻名，其诗自成一体，是“江西诗派”的开创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黄庭坚体”。世人往往以“苏黄”并称，然而在风格上两人大相径庭。黄庭坚非常重视创作技巧，提出了“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创作理论：“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答洪驹父书》）。“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惠洪：《冷斋夜话》）。他讲究诗句的锤炼和韵律，使诗歌更为凝练峭拔。苏轼评其诗“如精金美玉”。黄庭坚的诗歌创作题材，大都题咏山水，唱酬赠答，然出于其对民生的关注，也有一些反映民间疾苦的诗作，如《虎号南山》、《流民叹》等。前者作于熙宁元年将赴汝州途中。《虎号南山》题下注：“虎号南山，民怨吏也”，将暴政比作食人猛虎。“虎号南山，北风雨雪。百夫莫为，其下流血。”“相比暴政，几何不虎？父子相戒，是将食汝。”《流民叹》写于熙宁八年在叶县任上，反映了北方地震兼洪水泛滥等自然灾害中百姓流离失所、啼饥号寒的悲惨景象。他在太和县任上时，曾跋山涉水深入山区考察民情，亲眼目睹了百姓的穷困，在纪行诗《上大蒙笼》中写道：“穷乡有米无食盐，今日有田无米食。”这些现实主义的题材，同苏轼的《吴中田妇叹》、《荔枝叹》等杰作在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黄庭坚晚年由于历经坎坷，诗风变得质朴平易了。黄庭坚的作品有自编的《敝帚集》、《蕉尾集》和《退听堂集》等。

在书法上，宋朝素有“苏黄米蔡”合称的四大家。《宋史》论黄庭坚的书法：“其善行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黄庭坚的书法名篇是《诸上座帖》，同苏轼的书法名篇《寒食节帖》同样享誉当朝。

秦观以词作称于世，其词深受柳永影响，多吟诵男女情爱、抒发仕途失意，文字工巧精细，音韵优美。后人评论：“秦少游词，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加味”

(《词源》卷下)。即赞扬其词经得起咀嚼、推敲。一般人都认为在婉约词人中秦观“和婉纯正”，最正宗。其诗长于抒情，常常“以词为诗”。纪昀评：“观诗格不及苏黄，而词则情韵兼胜，在苏黄之上。”代表作《满庭芳·山抹微云》，写对青楼女子的恋情。晁补之说：“近来作者皆不及少游。如‘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虽不识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语言。”晁补之所评不虚。秦观词也有赞美人间美好爱情的，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最脍炙人口的是《鹊桥仙》：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此词借用牛郎织女一年一度鹊桥相会的神话故事，歌颂了天上人间美好的爱情。尽管牛郎织女只有一年一次的相聚机会，但他们的爱情无论神鬼都不能拆散。最后两句词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成为自古至今爱情地久天长的经典名句。秦观后期诗词也因仕途挫折，风格为之一变。后人评论：“少游过岭后诗，严重高古，自成一家，与旧作不同。”

秦观给人的印象似乎只是一个风流洒脱的词人，其实，他少年时也有报效国家的雄心壮志，认为“功誉可力致而天下无难事”。他喜读兵书，关心国防，写过不少策论，主要内容针对当时朝廷内政和边防。后世评论其策论：“灼见一代之利害，建事揆策，与贾谊、陆贽争长。”《宋史》论：“长于议论，文丽而思深。”

秦观著作有《淮海集》40卷，《淮海词》等。

秦观的书法也很有造诣，苏轼《跋秦少游书》：“少游近日草书，便有东晋风味，作诗增奇丽。乃知此人不可使闲，遂兼百技矣。技进而道不进，则不可。少游乃技道两进也。”苏轼称赞秦观的不仅仅是书法技巧的长进，而且强调他的德行也有进步。

晁补之以能文著称于世。张耒言，其“自少为文即能追步屈原、宋玉、司马迁、班固，下逮韩愈、柳宗元，促驾力鞭，务与之齐而后已”（《晁无咎墓志铭》）。黄庭坚也称其文“似太史公、班固，落落词高，有秦汉间风味。”后人称其道德纯而文字雅。确实，晁补之先道德后文章，完全符合苏轼对弟子的要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晁补之“古文波澜壮阔，与苏氏父子相驰骤”。

晁补之也颇负诗名。他自幼精通音律，其诗崇尚汉魏六朝，文词清丽，尤其擅长古乐府。其词成就比诗高。他以坦荡之怀，磊落之气写词，追随苏轼。当时，苏轼创豪放派词，文人鲜与同调，贬之为“不能歌，不入腔，不入律”。晁补之指出：“居士词，人谓多不谐律，然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受斋漫录》引）。他认为乃师使词摆脱旧乐曲之束缚，使词成为独立的新体抒情诗，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造。正因为如此，晁补之追随苏轼写豪放词，其词也以气势奔放见长。后人评：“学东坡者，必自无咎始。”晁补之词题材广泛，突破了“词为艳料”的藩篱，发展了豪放派词。其代表作：《摸鱼儿·东皋寓居》、《洞仙歌·泗州中秋作》。后者写中秋赏月，从天上到人间，又从人间返回天上。末尾“玉做人间”，天上人间浑然一体，意境开阔，想象丰富，气势酣畅奔放，与苏轼的中秋词《水调歌头》近似。不过，晁词略显清寂幽冷，不如苏词飘逸洒脱、乐观开朗。晁补之著《鸡肋集》20卷，词集6卷，《晁氏琴趣外篇》等。

张耒以诗文闻名。其诗风学白居易，关心民间疾苦。张耒吏治有方，像其恩师一样推行以民为本的善政。他在任上写了不少同情百姓疾苦的诗，《和晁补之悯农》，哀叹农民终年耕作犹饥寒而死的悲惨境遇。《八盗》写民间著名的八盗劫富济贫，因而深得市民喜欢。作者认为这些侠盗是官逼民反之结果，非常同情他们。其散文针砭时弊，包容古今，笔力雄健，深受苏辙影响。其主要著作有《鸿轩集》和《柯山集》。

陈师道以诗见长。他是“江西诗派”的开拓者之一，与黄庭坚并称“黄陈”。他与黄庭坚曾于元丰七年在颍昌相识，非常敬重黄庭坚，而黄庭坚也佩服他无畏清贫、刻苦创作的精神品格。由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陈师道自言其诗师黄庭坚，同以杜甫为榜样，不求谐俗。其诗体称“后山体”。黄庭坚评其诗：“豫章之诗，如其人，近不可亲，远不可疏。”谦虚地说：“及一见豫章，尽焚其稿而学之。”朱熹评：“后山雅健似山谷，然气力不似山谷较大，但无山谷许多轻浮底意思。”

陈师道有《后山诗话》一卷。《四库全书》评：“简严密栗，实不在李翱、孙樵之下……固不失为北宋巨手。”

(下转 40 页)

未尝一念忘此心（上）

——解读苏东坡的道家情结

王琳祥

内容提要：大量的原始资料表明，苏东坡自小好道，本不欲婚宦，只因父母所强，“一落世网，不能自遣”，但至老“未尝一念忘此心”。就苏东坡看来，人世间的虚名与微利，生带不来，死带不去，惟有修道得道，才是“死时将得去”者。

关键词：苏东坡 道家情结 解读

苏东坡是中国古代文人中最受人喜爱的一位，他的智慧和人格既令人仰慕倾倒，又使人望尘莫及，古今人众口一词，他是人间难得有二的旷古奇才。

纵观苏东坡的一生，饱经忧患，穷达多变。

苏东坡的一生之所以坎坷多难，用他的话说就是“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苏东坡之所以超然旷达，是因为他天生好佛好道，与佛、道两家有难解难分的因缘。

古往今来，人们对苏东坡的佛、道情结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说得婉转含蓄，但有的则说得直露浅白，归结起来，无非是说苏东坡是利用佛教、道教的理念来消磨他自己内心的不平。

苏东坡健在之时，有人对他将徐州云龙山人张天骥比作古之隐者的作法提出质疑，苏东坡回答说：“装铺席耳。”所谓装铺席，即是装饰点缀门面。苏东坡所说的话是发自他内心的，还是敷衍搪塞之词呢？苏东坡真的是在利用佛、道两教的理念来消磨他自己内心的不平吗？

本文仅就苏东坡的道家情结作一番探讨。

一、苏东坡交往的道家高人与朋友

苏东坡一生中所接触的道家人物不少，其中有名有姓者不下三十。按照其生命历程，可以作如下排列：

少年时代，有张易简、李伯祥、陈太初、送却鼠刀的山野之人、教诲苏东坡“少思寡欲”的隐者。

青年时代，有送缸砚的青羊宫滕道长、擅长轨甲卦影的费孝先、如痴如颠的李士宁。

签判凤翔时，有监宫张杲之、太平宫道士赵宗有。

治平熙宁年间，有助墓砖五万口的眉州奇士、天目山唐子霞道士、沈东老之子沈偕、广东潮州的吴复古、为苏迨布气的道士李若之、云龙山人张天骥、潜山王景纯、杭州表忠观钱自然通教大师。

谪居黄州时期，有张憨子、眉山道士陆惟忠、黄照道人、绵竹杨世昌道士、筠州丐者赵吉、庐山玉涧道人崔闲、九江胡洞微道士、梁冲道人。

流寓江淮时期，有庐山开元观道士、简寂观道士、白鹤观道士、九江胡洞微道士、梁冲道人、梁湛然道士。

元祐更化时期，有乔全、晋水部员外郎贺亢、蹇拱辰道士、钱自然道士、武道士、吴复古、云龙山人张天骥、丹元子姚安世道人。

谪居惠州时期，有广州崇道大师何德顺、罗浮山冲虚观道士邓守安、冲虚道士陈熙明、惠州贾道人、何宗一道士、陆惟忠道士、吴复古、三茅山隐士刘宜翁、惠州邹葆光道士、黄睢道人、海上道人。

儋州谪居时期，有都峽山道士邵彦肃、吴复古、何德顺道士、司命宫杨道士、王公辅。

北归途中，有钱世雄、都峽山道士邵彦肃、

广州道士何德顺、吴复古、术士谢晋臣、隐士阳孝本、永和清都观道士谢子和、玉涧道人崔闲、九江道士胡洞微。

在众多的道家高人及隐士中，苏东坡与之关系最为亲密的有张易简、陈太初、李士宁、胡洞微、杨世昌、赵吉、姚安世、邓守安、吴复古与邵彦肃。

张易简，是苏东坡与道家结缘的启蒙者。

陈太初，是苏东坡童年时代的同学，后得道升天。

李士宁，是慧眼独识苏东坡能制策登魁的预言者。

胡洞微，是苏东坡的患难之交。

杨世昌，是苏东坡谪居黄州时期人生境界升华的催化者。

赵吉，是苏东坡对道家尸解、蝉蜕、白日飞升从疑到信的实践者。

姚安世，是苏东坡心目中李太白的后身。

陆惟忠，是苏东坡家乡的道家诗友。

邓守安，是深得苏东坡敬重的有道者。

吴复古，是苏东坡在患难之中给予极大慰藉的仰慕者。

邵彦肃，是苏东坡晚年相识的尤重情义的修道者。

当我们再将以上有道者进行比较，杨世昌、邓守安和吴复古为苏东坡浓郁的道家情结注入了鲜活的生机……

二、苏东坡耳闻目睹并且亲身经历的道家异事

家异事

苏东坡天生具有慧心与道根，一生中耳闻目睹并且亲身经历的道家异事实在是太多：

苏东坡在年青的时候，自称“山野之人”的隐士送给他却鼠刀，却鼠刀的却鼠功能令年轻的苏东坡为之惊叹。

眉州青神县石佛镇南的一口水池中，世传有鲤鱼两条在其中，但见者不是很多，然而苏东坡在第一次游玩时就看到了这百年不遇的奇观。甚至在妻兄王愿绝不相信此事时，苏东坡带着王愿来到池边祷告，奇景得以再现……

苏东坡十四岁时做的一梦，在十四年后梦境

成真。这个预示苏东坡他日文章必为天下第一的先兆之梦，苏家父子三人当时皆不知其寓意何在。当十四年后梦境成为现实，主考官一句“君是大吴”的奇妙之语，使苏东坡明白了人世间的万象皆有定数，非人力所能逆转。

如果说苏东坡在走上仕途之前所遇到的道家异事起到了加强苏东坡道家情结的作用，那么苏东坡签判凤翔时在终南山上清太平宫虔心地通读道藏，则是他从理性上对道家修炼实质性认识的开始。苏东坡的道家情结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无疑是一次脱胎换骨的升华。

走上仕途的苏东坡一生中多次亲身体验求雨得雨的奇异感受。当他第一次因凤翔境内大旱求雨于太白山时，他的心情异常激动，他真正体悟到人的精诚确实能感动上苍，这个世界神灵无处不在。

当天圣八年进士、官至参知政事的眉州彭山人孙抃辞世之时，苏东坡用他的笔记下了善恶得报出自一念之间，及第与落第者绝非偶然。在大雪封山之日，与孙抃一同赴京赶考的宋筹见一老太婆独坐于雪中的牌墩之下，竟无一丝怜悯之意，策马而过。然而在他身后的孙抃却赶快下马，来到老人家面前问寒问暖，且将自身的数百钱全部送给了老太婆。当年，孙抃进士及第排名第三，而宋筹则名落孙山，且老死无成……

签判凤翔之日，苏东坡吃到了永乐无核枣一枚，而能得食无核枣者，数百年间只有唐代开元年间的得道者侯道华。“唐永乐道士侯道华，窃食邓天师药仙去。永乐有无核枣，人不可得，道华独得之。予在岐下，亦尝得食一枚。”这是苏东坡自己的记述，相信他不会是无中生有。

苏东坡的父亲即将安葬，时日迫近但墓砖不足，这在当时是一件棘手的事情。眉山人告诉苏东坡眉州有一奇人，可往而求之，或许有解救的办法。苏东坡亲自到那奇人的住所，虔诚地恳请高人相助。安葬父亲的日子就在第二天，而当晚却未见一丝动静，一向深信不疑道家高人的苏东坡正有所茫然无措之际，五万口墓砖整整齐齐地出现在他的眼前。这样的奇异之事，就是一般人也会想到绝非人力之所为……

当奔赴密州太守任的苏东坡经过常州毗陵之时，与归安人沈偕相遇，得知他的父亲沈东老在隐居湖州东林以酿酒为乐之时，八仙之一的吕洞宾曾在其庵酒醉之后，以石榴皮书诗于壁上说：

“西邻已富忧不足，东老虽贫乐有余。白酒酿来因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吕洞宾题壁，世传不少，唯北宋人亲历此事者，似乎不多，苏东坡在感慨万千中，以吕洞宾题诗之韵，和诗一首，以寄情怀。相信此事也不会是苏东坡杜撰。

在密州，苏东坡遇上了旱蝗相继的天灾，当苏东坡第一次以地方最高长官的身份作祝文祈祷于常山之时，大雨应时而降。苏东坡于欣喜中掉头盖冒雨而行，却正好被得道不死的晋水部员外郎贺亢亲眼目睹，贺亢认准了苏东坡是可以传道的人选，只是考虑苏东坡这个人修道恒心不足，故而放弃初衷。

在徐州太守任上的苏东坡，因中子苏迨身体虚弱，道士李若之为之布气。当日，苏迨与李若之相对而坐，李若之发动自身的真气，使得苏迨感觉到自己的腹中如初日所照，温然舒适。这种最为现实的举动，证实了李若之道家功法非同一般。

徐州云龙山人张天骥是一位有道的隐士，苏东坡任徐州太守之日，与其交往最深。然而最使苏东坡敬慕的是他的父母。其父张希甫时年七十，辟谷道引，目瞳子炯然。其母尊佛崇道，能写一手好字，其笔迹绝不同于一般的女子。

当弃官不作、年已七十四岁的王景纯（仲素）自潜山来彭城看望苏东坡时，苏东坡从他修行的境界发出了“养气如养儿，弃官如弃泥。人皆知子拙，事定竟谁迷……苦恨闻道晚，意象飒已凄。空见孙思邈，区区赋《病梨》”的感叹……

元丰年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谪居黄州四年多时间。就是在这个有职无权、不得签书公事的被贬时期，苏东坡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修炼和与道家高人的交往之上。

麻城故县张憨子，这是一个十足的异人，佯狂垢污，寒暑不能浸，行止如狂人，见人辄骂“放火贼”，见纸辄书郑谷诗，人使力作，终日不辞。冬夏布褐，三十年不换，走近却不觉有垢秽之气。张憨子以乞讨为生，却从不接受别人的钱物。达官贵人闻其名，求见而不可。然而，苏东坡一请即到。只是见到苏轼后，立而不言，问而不答，使之坐，不可，唯俯仰熟视传舍之堂，久之而去。聪明绝伦的苏东坡一时间竟难窥其妙。好在其弟苏辙帮他悟出了“得罪南来正坐言，道人闭口意周全”的玄机……

苏东坡谪居黄州，亲历了两次天神附着箕帚与人问答的奇异之事。

第一次是元丰四年正月初紫姑神降于郭氏家中。紫姑神，姓何名媚，其言如响，且擅长赋诗舞蹈，与苏东坡对答如流，诗数十篇，敏捷立成，皆有妙思，杂以嘲笑。问其神仙鬼佛变化之理，其答皆出于人的意料之外。就苏东坡看来，紫姑神见掠于酷吏，而遇害于悍妻，其怨虽深，而终不指言酷吏之姓名，实为有礼者；客至逆知其平生，而终不言人之阴私与休咎，可谓智者；又知好文字而耻无闻于世，实为贤者。故而应其请作文两篇，赋词一首，旨在彰显紫姑神何媚的灵异。

第二次是元丰五年正月二十日天人降于农夫汪若谷家与人问答。与紫姑神不同的是，这位神祇自称“天人李全，字德通，因汪若谷再世为人，特降汪家”。令人拍案称绝的是，有个叫张炳的黄州进士当日在场，若干年前与这个自称“李全”的后身刘苞还有一段交往，两个人在京城相识的往来过程，李全说得毫厘不差。天人李全用古老的篆书为苏东坡书写了一幅《天蓬咒》，苏东坡力请李全以隶书解释，李全执意不可。苏东坡为此作《天篆记》一篇，并写诗一首，旨在彰显天人李全的奇异。

元丰五年（1082）五月，四川绵竹道士杨世昌自庐山来黄州看望苏东坡。杨世昌字子京，善画山水，能鼓琴吹箫，晓星历骨色及作轨革卦影，精通黄白药术，且酿得一手好酒。杨世昌的到来，给谪居黄州的苏东坡带来了许多的欢乐。

苏东坡谪居黄州期间，从侄女婿曹焕的口中得知光州道人朱元经的轶闻趣事不少；从房州通判许安世的来信中，知道房州人三朵花乃得道仙人；从四川眉山陆惟忠道士的谈话中，获知同学陈太初得道升天的消息；从赵吉的身上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得道者往往不显山不露水，多以恶言秽行自晦……

元丰八年（1085）六月，苏东坡获得官复朝奉郎、起知登州军州事的告命。登州的海中常有海市，苏东坡素闻其事，恨无缘一见。当他抵达登州之时，因是当年的十月，错过了观赏海市的季节。就在这时，朝廷以礼部郎中召还京师的诰命下达，到登州仅有五天时间的苏东坡真的不想放弃这个机会。他虔诚地祈祷海神广德王之庙，恳请海神能破例呈现奇景，让自己一饱眼福。精

诚所至，金石为开。海神满足了苏东坡的大愿，十月二十一日，正是岁寒水冷天地闭塞之时，登州海面上真的出现了海市的奇观，登州人大为惊叹。

元祐年间，苏东坡的仕途青云直上，走向了他一生中的巅峰。在此期间，苏东坡也耳闻目睹了不少道家的奇异之事。

首先，他获知在兴国军被骏骡踢死的乞丐赵吉出现在四川云安，并托人带信问候自己。当挖开赵吉的坟墓，开棺时却不见赵吉的尸体。古人的传说，史书的记载，道藏中记述得道者尸解、蝉蜕的故事居然成为现实，苏东坡从过去的半信半疑中一下子明白了。

在京城，道士李德柔为他画像，李德柔的身世富有传奇性。他的前生也是个道士，名叫尹可元。尹可元善长画像写真，因为一次失火得罪，当判死刑。当时的汉州太守是驾部员外郎李宗固，李宗固因惜其才，故意缓其死刑。时遇朝廷大赦，尹可元因此获得释放。尹可元当年八十一岁，发誓自己下世投胎必为李氏之子以报李宗固大恩。尹可元死后二十余年，李宗固的儿媳一日梦尹可元入其室，其后生下一子，取名得柔，小名蜀孙。德柔幼而善画，长大后喜读老庄之书，遂出家为道士，赐号妙应。李德柔十分孝顺母亲，以孝谨闻名遐迩。

李德柔为苏东坡画像之后，苏东坡在《赠李道士诗并叙》中详细地记述了以上所说之事，并在诗中说：“千年鼻祖守关门，一念还为李耳孙。香火旧缘何日尽，丹青余习至今存。”诗中的鼻祖指的是尹喜。诗中的李耳，指的是老子李聃。李聃曾应尹喜之请，书《道德经》五千言而出函谷关。苏东坡认为李道士前生姓尹，今生为李氏子，皆为道士，故用尹喜、李聃之事相比，其寓意非常明了。

当年十二月，得道者乔全来到京师。与苏东坡相聚十余日后，急欲到蒙山与其师贺亢相会。乔全告诉苏东坡，他的师父贺亢原是晋水部员外郎，得道多年，旧日曾在密州常山见过苏东坡一面，认定苏东坡是一个可以授道的人选，他曾多次与乔全提起苏东坡。苏东坡于感慨中写了六首诗，一首赠给乔全，另外五首请乔全转交贺亢。事后，乔全复来京城，出贺亢手书说：“将使若人通言于君。”

苏东坡出守颍州之日，因颍州当年秋日大旱，

苏东坡曾沐浴斋戒遣中子苏迨随州学教授陈师道祈雨于昭灵侯龙公张路斯，并亲作《祈雨迎张龙公祝文》。

龙公张路斯，据唐人赵耕《张龙公碑》记载，为隋代初年人，家于颍上县仁社村。十六岁时中明经第。唐景龙年间为宣城令，以才能闻名遐迩。生有九子。罢任归乡，常垂钓于焦氏台之阴。一日，偶见垂钓之处有楼台亭阁，遂独居之。自此每日夜出旦归，归辄体寒而湿。其妻石氏惊问其故，张路斯回答说：“我，龙也。蓼人郑祥远者，亦龙也。近日与我争夺地盘。明日决战，让九子助我。领系绛绡者是我，系青绡者郑也。”翌日，九子以弓矢射中系青绡之龙，龙怒而去，至合淝之西山而死，化为龙穴山。张路斯及其九子因此皆化为龙。其夫人为关州人，死后葬于关州。自景龙年间以来，颍州人世世代代祭祀于焦氏台。北宋熙宁年间诏封昭灵侯，封其妻石氏为柔应夫人。欧阳修亦有专文记述此事。

苏东坡因求雨遂意，遂修葺其庙，并率众迎张路斯之龙骨于西湖之行祠，作《昭灵侯庙碑》，以彰显其灵验有应。

颍州本欧阳修致仕休养之地。苏东坡在颍州，一日与欧阳修的儿子欧阳忞、欧阳辩兄弟俩谈起道人徐问真的奇异之事。徐问真，潍州人，与欧阳修的友谊深厚，嗜酒狂肆，能啖生葱鲜鱼。以指为针，以土为药，治病良有神验。苏东坡曾亲耳聆听欧阳修所谈徐问真的许多奇异之事，在谪居黄州时还曾用徐问真的咒诀治愈了黄冈县令周孝孙暴得的足肿之疾。此咒诀是欧阳修亲自转授给苏东坡的。

苏东坡在赴定州太守任的前夕，侄女婿曹焕前来送行。交谈中，他告诉苏东坡，自己在过蔡州壶公观的时候，八十七岁的老道长刘道渊给他讲述了欧阳修乃得道者。欧阳修曾经馈赠一件道袍于刘道长，刘道长穿了三十年，破了就补，从不洗涤，但从未有垢污之气。刘道长与曹焕说自己将于某月某日化于石上之后闭口不言。曹焕是日入山，果见刘道长如期在石上坐化。

苏东坡与其弟苏辙皆为欧阳修门生，曾听欧阳修讲过自己与谢希深、尹师鲁、梅圣俞数人同游嵩山时，见苔藓书四个大字于悬崖绝涧之上，曰“神清之洞”。同游者尹师鲁也看到了这一奇异景观。欧阳修因此时常自疑本世外之人。

(下转 59 页)

寻找东坡

张龙飞

内容提要：以苏轼诗文、历史文献为主要依据，实地踏访当下的黄州城，追寻东坡的足迹，寻找东坡的遗址，拂去历史的尘埃，领略东坡的风神。

关键词：黄州 东坡 足迹

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一日，苏轼来到黄州，寓居定惠院，沐浴安国寺，迁居临皋亭，斋戒天庆观，躬耕东坡，亲建雪堂，自号“东坡居士”，泛舟赤壁，夜游承天寺，写下了700多篇诗词文赋，既达到了个人文学艺术创作的巅峰，也为黄州留下大量的东坡胜迹。

岁月沧桑，斗转星移。920年后，黄州已不复当年之貌，东坡雪堂、定惠院、临皋亭早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专家们陷入了无尽的争论，而怀苏者们却因为无法追寻东坡先生的足迹，只能留下遗憾。带着这个疑问，我和几位黄州苏学爱好者，带着明、清黄州府城地图踏上了寻找东坡的历程。

北宋黄州城

北宋初年黄州刺史王元之在《黄州谢上表》中说：“黄州地连云梦，城倚大江。”在《月波楼咏怀并序》诗中记述：“齐安古郡废，移此清江头。筑城随山势，屈曲复环周。兹楼最轩豁，旷望西南陬。武昌地如掌，天末入双眸。平远无林木，一望同离娄。山形如八字，合会势相勾。三国事既远，六朝名亦休。远从唐未来，争夺互相仇。斯楼备矢石，此地控咽喉。终朝望烽燧，连岁事戈矛。”

苏东坡《送任佖通判黄州兼寄其兄孜》：“黄州小郡夹溪谷，茅屋数家依竹苇。”苏门四学士、北宋文学家张耒曾经在黄州生活了八年，他在《明

道杂志》中记述说：“黄名为州，而无城郭，西以江为固，其三隅略有垣壁，间有藩篱，城中居民才十二三，余皆积水荒田，民耕渔其中。”

另据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黄州府志》记载：“本府城，宋元在今城南二里许，西临大江，东傍湖泊，水涨淹没。本朝甲辰年指挥黄荣于此展筑，洪武十七年指挥曹奉、永乐六年指挥郭显，前后修理高二丈一尺，周围一千八百二丈八尺五寸，绕以壕堑，为门四，东曰清淮、南曰一字、西曰清源、西北曰汉川。”由这些文字记述，我们得出四条结论：

1. 宋城随山就势而建。限于当时的经济条件，宋代黄州城随山就势而建，北部的赤壁山、聚宝山是非常好的屏障。

2. 宋城很简陋。特别是北宋时还没有建成高大的城墙，主要是垣壁和藩篱，还不具备战争防御功能。城的西边倚江而建，东边傍湖泊，南边比明城多二里。

3. 宋城很落后。城中居民和建筑物不多，很多地方还是农田和池塘。

4. 现存黄州古城遗址是明城。据明、清两代《黄州府志》所载，现在的黄州古城遗迹不是宋城，而是明城，包括汉川门、清淮门、一字门和清源门都是明朝定下的，明城高大坚固，具备战争防御的功能。

明代黄州城

由于资料的缺失，宋城的范围还难以确定，我们决定先寻找明城墙遗迹，再推算宋城的大致范围。

黄州古城墙始拆于民国，解放后陆续拆毁，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城门还存在，许多老市民都清楚城门城墙的位置，这让我们的考证工作变

得十分轻松。

从汉川门出发，沿着古城墙，来到沙街，走进清源门居委会院子。几位热心的老市民听说我们考察古城墙，非常热心的告诉我们，黄州区装卸公司与东坡足疗堂之间、横跨沙街就是当年的清源门所在地。在黄州区装卸公司院内，我们发现残存一段30余米的古城墙，可惜墙上墙下建满了房屋，没有人保护，墙砖也任人随意拆毁。

清源门外是濠沟路，过去是古城墙外的濠沟，即护城河，现在是一个菜市场和小商品市场。濠沟路有一排房子刚好拆完，正在打桩施工，施工现场就在高大的城墙下。沿着濠沟路走到尽头，就是位于考棚街口的市卫生防疫站，一字门旧址就位于市卫生防疫站大门口与区教育局宿舍区之间。绕到八一路，我们在三医院房子后面看见一段高高的岸墙，这就是位于地区医院内的古城墙遗迹。

穿过胜利南村，来到位于胜利街的市邮政局宿舍区，两位老人告诉我们，清淮门（俗称东门）位于银海商场与市邮政局宿舍之间、横跨胜利街。清淮门的地势比现在高一些，在八十年代初因交通需要，将银海商场到市邮政局间的胜利街进行了降坡处理。清淮门向北是胜利北村和市政府宿舍区，市政府宿舍区东边是一段高高的砖岸，高岸下是市体校田径场。站在这里，我们豁然明白，市政府位于龙王山脉，对面的黄冈师范学院老校区位于聚宝山脉，两山之间是山谷，也就是现在七一水库和市体校田径场。估计在宋代，两山之间有小溪，有的地方甚至积水成塘，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这里还是水田和水塘。

对照古今地图，我们发现现在的黄州老城区实际上还是明城的格局，主要是沙街、青云街、考棚街和胜利街，城北是龙王山，城西是长江，城南是濠沟路和八一路，城东是体育路。

我们认为，宋朝限于经济条件，只能依山就势建城，城的范围只可能比明城略大。明朝修建了高大的城墙，因为经济原因，它只好收缩范围，比宋城要小。因此黄州府志记载，宋城在明城南二里，估计宋城南墙处在八一路和西湖一路之间。

柯山和黄冈山

明确了宋城的大致范围，还必须明确几个确

切的参照物。赤壁、龙王山、聚宝山、长江和安国寺是无可争议的坐标，但只有这些还不够。

于是，柯山和黄冈山进入了我们的眼帘。

明弘治《黄州府志》：“定惠院，在府治东南。苏子瞻尝寓居，作《海棠》诗以自述。院废。弘治庚申得故址，其茂林修竹，园池风景，宛如苏子所言者。因筑亭以彰胜，概匾曰‘坡仙遗址’。东曰扞腹轩，西曰揩目轩，用诗中语也。”施元之注《东坡八首并叙》云：“东坡，在黄冈山下，州治东百余步。”

建筑物易毁，山形难以改变，尤其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黄州，历史上没有足以消灭山脉的工程。我们穿过八一路，实地勘察了黄冈中学老校区、市工商局宿舍区（原黄冈军分区教导队）、火神庙、安国寺、落星台小区、市自来水公司、市缫丝厂、八一小区、定花院小区等地，发现这一带有两座山岗，一座山岗位于宝塔大道的东边，一座山岗位于宝塔大道的西边。对照明清黄州府地图，我们判定东边的是柯山，即市自来水公司至定花院小区；西边是黄冈山，即黄州区八一小学到安国寺。

实际上，整个黄州城就坐落在山上，城北是赤壁山、两耳山、龙王山、玉矾山、聚宝山，城南是柯山和黄冈山，城中有十八坡、十三坡等等，不过因为城市的发展，房屋遮掩了山体，只要有心，在很多房屋后院可以看见高坡和高岸。黄冈之所以得名，府志记载一种说法，是因黄冈山而得名。

定惠院

苏轼初到黄州住在定惠院，定惠院是一个小庙，非常破落。

由于获罪遭贬，他刚来黄州时心情非常落寞，也怕惹是生非，经常白天睡觉，夜晚出行。“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这首名作就是他寓居定惠院，夜晚出游而作。现在有一首流行歌曲，叫《寂寞沙洲冷》，周传雄演唱的，就是这首词。

至于定惠院的地址，苏轼在《上巳日，与二三子携酒出游，随所见，辄作数句。明日集之为

东坡、雪堂

诗，故辞无伦次》中说：“柯丘海棠吾有诗，独笑深林谁敢侮。”文中的海棠诗是指《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由这两首诗可知，海棠长在柯山，定惠院就在柯山的西侧。

经过我们现场勘察比较，柯山的顶峰大约在市缫丝厂内，定惠院应该在现在的市自来水公司院内。

临皋亭

临皋亭又名回车院，宋时为驿站。元丰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苏轼的家眷二十多人来到黄州，由定惠院迁居临皋亭。

苏轼在《次韵和王巩六首》记载：“我来黄冈下，欹枕江流碧。江南武昌山，向我如咫尺。”《临皋闲题》：“临皋亭下不数十步，便是大江。”《答秦太虚书》：“所居对岸武昌，山水佳绝。”《记赤壁》：“黄州守居之数步为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处，不知果是否？”由这些记载可知：临皋亭在黄州城西、长江主干道边，亭下是江水，对岸是武昌的西山，离赤壁大约一里路。

北宋许端夫在《齐安拾遗》中记载：“夏澳之侧，本水驿，有亭曰临皋。郡人以驿之高坡上筑南堂，为先生游息。”南宋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记载：“夏澳，在州之西南二里许。夏英公守是州，凿水入陂以藏舟，名曰夏澳。……东坡故居，即今之临皋亭及临皋馆，后又居雪堂。……临皋馆，在朝宗门外，元名瑞庆堂，以故相秦公桧之父舣舟其下，秦公于是乎生。又有临皋亭，东坡曾寓居焉。”夏英公即夏竦，北宋名臣，曾任黄州太守。二者所记与苏文所载完全相符，又有赤壁和长江为参照，我们又详细考察了黄冈中学老校区，完全同意黄冈学者们的普遍意见，即临皋亭应该在黄冈中学东侧围墙所在的高阜上，学校花园内的临皋亭是现代修建的，不是原址恢复。

南堂在临皋亭南，面向西南方向，有三间房子。这些由苏轼《南堂五首》：“江上西山半隐堤，此邦台馆一时西。南堂独有西南向，卧看千帆落浅溪。”和《与蔡景繁十四首》：“临皋南畔，竟添却屋三间，极虚敞便夏，蒙赐不浅。”所载即可知之。

苏东坡因躬耕东坡而得名，但东坡的原址也是大家争论最多、最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焦点。

为了慎重起见，我们首先查阅了陆游的《入蜀记》。《入蜀记》是陆游在苏东坡离开黄州八十年后入川而作的游记。《入蜀记》中记载：“（八月）十九日早，游东坡。自州门而东，冈垄高下，至东坡则地势平旷开豁。东起一垄颇高，有屋三间。一龟头曰‘居士亭’，亭下面南一堂颇雄，四壁皆画雪。堂中有苏公像，乌帽紫裘，横按箠杖，是为雪堂。堂东大柳，传以为公手植。正南有桥，榜曰‘小桥’，以‘莫忘小桥流水’之句得名。其下初无渠涧，遇雨则有涓流耳。旧止片石布其上，近辄增广为木桥，覆以一屋，颇败人意。东一井曰‘暗井’，取苏公诗中‘走报暗井出’之句。泉寒熨齿，但不甚甘。又有‘四望亭’，正与雪堂相直。在高阜上，览观江山，为一郡之最。亭名见苏公及张文潜集中。坡西竹林，古氏故物，号南坡，今已残伐无几，地亦不在古氏矣。出城五里，至安国寺，亦苏公所尝寓。兵火之余，无复遗迹。惟绕寺茂林啼鸟，似犹有当时气象也。”游记中对东坡雪堂一带有详细记载，但文中“自州门而东”一句，学者们有不同的见解，有的认为此门是黄州城的东门，应该是出了东门，所以东坡在东城外；有的认为此门不是东门，实际上是临皋亭附近的门（西南方向），应该是自此门向东至东坡，游完之后再出城五里到安国寺，所以东坡在城中。我们反复推敲，如果仅从字面理解，还无法判断东坡在城外还是城中。

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东坡先生的话。苏东坡在《东坡八首并序》中说：“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余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与章子厚二首》：“仆居东坡，作陂种稻，有田五十亩，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与子安兄》：“近于城中得荒地十数亩，躬耕其中。作草屋数间，谓之东坡雪堂。”《与蹇授之六首》：“近于城中葺一荒园，手种菜果以自娱。”从这些记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东坡在城中，不是在城外；东坡是故营地，营地一般也应该在城内；东坡是荒地，面积为五十亩。

（下转 38 页）

三苏遗迹考略一二

乔建功

内容摘要:本文引证 1972 年苏适夫妇合葬墓考古发掘的文献资料,证实了笔者关于苏坟葬法推理的正确性,同时缜密地考证了三苏坟的沿革和“苑中碑”的年代定位

关键词:三苏坟 考古 葬法 正确 沿革 苑中碑 年代

名扬千古的苏东坡生在四川眉山,葬在河南郟县。地以人贵,千百年来,三苏坟为郟县平添了几多光彩。青山有幸埋忠骨,苍柏无语寄深情。九百年世事沧桑,几经风雨,几度兴衰,郟县人民始终视三苏坟为荣幸,为骄傲,视之如传家之宝,悉心呵护,倍加珍爱,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喜看今日之三苏坟,北枕巍巍嵩岳,南带潺潺汝水,苏轼塑像矗立峨眉山颠,凝视西南,乡思绵绵,飘然欲仙。其脚下的东坡湖,构形奇特,蕴意殊多,山水映照,情深无限。通向坟院的神道两旁四株古柏,苍翠挺拔,浓荫如盖,石人、石马、石羊、石虎等翁仲侍立。大门两侧,石狮雄踞,威严守护。坟院内,584 株参天古柏,郁郁葱葱,遮天蔽日,清风不起,簌簌有声,三冢隆起,东北西南向一字排列。坟墓之前,祭坛方正,飨堂内外,题咏纷呈。整个坟院,庄严肃穆,身临其境,敬意油然而生。郟县三苏祠,碑碣林立,翠竹摇曳,红墙绿瓦,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这里是诗,这里是画,这里是启人才智的宝地,这里是令人神往的圣土,同时,这里还有说不完的故事和解不完的谜。

一、有力的佐证

三苏坟的葬法历来是个说不清的话题。笔者在拙作《探秘郟县三苏坟》(下简称《探坟》)一文中曾提出,根据坟院外神道西的迟夫人梁氏墓和神道东的适(音括)夫妇合葬墓,推断苏家子辈坟墓的排列是夹棺葬法。因为迟夫人梁氏是苏辙的长媳,排行为伯,苏适是苏辙的次子,排行为仲,而今适夫妇合葬墓在右首上方,迟夫人梁氏墓在左首下方,肯定不是排棺葬法,只能算是夹棺葬法。照此推断,苏辙的三儿媳——八郎妇黄氏的坟墓应该在梁氏墓西四十米处,那么,苏轼一房三子的坟墓就应该排在适夫妇合葬墓以东

120 米以内。这样,苏家子辈六个坟墓和坟院内三个主坟的中轴线就向东偏离 45 度左右,所以说三苏坟取向是乾巽向,也即西北东南向。既然整个坟院是西北东南向,那么三个主坟为何呈东北西南向排列,这个千古之谜,也就顺理成章迎刃而解了。

《探坟》一文在《苏轼研究》2009 年第 2 期发表,颇谙堪輿学的挚友王君阅后说,这是对三苏坟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从理论上说,这种观点是合理的,足以自圆其说。但从苏坟现场实地情况看,适夫妇合葬墓东不远处就是小峨眉的东山梁,还能排得下苏轼一房三子的坟墓吗?答曰,不要忘记,坟院是乾巽向,三个主坟呈东北西南向排列,那么,六个子辈坟墓也应该是东北西南向排列,这样一来,坟地位置岂不绰绰有余了吗!王君沉吟有顷,不禁点头称是。此时,我不觉贸然请教道,“照此说来,恐怕三苏坟里遗骨的方向也是东北西南向了么?”王君笑而未答。自己内心也不觉发憷:此说通否?

说时无心,过后留意。蓦然想起苏适夫妇合葬墓是 1972 年发掘的,是否有蛛丝马迹可寻。几经周折,终于找到《文物》1973 年第 7 期李绍连写的《宋苏适墓志及其他》。此文详细记载了苏适夫妇合葬墓的发掘过程,墓的方位、尺寸、构造,所见遗物及墓志的形状、大小及内容等,完全是权威性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其中明确记载“苏适墓的方向为南偏西 87°。距地表 2.15 米,墓道长 12 米,宽 1——3.6 米。”对此反复咀嚼,不觉心跳怦怦。南偏西 87°,尽管偏西的度数大一些,但不还是东北西南向吗!不期言中,实属偶然,也非偶然。从苏家子辈坟墓排列是夹棺葬法,推出坟院是乾巽向,证明三个主坟呈东北西南排列是合理的,从而得出遗骨也应该东北西南放置的一系列推论观点,经考古发掘证实是正确的。此论在《文物》李文中找到有力佐证,如释重负,深感快哉!

二、三苏坟沿革考

苏轼葬郟,始称苏坟。苏辙葬郟后,遂称二苏坟。县尹杨允增筑苏洵衣冠冢,方称三苏坟。由苏坟演变为二苏坟,事关苏辙葬郟时间,似有

考证的必要。

《中国名胜词典》说“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暴病死于常州，次年移葬于此。苏辙在轼死后十一年卒于许昌，其子孙将其葬此。……此处的苏洵墓系元代至正年间（1341—1368）县尹杨允所置的衣冠冢。”①《郟县名胜古迹》说“政和二年（1112）苏辙卒于颖昌，其子将之与苏轼葬于一处，称‘二苏坟’。元至正十年（1350）冬，郟城县尹杨允到苏坟拜谒，……遂置苏洵衣冠冢于两公冢右，这样，原来的二苏坟就成了三苏坟。”②不少有关三苏坟的材料，基本上都是这种说法。果真如此吗？

《栾城集》记述，政和二年“十月三日，辙卒，年七十四”。③有关苏辙去世一条，仅此十字。在政和七年辙夫人史氏去世时说，“三月二十五日，夫人史氏卒，同葬汝州郟城县上瑞里。”④

值得注意的是，此《苏颖滨年表》下注左奉义郎赐绯鱼袋孙汝听编。孙汝听是四川眉山人，和三苏父子是同乡，南宋绍兴中进士，上距苏辙逝世不久。他一生治学严谨，著述颇丰，著有《三苏年表》、《眉州古志》、《成都古今前后记》、《韩愈文集注》、《柳宗元文集注》等，是学问大家。清人缪荃孙在《苏颖滨年表跋》中说：“此书记载翔实，究胜于后代所著者。”古往今来，孙汝听的《苏颖滨年表》是研究苏辙生平可信用度较高的文献资料。

孔凡礼所著的《苏辙年谱》在谈到苏辙的后事时说，政和二年，“十月三日，卒，年七十四。”⑤这里仅仅九字。在谈到辙夫人史氏去世时说，政和七年（1117）“三月二十五日，夫人史氏卒，同葬汝州郟城县上瑞里。”⑥

孔凡礼先生是当今苏学研究领域里的权威大家，学富五车，众望所归。他所编著的三苏年表，斟字酌句，言出有据，集历史各种版本之大成，博引史料之浩繁，论证史实之慎密，都是空前的，令人无不叹服，是目前研究三苏的经典文献。

两位大师明明白白告诉我们，苏辙政和二年十月三日卒，享年七十四岁，五年后，政和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史夫人去世时，一同安葬在汝州郟城上瑞里。在汉语里，“卒”和“葬”是两码事。“卒”即人死了，“葬”埋葬也。古时候，人死了，不一定马上安葬。尤其是在宋代，人死后，三五年或十年八年安葬者司空见惯，终身不葬者也不乏其例。很显然，苏辙政和二年死后没有马上安葬，直到政和七年，史夫人去世，才一同安葬在郟城上瑞里。

另外《苏东坡在中原》载，“政和三年（1113）十月，刘安世撰《门下侍郎苏公（辙）墓志铭》，文见，安徽石·太两邑《苏氏族谱·卷六》”。⑦尽

管近年有关人士指陈此墓志铭有诈，但是从撰写时间上看，苏辙死后的次年有人为他撰写墓志铭，从侧面也可证实苏辙死后不是当年马上安葬。所以说，由苏坟变为二苏坟的时间应该是政和七年（1117），而不是政和二年（1112），前后相差五年，不可小觑。

由二苏坟演变为三苏坟，涉及郟县尹杨允增筑苏洵衣冠冢的时间，也不可不谈。现竖立在三苏祠堂东侧有一通石碑，名曰《三苏先生祠堂记》。此碑是元代至正十二年，曹师可撰文，专为纪念杨允创建三苏祠堂所立，详细记述了其前后过程。碑文显示，“至正庚寅冬十月，县尹杨公到任”。查《中外历史年表》知，“至正庚寅”即至正十年（1350）。杨公“遍谒诸祠”后数日，闻县城西三十里有二苏坟，遂“率领僚属躬诣致奠，至彼四顾寂寥，唯有看坟，广庆寺在侧。”于是才萌生了创建三苏祠堂，增筑苏洵衣冠冢的动议。之后择日动工，开始兴建。此工程，“经营于至正辛卯九月之秋，落成于至正壬辰三月之春。”“至正辛卯”即至正十一年（1351）。“至正壬辰”即至正十二年（1352）。通过碑文，我们知道至正十年冬十月是郟县尹杨允到任的时间，至正十二年三月是三苏祠和苏洵衣冠冢落成的时间。胡谧在《重修三苏祠墓记》中也说，“汝有三苏祠墓昉（开始）此”。可见，汝州郟城三苏祠墓才从此开始有。所以，由二苏坟变为三苏坟的时间应该是至正十二年（1352），而不是至正十年（1350），前后相差两年，不容混淆。

综上所述，三苏坟的沿革应该是，崇宁元年（1102）苏轼和夫人王闰之葬郟后，始称苏坟或东坡坟；政和七年（1117）苏辙和史夫人葬郟后，遂称二苏坟；元至正十二年（1352）郟县尹杨允增筑苏洵衣冠冢后，方称三苏坟。

三、国宝中的国宝

人们来到郟县三苏园景区，拜谒三苏墓后，肯定会再到坟院西南的广庆寺游览一番。穿寺而过，后院便是三苏祠。祠堂内，老泉先生的塑像居中面南而坐，东坡、颖滨左右列侍，神采奕奕，栩栩如生。十年动乱，文革期间，这里是小学教室。学校领导为保护三苏塑像，冒着极大风险，用土坯把神龛裱糊起来，外贴毛主席画像，才使这些珍贵文物免遭厄运。据专家考证，这些都是元代彩塑，历经沧桑，保存至今，实属不易，全国罕见，弥足珍贵。

然而，更为珍贵的是祠堂前东厢房内，镶嵌在墙壁上的一块石碑。这块长方形石碑长1.28米，高0.61米，看起来貌不惊人，却是三苏园地表现

存古代碑碣中，年代最久远的一块，也是最让人费解的一个谜团。长期以来，人称“苑中碑”。碑刻全文如下：

题二苏坟 苑中

人知两苏文中龙，不知道配义与忠。
危言历历诋时政，要观瘴海蛟螭宫。
归来万里一捧腹，鬓发愈黑气愈充。
死生贵贱皆外物，喜功之辈将安同。
平生雨夜对床约，霜风吹角孤飞鸿。
天涯海落两丘土，玉树并掩佳城中。
举杯三酌不忍去，万叶索索声秋空。
奉政大夫汝州郟城令兼管勾常平仓事驍
骑尉行官枢密院弹压赐绯鱼袋李无党同立石。

正奉大夫京西分治户部接于官待阙同知滑州军州事清河郡开国侯赐紫金鱼袋张秀华同立石。

通奉大夫汝州防御使护军广平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食实封一百户赐紫金鱼袋裴满奕立石。

文以气为主，气以道为圉，极重指归有出，于忠、信、仁、义而已，此眉山两苏公所以冠千古而独步。

少卿先生今日重为两公拈出，世之学者，文不泥华，气不流暴，则然后可以。

少卿语语之噫，少卿之心，两公之心。两公之心，周孔之心也。吾辈宜式之。延安史学题。

东坡先生，古今忠义一人也，其作为文章，见于政事者，故不一而足。此何道之，不以命官磨礪，甯踞黄冈如年，然后归。虽流离顿挫处之自若，胸中一点，可谓善养浩然者也。后卒于常州，逮迈辈护丧而归，与弟颖滨先生俱葬于郟城之峨眉，善平生所欠，今得其死所矣。墓之侧，贤士大夫留诗者甚多，唯司农苑公先生，独以二老所蕴藉，诗人不能形容者，一时书之。重吟二老英魂其有遗恨乎？河中屈子元跋。

从洋洋洒洒 500 余字的碑文中，我们得知，这是官居司农少卿的苑中来到苏坟凭吊后赋诗一首《题二苏坟》，史学和屈子元为之题跋，汝州防御使和郟城县令为之立石。遗憾的是通篇碑文既不显朝代，也没有年月，仅有的一点时间特征就是“万叶索索声秋空”，从字里行间推断出是秋季发生的事。碑刻的当事六个人中，主角司农少卿苑中不过是个位居五品的副司级官员，汝州防御使裴满奕也不过是个四品知州，皆名不见经传，从一般历史资料中很难核实这块碑刻的具体年

代。

还好，同治《郟县志》还保留一篇尚野撰写的《二苏先生墓碑记》。碑文详细记载，元代元贞元年（1295），元好问之子元叔仪，刚任汝州知州便前来凭吊苏坟，看到这里荒凉一片，然后发动僚属第一次整修苏坟。其中尚野谈到“闻诸父老，墓侧题咏甚多，所及见者司农少卿苑中、屈子元而已”。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历史资料。尚野时任汝州判官，他听说二苏坟墓侧题咏甚多，但是他在这里只看到这块“苑中碑”。元贞元年（1295），是元世祖忽必烈刚刚去世，其皇孙铁木耳元成宗即位的第一年。元朝定鼎中原才二十多年。所以说“苑中碑”应该是元代以前，宋、金之物，也是碑龄最古老者，其珍贵也就在于此。

那么，它究竟属于哪个朝代呢？一般认为，宋代王安石变法后，才设置司农司，从而才有司农少卿这个官衔。所以在很长时间内，人们都认为“苑中碑”是宋代的产物。从明·正德《汝州志》到《三苏坟资料汇编》^⑧和《三苏坟艺文类编》^⑨，都注明“题二苏坟”的作者苑中为宋人。随着三苏研究的逐步深入，人们发现苏东坡去世后，迫害元祐党人空前升级，在全国两度树立“元祐党碑”，苏氏兄弟全入党籍，并对其毁书绝版，白色恐怖，黑云压城，哪个吃了豹子胆的人也不敢明目张胆颂扬苏东坡！所以说，北宋不可能。那么，南宋也不现实。北宋南迁后，党禁虽解，但汝州郟城沦为金地，南北对峙，兵戎相见，虽说金与南宋偶尔也有使来往，但五品的司农少卿是派不上用场的。即使南宋的司农少卿前来凭吊苏坟，地方官员也不会兴师动众为之题跋、立石。

后来直到上个世纪末，人们发现“苑中碑”中的郟城县令李无党，在《金史·循吏传》中有名，所以 1996 年版《郟县志》认定其为金碑。但 2003 年版《郟县志》又说是元代碑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李无党为证，金碑之说仍占主流。然而，金人入主中原长达百年之久，把“苑中碑”定为哪个年代呢？又是个棘手的难题。近读《苏东坡在平顶山》，说苑中碑“为金贞祐间（1213—1216）郟城县令李无党等所立”。^⑩然而，文下的注释又说“最初设置在朝廷的专门机构是劝农使司。金宣宗兴定六年（1222）撤销劝农使司，改设司农司”。^⑪据称，是经清乾嘉金石学家偃师武亿考证。^⑫试想，1222 年开始设置司农司，1213 年怎么会有司农少卿的官称？岂不自相矛盾。

《金史·卷五十五·百官一》载“劝农使司。泰和八年罢，贞祐间复置。兴定六年罢劝农司，改立司农司。”^⑬这是说贞祐年间又恢复设置劝农使司。劝农使司设置的官员是“使一员，副使一员”。^⑭这时就不存在“司农少卿”这个官衔。纵

观贞祐年间的有关典籍在这方面出现的也都是“劝农使”或“劝农副使”之称。故其定位贞祐年间（1213—1216）似欠妥。“贞祐”是金宣宗即位初的年号，期间，蒙古两度兵围燕京（北京），迫使宣宗不得不迁都南京（开封）。不久，燕京陷落。后，改元“兴定”。六年，金廷罢劝农使司，改立司农司。司农司的设置是“大司农一员，卿三员，少卿三员，知事二员”^⑩此时才有“司农少卿”称谓。所以说“苑中碑”的年代至少应定位在兴定六年（1222）之后。

遇到疑难，借助现代科技。百度国学网显示“苑中（1176—1232）字椽之，大兴人，承安中进士，累官京西路司农少卿，滑州刺史，好贤乐善，嗜读书，一以资于诗，所作多可传，天兴元年卒，年五十七。”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苑中的生平终于露出一角。原来苑中是京西路司农少卿，并不是中央的司农少卿。那么金廷可曾设置过京西路的司农司吗？

《金史·地理志》称，全国行政区划为五京，十四路，汝州地域，隶属南京路，根本就没有京西路称谓。这是怎么回事？

《中华通史》告诉我们，此时的金王朝已历百年沧桑，现已江河日下，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五京，十四路的辉煌早已成为过去。在蒙古铁骑的凌厉攻势下，上京、北京、东京、西京和中都燕京，先后陷落，只剩下南京汴梁，河北、山东、山西等北半个中国，相继沦失，仅存中原与关中的这一狭长地带属金。设置陕西并河南的京东、西、南三路四个行政区划，这也是金廷的与时俱进、因势而为吧！

《金史·本纪宣宗》载，兴定六年夏四月辛巳“置大司农司，设大司农卿、少卿、丞，京东、西、南三路行司，并兼采访事。”^⑪这才和百官志所述一致，即兴定六年（1222）四月设置路一级的行司农司。但，是年八月改元为元光元年。元光二年（1223）十二月，宣宗崩驾，哀宗即位。翌年，改元为正大元年。照此推算，此一路的上级行司农司仅一年另八个月的时间。苑中凭吊苏坟，立碑为记是否在此期间？

《金史·本纪哀宗》载，正大元年春正月，“戊午，上始视朝。大司农、守汝州防御使李蹊为太常卿，权参知政事。”^⑫从中可知，哀宗即位，首先提拔大司农兼汝州防御使李蹊为太常卿并代理参知政事。李蹊任汝州防御使时间多长，不得而知，但至少此前一年另八个月是李蹊在任。而“苑中碑”中的汝州防御使为裴满奕，因此可以断定“苑中碑”不是出现于此时。

《金史·本纪哀宗》又载，正大元年十二月“京东、西、南，陕西设大司农司，兼采访公事，

京师大司农总之。”^⑬这是哀宗朝设置的陕西及京东、西、南四路司农司。“苑中碑”之事当发生在正大二年（1225）之后。

当时的金王朝虽然四面楚歌，漫天烽火，但是蒙古大军的东线最高统帅木华黎和金宣宗都是在元光二年去世，第二年即正大元年，南宋宁宗驾崩，理宗即位，史弥远当国，金与宋罢战言和，正大二年，复与西夏议和。所以哀宗即位伊始的三五年间，三方休战，使金人获得一时的喘息机会，可怕的是，此时成吉思汗西征已经班师东归，正大四年踏平西夏，大汗命陨升天，少子拖雷监国。正大六年，三子窝阔台继统可汗，将以其狂风暴雨之势，大举伐金，灭顶之灾，迫在眉睫。就在这风雨欲来之时，苑中和屈子元他们来到苏坟看到“墓之侧，贤大夫留诗者甚多”，“玉树并掩佳城中”，“万叶索索声秋空”一派祥和的秋天景象。我们从中可以发现金代开放文化，崇尚儒学，尊重三苏，发展教育的盛况。

正大七年，窝阔台挥师南下，直取飞翔、京兆（西安）。正大八年，按成吉思汗遗策，兵分两路，窝阔台亲帅主力正面直攻洛阳与汴京，另遣拖雷率一路大军，越秦岭，经汉中，出唐邓，将会师中原。正大九年正月，窝阔台从白坡（河南孟津）渡越黄河，攻入郑州，大战于襄城（郑东30公里）汝坟，尽陷商、陕、嵩、汝、许、申、颖、睢诸州，使汴京和洛阳成为两座孤城。尤其是，就在本月蒙古两路大军南北夹击把15万金兵主力聚歼于钧州（禹州 郑东北30公里）三峰山（踞郑20公里）之役，是一次决定性的战争。蒙古铁骑四面纵横蹂击，所过之处尸陈遍野，中原腹地成了刀光剑影的战场，血与火的海洋。此时，谁再游苏坟是断不可能。所以，“苑中碑”的下限不会超过正大八年（1231）。

天兴元年（1232）十二月，蒙古大军兵围汴京，金哀宗本打算向西出逃，但听说西去300里无有人烟，就折而往北，继到归德（商丘），最后亡于蔡州（汝南）。汝州郑城岂不就在300里范围之内吗！听起来就令人不寒而栗。更可叹的是，64年之后，也就是元代元贞元年（1295），元叔仪和尚野来到苏坟时是“闻诸父老，墓侧题咏甚多，所及见者司农少卿苑中、屈子元而已”。坟院里“斧斤相寻，草木已空”，坟墓“将复沦没，莫知谁何”，满目凄凉，不由悲从中生。战争之惨烈，毁坏之严重，民生之凋敝，和平之珍贵，怎不发人深思，感慨万端。

古老的“苑中碑”内蕴丰富，要读懂它，确认其年代是首要问题。把它定位在正大二年（1225）至正大八年（1231）年之间仅是个人读书偶得，聊作引玉之砖而已，舛误难免，切盼方

家指正。

古代碑刻是前人政治经济社会活动的写实，是历史的活化石，具有极高研究价值，是宝贵的文化遗产。三苏坟现存较完整古代碑碣45块，残碑48块，都是研究三苏的珍贵文献资料，其中宋代苏适夫妇墓志铭和金代的“苑中碑”最为珍贵。墓志铭是地下发掘出来的，而“苑中碑”是地表存放的，所以“苑中碑”更显得难能可贵。2005年5月，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高级顾问郑孝燮，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专家组组长、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吕济民等国家文物专家莅临郟县考察三苏园。当看到“苑中碑”时，吕济民无限感慨的说：“这里有金代的碑，金和南宋、北宋碑刻都是一个时期的，金代的碑刻是国宝。”大家也都给以高度的评价。

郟县三苏坟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苏东坡的葬地，2006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堪称国宝，那么，“苑中碑”当然是国宝中的国宝。

论文注释：

①《中国名胜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689页。

②《郟县名胜古迹》，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3页。

③、④苏辙《栾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814页《苏颖滨年表》。

⑤、⑥孔凡礼《苏辙年谱》，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63、668页。

⑦《苏东坡在中原》，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106页《大事记略》。

⑧《三苏坟资料汇编》，河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⑨王正瑞《三苏坟艺文类编》，五州传播出版社2001年版。

⑩、⑪、⑫《苏东坡在平顶山》，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82、482、589页。

⑬、⑭、⑮、⑯、⑰、⑱脱脱《金史》，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826、826、826、240、248、248页。

参考书目

苏轼《苏东坡全集》，珠海出版社1996年版。

孔凡礼《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版。

翦伯赞《中外历史年表》，中华书局1961年版。

清同治三年《郟县志》，郑州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

《郟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陈致平《中华通史》，花城出版社1996年版。
(河南省郟县财政局)

(上接33页)

再看弘治《黄州府志》所载：“东坡故居在今县学东，宋元丰三年苏轼为吴兴守，谪黄州三年，故人马正卿为守得地，立雪堂居之，自号东坡居士”、“东坡梅独一株，在东坡洗墨池畔，相传东坡亲植，古树犹存。”“洗墨池在府城内，县学前，东坡故址旁。”“东坡书院，苏子瞻去后以雪堂付潘大临、陈慥，开学教生徒，名曰书院，今之县学，即东坡故址。”另据明黄州知府卢濬所编《古黄遗迹》所载：“东坡，在府治东南县学前，宋苏子瞻先生谪黄筑居于此，因以为号。有洗墨池尚存，后人思之为建祠塑像，在赤壁山。”南宋王象之《輿地纪胜》中记载：“东坡，在州治之东百余步。元丰三年，苏轼谪居寓临皋亭，后得其地，立雪堂而徙居焉。七年，移汝州。去黄之日，遂以雪堂付潘大临兄弟居焉。崇宁壬午，党禁既兴，堂遂毁焉。其后，邦人属神霄宫道士李斯立重建。”

这些记载非常明确，东坡在府治东南县学处，而县学就在一字门西侧，刚好也在州治之东百余步。

陆游、苏东坡、王象之、卢濬和弘治《黄州府志》的记载完全吻合，再参照清代《黄州府志》和现场调查，我们认为县学（即雪堂）大约在市烟草局宿舍区和市商业局一带；东坡应该就在十三坡，大约是市商业局至胜利街派出所。“黄泥坂”是临皋亭至雪堂的一段黄泥路，大约在黄冈中学老校区至十三坡之间。这一结果大出我们的意料，也与黄冈人传统的看法大大相悖。不过，市商业局一带实际上是一座山岗，过去有很多山坡，现在仍保留有十三坡、十八坡的地名，东坡在这里其实也不奇怪，不过是大家的传统思维难以改变而已。

黄州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但现在的黄州除了汉川门和赤壁外，绝大多数历史名胜都已经烟消云散。笔者认为，在黄州城市建设中，适当加入古城黄州的文化因子，有计划地恢复或重建东坡遗胜，将会大大提高黄州城市品位。

(湖北黄冈市东坡赤壁风景区管理处主任)

竹外桃花三两枝

——苏东坡与桃花

刘清泉

内容提要：以苏东坡诗词中的桃花例句为基础，指出其意蕴分别是指代春天、比喻美女、象征世外桃源和比喻新贵。

关键词：苏东坡 桃花 意蕴

苏东坡与桃花亦有情缘，诗题出现仅《问大冶长老乞桃花茶栽东坡》，直接歌咏仅《次韵子由岐山下诗》之十，但在其它诗词中桃花意象却多次出现。现就我搜集到的例句，对其意蕴略作分析。

一、门外桃花，春天景物

以桃花指代春天。如“我今老病不出门，海山岩洞知何许。门外桃花自开落，床头酒瓮生尘土。”（《和蔡景繁海州石室》）“相逢为我话留滞，桃花春涨孤舟起。”（《次韵王定国南迁回见寄》）意谓王定国若见到张方平，可代告行路濡滞之故，明年春天，我当舟抵南都也（时张方平在南都）。“净眼见桃花，纷纷堕红雨。……上林桃花开，水暖鸿北翥。”（《次韵正辅表兄江行见桃花》）“桃花满庭下，流水在户外。”（《和陶桃花源》）“明年春水漾桃花，柳岸隘舟楫。”（《好事近·黄州送君猷》）“老去君空见画，梦中我亦曾游。桃花纵落谁见，水到人间伏流。”（《次韵子由书王晋卿画山水二首》）“溶溶晴港漾春晖，芦笋生时柳絮飞。还有江南风物否？桃花流水鳜鱼肥。”（《寒芦港》）“西塞山边白鹭飞，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鳜鱼肥。”（《浣溪沙》）

二、灼灼桃花，青春少女

以桃花比喻美女，源于《诗经·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夭夭”随风摇曳或少好貌，“灼灼”照眼欲明。用嫩嫩的桃枝、鲜艳的桃花比喻充满青春气息的美丽少女。

苏东坡直接描写桃花的《次韵子由岐山下诗》之十《桃花》，表现了繁花满枝、春意盎然的美景，仿佛花枝招展的姑娘。“争开不待叶，密缀欲无条。傍沼人窥鉴，惊鱼水溅桥。”前二句突出桃花的特点。为了争春，不待长叶就竞相开放；繁花缀满枝头，只见花朵不见枝条。后二句说桃花倒映在池沼里与人面交相辉映；受到惊吓的鱼儿凌空跃起，桃花水溅湿了桥面。略用“人面桃花”及“三月桃花水”意。唐代崔护的《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此诗的脍炙人口除了颇具传奇色彩的“寻春遇艳”和“重寻不遇”的故事，还在于揭示了一种人生体验：在偶然、不经意的情况下遇到某种美好的事物，而当自己去有意追求时，却再也不可复得。《水衡记》：“黄河水，十二月各有名，二月三月名为桃花水。”

间接描写桃花的题画诗《惠崇〈春江晚景〉》家喻户晓。“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前二句写三两枝桃花在竹笋的憧憬中摇荡、在竹叶的激动里弥漫、在竹梢的袅娜间四溢，冲淡竹的荫蔽、冲破竹的群落、冲出竹的“杏墙”，在竹笼外、在江水边、在暖风里像美丽的少女一样招展、触目、惊心。

三、武陵桃花，理想憧憬

以桃花象征世外桃源，源于陶渊明《桃花源记》，对后世文人乃至苏轼影响巨大。苏辙在《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引》中引用苏轼来信：“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苏东坡诗词多用此典以寄托理想憧憬，如“纵饮座中遗白蛤，幽寻尽处见桃花。”（《寄题兴州晁太守新开古东池》）“玉室金堂余汉士，桃花流水先秦人。”（《宿九仙山》）“却寻泉源去，桃花应避秦。”（《再过常山和昔年留别诗》）“桃花流水在人间，武陵岂必皆神仙。”（《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障图〉》）“丹青明灭凤篁岭，环佩空响桃花源。”（《介亭钱杨杰次公》）

四、红尘桃花，长安新贵

以桃花比喻新贵，语出刘禹锡《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因此诗讽刺权贵，再度被贬，十四年后才回长安任职。太和二年，重游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春风耳。再题诗曰：“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对政敌投以轻蔑的嘲笑，从而显示自己的不屈和乐观。苏东坡诗词偶用此典，讥讽时事，如“刘郎应白发，桃花开不开。”（《送刘攽倅海陵》）“满院桃花，尽是刘郎未见。”（《殢人娇·小王都尉席上赠侍人》）

（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研究室主任）



（上接 26 页）

李廌以善文著称，“喜论古今治乱，条畅曲折，争辩而中理。当喧溷^⑫仓卒间如不经意，睥睨而起，落笔如飞驰”（《宋史》）。由此表明李廌思维敏捷，不论在多么嘈杂的场所，灵感一来，旁若无人，挥笔而就。苏轼、范祖禹等对其文评价很高，认为李廌“虽在山林，其文有锦衣玉食之气”。其诗文集名《济南集》。他撰写的《济南先生师友谈》是唯一记载苏轼及其门生的书，异常宝贵。《四库全书》对此书评价很高：“寥寥数简之书，而至今孤行于天地，岂偶然哉！”该书“记苏轼、范祖禹及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所谈，故曰‘师友’，其人皆元祐胜流，所载多名言格论”。

苏轼对门生的评价并不以进士及第的早晚为依据，甚至也不以是否进士出身为准，而是根据他们的真才实学。四学士中，张耒弱冠及第，秦观进士及第最晚，但苏轼对此二人评价最高。有人问四学士才学的高低，苏轼回答：四人皆有才学，很难分高低，“鲁直诗风独特，横空出世，脱尽凡俗。少游、文潜才识学问为当世第一。少游下笔精悍，心所默识，而口不能传者，能以笔传之。气韵雄拔，疏通秀朗，当推文潜。无咎之文豪放沉郁，有坦荡之怀，磊落之气，又是一种风光。”陈师道和李廌，尽管布衣出身，但苏轼非常器重两人的才学，对他俩期望很高。

论文注释：

- ① 颓龄：衰老之年。
 - ② 隳官：罢官。
 - ③ 岂弟：同恺悌，安乐和易的样子。
 - ④ 排根：排斥。
 - ⑤ 最课：朝廷对地方官考核优秀。
 - ⑥ 海涵地负：如大海之能包容，如大地之能负载。比喻才能特异，心胸开阔。
 - ⑦ 矻矻：勤勉不倦的样子。
 - ⑧ 典故：泛指经书、典籍、典章、诏令一类文字；草拟诏令的官职。
 - ⑨ 九皋独唳：九皋，曲折深幽的沼泽地。《小雅·鹤鸣》：“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比喻身隐而名著。
 - ⑩ 澜翻：水势翻腾状。比喻文章气势奔放跌宕。
 - ⑪ 定命：命运。
 - ⑫ 喧溷：厕所。比喻喧闹混乱之处。
- （未完待续，山东济宁学院教授）

苏东坡与黄州梅花

冯扬

内容提要：通过种梅花、写梅花、画梅花和忆梅花，来表现苏东坡与黄州梅花情结，尤其是“梅格”的提出，极具创意。

关键词：苏东坡 黄州梅花 梅格

在黄州有这样一个传说：苏东坡初到黄州，住在定惠院，每天夜里在窗下读书，必定有一漂亮的女子在窗外听。苏东坡觉得奇怪，便问那女子：“你是谁家的姑娘？”那女子回答说她是花又不是花。苏东坡说那一定是花魂，并问她是什么花魂。那女子却说是梅花魂，还问苏东坡喜不喜欢梅花。苏东坡说喜欢梅花。那女子答应送他一株。第二天上午果然有一老人给苏东坡送来一株梅花。传说归传说，是不是真实的无从考证，但是苏东坡与黄州梅花确有解不开的情结。那么，苏东坡与黄州梅花究竟有怎样的情结呢？

一、种梅花

在黄州东坡赤壁的“坡仙亭”内有一块《东坡老梅》的石碑，碑上有一株老梅树，古朴苍劲。碑文上记载：“梅为苏文忠公谪黄时手植，明故郡守郭桐冈（郭凤仪，字桐冈，明嘉靖年间黄州知府）先生摩形于石并为之记。……五年筑雪堂……堂侧手植梅一株，大红千叶，一花三实，迄今嘉靖戊申枯本犹存。……节义皆志与气为之，老梅盘根错节，花中之有志有气者也。树犹如此，况其人乎？”从碑文的记载来看，北宋元丰三年（1080）二月一日苏东坡到达黄州，元丰七年（1084）四月离开，梅为苏东坡谪居黄州种植，

到明代嘉靖戊申（1548）“枯本犹存”，可见，苏东坡在雪堂边所种的梅花存活了近五百年。

二、写梅花

怕愁贪睡独开迟，自恐冰容不入时。
故作小红桃杏色，尚余孤瘦雪霜姿。
寒心未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
诗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绿叶与青枝。

这首诗是苏东坡在黄州写的《红梅》诗，也是他的得意之作，后来他又稍加损益填为《定风波·好睡慵开莫厌迟》。诗一开头就抓住红梅不畏严寒、百花过后的特点，起句幽默又有情味，揭示梅花的性格与现实的不协调。“自恐冰容不入时”更为明白地写出了梅花的内心世界：因“不入时”而“愁”，因“不入时”而“恐”，突出了“梅格”，点明了诗的意旨。红梅的外表象桃、杏一样的浅红，但那是“自恐冰容不入时”而故意做作的，好像有一种被迫的感觉，然而它不畏霜雪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第三联强调红梅不肯随着“春态”逐流，诗人用拟人的手法，把红梅的冰肌玉骨不入时俗尽情的展示出来，使诗既有鲜明的物态，又有深刻的含意。处处写红梅，处处是红梅的内在与外表的矛盾，表达的却是诗人身处险恶的环境中的矛盾心情，诗人借“梅格”来表现自己的人格。苏东坡写梅花，他还把自己的遭遇同梅花联系起来，如：他在被贬来黄州的途中，看到麻城（当时属黄州府管辖，现属黄冈市）春风岭上的梅花，写了《梅花》二首：

春来幽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间。
一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渡关山。

——其一

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
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

——其二

前一首写诗人带着沉重的心情，在去黄州的荒凉的道路，看见梅花而引起感情上的共鸣和心灵上的震动，突出地描写了梅花兀立于草棘丛中的洁白形象及其遭受风雨的侵袭。梅花形象和遭遇引起了诗人的共鸣，似乎在坎坷的人生路上遇到了知己一样。后一首通过想象写出了梅花的感情。梅花如此的美好却置身于荒郊草棘之间，无人欣赏也无人了解，所以“开”也是“无聊”的。东风狂恶，梅花飘零，无人爱惜，“落”就“更愁”了。人与花产生了思想的交流，梅花就定格在诗人的思想当中。

三、画梅花

同样还是在黄州东坡赤壁的坡仙亭内，有这样的一块碑刻：一弯冷月，一株寒梅，老干虬劲，嫩芽茁壮，花蕊吐香。梅花老矣，两枝嫩芽却显示出了一股勃勃的生机。有人说老梅中间有一枝往下倾斜，寓意苏东坡中年倒霉（梅），当然这是后人的揣测。梅花的两侧有一副对联：北宋西蜀苏东坡中年南贬时笔迹；白纸黑墨拓黄州赤壁青石上梅花。好画配好联。上联的五个方位对下联的五种颜色。

四、忆梅花

苏东坡元丰七年（1084）四月离开黄州后写的《忆黄州梅花五绝》中，“邾城山下梅花树，腊月江风好在无？”表现了诗人对黄州梅花的至爱之情。

（注：战国时期，楚宣王灭邾，将邾国迁移

到黄州，古称黄州为邾城。）

（湖北黄冈市东坡赤壁风景区管理处）



苏轼：月亮人生

赵军

内容提要：本文从“月”的视角对苏轼的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念奴娇·大江东去》和前后《赤壁赋》作诠释，从问月、恨月、酌月和抱月中提炼苏轼的月亮情结和月亮精神。

关键词：月亮 人生 精神

问 月

熙宁七年（1074），苏轼升任密州（今山东诸城）太守。次年，政通人和，乃造“超然台”。中秋节，在部属的簇拥下登楼畅饮，大醉。明月在天，人影在地。他思念阔别五年的弟弟，写下《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宋人说：“东坡咏月词一出，余词尽废。”确实苏轼垄断了中秋月。且不去说这首词的审美趣味，单看此时的苏轼，已把明月作为知己，掬自己的清洁之心与明月交谈。“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此由问月至登月，对月的神往溢于言表，只是此时还有所留恋，有所担忧。最后“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月光人影已经融为一体。词中除抒发对弟弟的怀念之情外，还道出了人生哲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表达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美好愿望。其实，更深层的意蕴却是，在对月追问的过程中，寄予了他更多的人生思考。“月有阴晴圆缺”，无论是圆是缺，都有一个渐变的过程，这才是自然之道，才是为政之道。暴风骤雨式的改革或“休克”疗法，只能导致失败，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更大的不幸。它微妙地揭示了在王安石变法中，苏轼为何极力发对的原因。

熙宁初年，神宗的一句“为朕深思治乱”给了他巨大的力量。针对王安石的变法，他直接给皇上写了两封信，《上皇上书》和《再上皇上书》。

苏轼打比方说：要像白昼不知不觉变成黑夜，不能从严冬一下子进入酷暑。气温大起大落，肌体承受不了。同理，几百年形成的风俗道德，几年就要摧毁它，时局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在《再上皇上书》中，他大义凛然地说：“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当时，苏轼任职于史馆，可谓人微言轻，但是他忠君又讽君，甚至冒着身家性命，这股大力从何而来？答案应该是：来自强大的文化传承，来自眉山风俗道德。生活世界的形成，少则数十年，多则上百年，而打碎它可能在弹指一挥间。西方有名言道：人是悬挂在由他自己所编造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意义的生成必然是缓慢的，犹如真正的绿色果蔬不能用激素。意义的嬗变同样需要足够的过程。年轻的苏轼已坚定不移地认识到这一点，这在我们今人看来也是令人扼腕的。不言而喻，苏轼与王安石不可调和，只能主动辞职，再加小人陷害，神宗朱笔一批“通判杭州”。通判杭州三年，政绩卓然，升任密州太守。此值中秋，胸中有多少波澜在汹涌？对亲人是这样的留恋，对国家是这样的期待。今夕过后，一轮朝阳还会冉冉升起。“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蕴含了多少无奈和希冀！“但愿人长久”，苏轼对未来仍充满希望，而这种希望与信心，无疑来自于月亮。于是“问月”就显得情之所至。

恨 月

乌台诗案后，苏轼以团练副使贬黄州，不得签署公事。初到黄州暂居城内寺院定惠院。一首《卜算子·缺月挂疏桐》道尽无限寂寞与凄凉。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

往来，飘渺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惊起却回头”多么惊心动魄的文字，性命差点丢掉，又是莫须有的罪名，怎不让人回头？“有恨无人省”多么真实而又苍凉的写实。他在《答李端书》中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寂寞沙洲冷”，除了寂寞就是凄冷。这千年的寂寞与凄冷，从遥远的空间传来，每读于此，那阵阵寒意仍丝丝入怀。苏轼也毕竟是有血有肉的凡人。此时只有明月，也只有缺月能代表苏轼的心情。只有缺月来安抚这颗多情而又惆怅的心灵，那种“欲说还休”的苦痛，也只能对缺月倾诉。明月，在心情惆怅时，它是一种抚慰，它是一种眷恋，它是一种渺渺的忧思。恨的土块在苏轼身边越积越高，几至于埋葬，他出于本能地要为自己挖一个小孔来呼吸。

苏轼琢磨孤独与寂寞，试图从孤寂中提取生命的能量。城郊有座安国寺，于是他就常去焚香静坐，眼观鼻，鼻观心，终于“表里倏然，得垢秽尽去之乐”。禅说：“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心”，一个人如果内心烦乱不宁，就像千江水中有千个月亮，“剪不断，理还乱。”而一旦心静如水，静观而与自然相通，与一轮明月交息，就会超然物外，精神清明。“圣人之心，静也！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苏轼艰难地而又自然地完成了由“恨”到“静”的转变，“神明自得，圣心备矣”。恨月使他得道，他即将实现由落魄文人到千秋伟人的华丽转身。

酹 月

不久，黄州太守徐君猷为苏轼另辟一居所：临皋亭。苏辙也带着苏轼家人前来汇合。为解决生计问题，徐太守把城东的一块废弃的兵营拨给苏轼，约五十亩坡地。苏轼开始忙碌起来了：率领全家开荒种地。除荆棘，搬瓦块，挖水渠……麦子种下了，初春一片新绿，入夏满目金黄。除此之外，他还忙着静观天地万物的律动，应对纷至沓来的灵感，招待纷至沓来的造访者。壬戌（1082）七月，黄州赤壁也终于等到了诗人的造

访。于是光耀千古的佳作《念奴娇·赤壁怀古》诞生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自然与人物，时间与空间融成了一个雄浑博大的意境。历史感人文感扑面而来，目光穿越数百年，思接苍穹连茫茫。“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追慕英雄，向往功业，不禁感慨万千，泪湿青衫。然而滚滚长江无语，浪花淘尽英雄，只有明月永存！“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心中千种风情，万般感慨，曾有的理想，曾有的辉煌，古人的伟业，今人的凄凉……好了，什么都不要说了，什么都不要想了，都在酒中了，苏轼自己喝干了杯中酒，也虔诚地让江月喝干了杯中酒。苏轼祭奠了江月，也同时祭奠了自己的过去，齐万物，等生死，同荣辱。这一“酹”招来了千年庄子的魂魄入怀，这一“酹”引发了超然豁达豪放，这一“酹”虚无中包涵着进取，这一“酹”道出了苏轼宇宙式的乐观主义人生观。这一“酹”字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苏东坡，苏东坡三个字，从此响彻千年古国，滋养了无数的文人墨客。

抱 月

同样是在黄州，苏东坡与赤壁结下了不解之缘。先后两次夜游赤壁，写下了前后《赤壁赋》的华章。前赋曰：

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羽化而登仙。

羽化的感觉是如此美妙，身轻如羽毛，万物何在哉！这也许就是得道成仙的感觉。成仙意如何？“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东坡道出了他人生最高的理想与追求。“抱明月而长终”那是怎样的胸怀与境界呀，也许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也许就是神的境界，那就是一种美的境界，是宇宙境界，是无界之界。这种浪漫与境界，古今中外，千百年来无人能比，千百年后也难有续者。此时的东坡再一次蜕变，成了坡仙或地仙。难怪，他会再夜游赤壁。

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已而叹曰：“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

见了如此明月，东坡竟走不动了，“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坡仙还独自攀上峭壁，“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已而“返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好一个爱月之人。更出人意料的是，有一天他骑马外出彻夜不归，家人朋友四处寻找，不见踪影，原来他睡在一座桥上，桥柱上赫然题写着他的新诗：“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倚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因爱一溪风月，怕马踏碎琼瑶，竟在桥上睡去，直到风月隐去，杜宇春晓。这是何等的痴迷与豪放，不是仙人，谁能有此“乖张”。

词者总是亲切的可爱的。坡仙在雪堂曾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他能穿越社会众态，洞察诸多领域，以自然之躯融入天地，既汲取能量，又广施悲悯。他说“吾眼中无一个不好人”，这大概就是佛的境界吧。坡仙向我们现代人昭示了人的精神，可以挥洒到什么样的高度和广度。黄州后，由于种种原因，再次遭贬，贬到更远的海南。然而，只要心中有明月，天涯海角又如何？这只能使他的人生更加升华，他说“良天佳月即中秋，菊花开日乃重阳”。只要有佳月，何论中秋节与否，只要有菊花，日日相伴是重阳。这是何等大气人生。怀抱明月的人是永远打不垮的。在坡仙的眼里，明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生命的庆典，意味着我们生命中的一种欢欣雀跃，意味着我们忧伤时变得更加绵渺细腻。

“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回望苏轼的一生，就是月亮的人生。他的政治理想，他的情怀，他的境界，他的才华，他的审美趣味，他的精神无不与明月相辉映。如果要把苏轼的精神加以提炼的话，那我就要说，苏轼的精神就是月亮精神。

虽然“人生自是有情痴，此事不关风与月”，但是当一个人能情月相融时，那些欢喜就会更加欢喜，那些忧伤就会被冲淡。对待事物的态度，在实用的态度抑或科学的态度之外还能有一个美

美的态度，那么，他的人生就会是充满诗意的人生。苏轼就是拥有这种态度的人。心中有明月之人，你可以摧毁他的肉体，但你永远打不垮他的精神。这也许就是苏轼让他的政敌永远不明白的地方，即使流放得再远，苏轼仍然会欢快地活着。这种态度和精神在苏轼的生活中随处可见。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苏轼《记承天寺夜游》

顷在黄州，春夜行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醉卧少休。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铿然，疑非尘世也。书此语桥柱上。

照野瀰瀰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苏轼《西江月·照野瀰瀰浅浪》

人一旦修炼到这种天人境界，一生就会充满欢乐。后现代的人们在忙碌之余，还能举头望望明月的话，那也将获得一种幸福，当举头望明月之时，还能想起千年前苏轼这轮明月的话，那将会获得更大的幸福，当你能把头上的明月与苏轼之明月合二为一的时候，那将会提升你的人生境界。

2009年12月19日 作于姮娥斋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级中学教师)



千古风流人物（刘怀东篆刻）

苏轼重阳诗词悲秋主题初探

袁心澜

内容提要：苏轼的重阳诗词常常表现悲秋的主题，往往通过对家人的怀念以及对自身命运的感伤升华悲秋的主题，既表现了苏轼效命时世的渴望和生不逢时的悲伤，也凸显了苏轼透彻达观的人生态度和旷达不羁的乐观情怀。

关键词：苏轼 重阳诗词 悲秋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万物由盛及衰的季节。这种自然界的兴衰更替与人事的兴衰转折在文人心中产生强烈共鸣，与之相应的忧愁悲怨开始在文学当中泛滥。所谓“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草木荣枯引发了古代诗人们生命情怀，“悲秋”之辞，可谓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学，自《诗经》开始，就已有“悲秋”之音，“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一处萧瑟的秋景与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成为人们心头难以消磨的一处痛。忧患国难的屈子，也吟出了“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之句，以草木之变衰而引发岁月易逝、生命无常的怅然之情。至若被誉为“悲秋之祖”的宋玉，其《九辩》开头云：“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僚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沅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慆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怆恍愤恨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寞而无声；雁靡靡而南游兮，鸱鸪啁嘶而悲鸣。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其渴望实现个体生命价值却又无法实现的感伤情绪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从此以后，“悲秋”与“感士不遇”之间形成了一种“心理定势”，一写及秋景，马上就会使人感生出“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郁闷和牢骚^①。一生旷达乐观的东坡，也有“病马

已无千里志，骚人长负一秋悲”的失意和无奈。这种“悲秋”的情绪，在重阳节时尤为凸显，一方面是因为重阳节后万物归于凋零，景物凄凉萧瑟，文人骚客久沉下僚或英雄失路或志士困顿或羁旅他乡之际，用以表达内心的悲愁哀怨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另一方面是重阳节自古就有登高、赏菊、饮酒、插茱萸的习俗，朋友相聚郊游饮宴相互酬唱抒发情思也就顺理成章。苏轼此间所作的诗词颇丰，《全宋词》中就收录其二十八首节序词，其中重阳词有十首，数量最多。《苏诗全集》收录的重阳诗就有16首。在苏轼的重阳诗词中，融入了他对家人的思恋、对友人的牵挂、对命运的感慨，乐观旷达中流露出浓浓的“悲秋”之意。

—

苏轼在去世的前两个月，曾对自己一生的功业作如下评价：“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澹州。”熟悉苏轼的人都会记得，他青年得志，曾被欧阳修誉为“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宋史·苏轼传》载他：“既而登上第，擢词科，入掌书命，出典方州。”“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②按理说苏轼青云直上不是难事，仕途坦荡也在情理之中。谁料世路多艰，风波迭起，屡被贬谪，一次被贬黄州，另一次贬至岭南，最后差一点穷老送终于天涯海角的海南岛，真正在朝为官的日子不过八年有余。在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之下，其“悲士不遇”的情怀在重阳诗词中表露无遗。如《和晁同年九日见寄》：“仰看鸾鹤刺天飞，富贵功名老不思。病马已无千里志，骚人长负一秋悲。古来重九皆如此，别后西湖付与谁。”

又如《南乡子·重九》词云：“霜降水痕收，浅碧鳞鳞露远洲。酒力渐消风力软，飐飐，破帽多情却恋头。”此词作于苏轼被贬黄州之时，翻用孟嘉落帽典故，别有一番风味。据《晋书》记载，孟嘉“为征西桓温参军，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宴龙山，僚佐毕集。时佐吏并著戎服，有风至，吹嘉帽堕落，嘉不之觉。温使左右勿言，欲观其举止。嘉良久如厕，温令取还之，命孙盛作文嘲嘉，著嘉坐处。嘉还见，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座嗟叹。”③说明孟嘉有很高的艺术造诣，他的才情常常让周围的雅客俗士惊讶叹服，后世的骚人墨客更是津津乐道，借故抒怀，表达对孟嘉洒脱个性和超人才华的赞誉，或借“落帽”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抑郁。苏轼重阳诗词化用“孟嘉落帽”之典可谓是俯首即拾，变化万千，孟嘉处乱不慌的宽宏气度，超卓的才思都让苏轼赞叹交加。“我辈情钟，古来谁似龙山宴。”（《点绛唇·己巳重九和苏坚》）“可怜吹帽狂司马，空对亲春老孟光。”（《明日重九亦以病不赴述古会再用前韵》）“谁知爱酒龙山客，却在渔舟一叶中。”（《九日舟中望见有美堂上鲁少卿饮处以诗戏之》）“无复龙山对孟嘉，西来河伯意雄夸。”（《九日邀仲屯田为大水所隔以诗见寄次其韵》）“不问秋风强吹帽，秦人不笑楚人讥。”（《壬寅重九不预会独游普门寺僧阁有怀子由》）处处流露出苏轼悲士不遇的感伤情怀。

二

苏轼由踌躇满志的仕途达人到一贬再贬至蛮荒之地的谪官，经历了政治上的低迷失意，亲人的生离死别，生活得万般艰辛，这一系列的变故都给苏轼带来了巨大的精神痛苦，不免使他发出人生似梦的感慨。如“笑劳生一梦，羁旅三年，又还重九。华发萧萧，对荒园搔首。”（《醉蓬莱·重九上君猷》）视一生操劳无非南柯一梦，转瞬即白头。“身外恍来都似梦，醉里无何即是乡。”（《十拍子·暮秋》）抒发了苏轼“人生如梦，醉即吾乡”的逃避遁世之感。又如“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南乡子·重九》）“俯仰四十年，始知此生浮。”（《九日次定国韵》）更是将苏轼生如浮云、世事如梦的人生感慨抒发地淋漓尽致。

但在人们心目中，苏轼最终还是一位典型的乐观主义者。林语堂说过：“我们所得的印象是，

他（指苏轼）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④这种印象和前面的感伤情绪并不矛盾，苏轼本是一位有着深重的忧患心理之人，因而其一生经常产生着大苦闷和大烦恼。不然的话，就不会出现前面所谈的种种“人生如梦”的深沉感叹了。但是，苏轼的可贵之处，却又在于他透彻通晓事理的睿智和善于变换角度看问题的聪明，这就赋予了他解脱忧患和经常保持乐观的非常人所及的能力。因此，与其说苏轼是一位天生的乐天派，则毋宁说他是位“识透天命”的达观主义者更加准确。⑤对这一点，重阳词《西江月·重九》或许就能说明问题。此词作于苏轼谪居黄州期间，《东坡乐府笺》题为“重阳栖霞楼作”，首句“点点楼头细雨，重重江外平湖”，道出苏轼复杂的心绪，“江外平湖”暗喻国家宗庙的所在。处在江湖之远的苏轼，内心深处依然向往着庙堂之高。“重重”喻遥远，这里有空间距离上的遥远，也有官场仕途上的遥远。“楼头细雨”淅淅沥沥既是景物的描写，也是苏轼内心怅然的写照。“当年戏马会东徐，今日凄凉南浦。”东徐即徐州，项羽灭秦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定都彭城即徐州，戏马台乃霸王演武和阅兵之所。古来英雄之地也不免沦落为凄凉送别之所，言世事无常矣。因而苏轼接下来写到“莫恨黄花未吐，且教红粉相扶。酒阑不必看茱萸，俯仰人间今古。”“黄花”乃不遇之意，人间今古不过是刹那之间，不必过于看重。

再来看《醉蓬莱·重九上君猷》：“笑劳生一梦，羁旅三年，又还重九。华发萧萧，对荒园搔首。赖有多情，好饮无事，似古人贤守。岁岁登高，年年落帽，物华依旧。此会应须烂醉，仍把紫菊茱萸，细看重嗅。摇落霜风，有手栽双柳。来岁今朝，为我西顾，酹羽觞江口。会与州人，饮公遗爱，一江醇酎。”题下有序：“余谪黄州，三见重九。每岁与太守徐君猷会于栖霞楼。今年公将去，乞郡湖南，念此惘然，故作是词。”这是苏轼谪居黄州，任黄州太守的徐君猷对他关照有加，苏轼亦很尊敬他，“年年落帽，物华依旧。”这里苏轼又一次化用了“孟嘉落帽”之典，意为每年重阳节都有晋人孟嘉落帽被嘲的感觉，而物华依旧没有任何改变。词中回顾了黄州三年的谪居生活，虽然“物华依旧”，但苏轼已经走出了之

前重阳节的低沉心境，对未来充满信心。结尾写得雄浑苍劲，表达了作者对徐君猷的深深敬意，以及努力抗争逆境的豪放情怀。

与此相似的，还有《九日湖上寻周李二君不见君亦见寻于湖上以诗》：“人生如朝露，要作百年客。喟彼终岁劳，幸兹一日泽。愿言竟不遂，人事多乖隔。悟此知有命，沉忧伤魂魄。”表达了仕途不遂，人事乖隔不过是命运使然，若沉湎忧愁会自伤其身的之感。《十拍子·暮秋》末甚至道：“莫道狂夫不解狂。狂夫老更狂。”显示出苏轼的旷达不羁。

三

“每逢佳节倍思亲”，思亲也是苏轼重阳悲秋诗词的表现主题。良辰美景之际，宦游在外的苏轼想起手足情深的兄弟、相濡以沫的挚友，百感交集，诗词中流露出强烈的思念之情。

“忆弟泪如云不散，望乡心与雁南飞。明年纵健人应老，昨日追欢意正违。不问秋风强吹帽，秦人不笑楚人讥”（《壬寅重九不预会独游普门寺僧阁有怀子由》）这是苏轼到凤翔任签判的第二年重阳之作，凤翔是他踏上仕途的第一站，在此之前，苏轼与弟弟苏辙从未分离过。苏轼与苏辙同时进士及第、同时考中制科，后来又同时位为“唐宋八大家”，入仕后又经历同样的宦海风波，最后还一起被贬到蛮荒的岭南，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都是一对真正的难兄难弟。早在未曾出仕前，他与苏辙在旅驿中读到韦应物“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一诗时，彼此十分感动，两人相约将来入仕后应尽早退隐以享受闲居之乐；而在苏轼被囚乌台狱时，他自忖必死无疑，其“遗书”中也念念不忘要“与君（指苏辙）今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⑥重阳佳节是亲朋好友相约登高祈福的日子，苏轼宦旅在外，忆起朝夕相处的亲人，不免涕泪满面，心儿飞过重山去。“不问秋风强吹帽，秦人不笑楚人讥”援引孟嘉帽落，被人讥笑之典，暗指自己外放地方，难免不遭人讥笑。人生就如孟嘉落帽般，对万事都有不经意的姿态，而当有人对这不经意大作文章时，则要以自己独特的才华征服对方，这才是酣畅淋漓的人生。

“苦恨相思不相见，约我重阳嗅霜蕊。”（《送颜复兼寄王巩》）是对远方朋友的思念，一旦相逢便把酒相劝“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九日次韵王巩》）要珍惜眼前的欢乐时光，不

要等到时光逝去空自忧愁。“黄金散行乐，清诗出穷愁。”（《九日次定国韵》）王褒《高句丽》云：“不惜黄金散尽，只畏白日蹉跎。”写英雄失意的无奈心境。李白《将进酒》用“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来排遣怀才不遇的忧愁。苏轼要告诉王巩的是，在痛苦失意的时候不妨转换角度去考虑问题，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云：“西伯拘羑里，演《周易》；仲尼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⑦“清诗出穷愁”亦意同此。王巩字定国，他可以算得上是苏轼患难与共的挚友，两人相交多年，友情笃厚。元丰元年重阳，苏轼在徐州所建的黄楼落成，王巩特地赶来相贺。席间苏轼为王巩做《千秋岁》一词：“蜂蝶乱，飞相逐。明年人纵健，此会应难复。须细看，晚来月上和银烛。”两年后苏轼遭“乌台”横祸贬赴黄州，王亦受到牵连被贬到比黄州还要荒凉的宾州，“明年人纵健，此会应难复”竟然一语成谶。苏轼对王巩充满愧疚之情，王巩却不计得失时常安慰苏轼。两人相隔万里，书信往来，鸿雁不绝，令苏轼倍感欣慰。

苏轼的部分重阳词是与朋友的送别之作，如作于熙宁七年的《浣溪沙·重九旧韵》、《浣溪沙·菊节》，还有作于元丰五年的《醉蓬莱·重九上君猷》及元丰六年《西江月·重九》。《浣溪沙·重九旧韵》是重阳节送杨元素的作品，苏轼与杨元素是同乡，一见如故，因性格投契，成为知己，但不到三个月两人就面临离别。苏轼对杨元素是“爱君才器两俱全”，大有恨相逢时短之感。重阳佳节是亲人朋友团聚的日子，于佳节送别，让他不禁有“可恨相逢能几日，不知重会是何年”的伤感。另一首重阳节送别的词则由送别引发出不知与谁同聚的感触：“缥缈危楼紫翠间，良辰乐事古难全。感时怀旧独凄然。璧月琼枝空夜夜，菊花人貌自年年。不知来岁与谁看。”（《浣溪沙·菊节》）词中抒发感时伤旧之情怀，预想明年能同今人一起，再同看璧月琼枝，菊花人貌。这些送别之词都从侧面反映了苏轼与朋友之间真挚而深厚的友情。

苏轼早年入仕，意欲施展抱负，有一番作为，而政治本身残酷却使他的一腔豪情付与东流。无端受诬，一生颠沛，更令其满腹愤懑。（下转 54 页）

丑怪显坚美，萧淡寓涌动

——苏轼枯木情结探微

徐晓洪

内容提要：苏轼作为一个传统的中国文人，一个刚直的政治家，其一生充满了诸多坎坷。他在诗词文赋及绘画里引入了诸多的枯木物象，这些枯木物象承载着苏轼的情感、意志与坎坷，成为苏轼自身的缩影。本文就苏轼的枯木情结作了系统的研究，从现象到本质进行了挖掘，旨在发掘一代伟人苏轼的观念价值与人格魅力。

关键词：苏轼 枯木情结 人格魅力

一、苏轼具有很强的枯木情结

要对苏轼的枯木情结进行研究，很有必要弄清楚何谓情结，而枯木情结又是怎样的一种情结。按照词典里的意思“情结”指的是“心中的感情纠葛，深藏心底的感情”。“枯木”一词说起来就比较麻烦些，按照平常的认识，枯木就是干枯的树，木就是树的另一种称呼。当然这也不错，但是要是把木定格在树这一概念，显然是比较片面的，不足以洞悉苏轼的枯木情结的整个内涵。笔者所谈的枯木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既包括枯树还有枯草、枯竹、怪草、怪木等东西，一句话就是比较枯怪的植物范畴。“枯木情结”就是对枯怪的，有异于常态的植物的一种深深眷恋之情。把讨论的对象搞清楚后，我们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探讨，苏轼的枯木情节是如何体现的呢？大致可从以下几方面来断定：

（一）从绘画作品题材来考察

苏轼作为文人画的滥觞者，与文同、李伯时、米芾等建构了文人画的理论体系，同时也在实践上也做出了表率。从现有的苏轼画迹以及史料来看，

苏轼作品的对象基本是对怪石、枯木、衰草、老松以及异竹的描绘（当然苏轼也很喜欢画道释人物画，这不在讨论之列，姑且不谈），不妨试举几例：

1. 《古木怪石图》（眉山三苏祠博物馆藏珂罗版复制品）纸本水墨。图左画一怪石，所谓怪，其石身上满勾的圆形弧线，如果当作石之纹理看去，怎么也无法弄明白其结构。从怪石旁边穿出一株古木，枝头枯杈，极似一组左右分叉的鹿角，但是也有奇处，就是虬曲之树身，到上方竟然转了一个圆圈，见所未见。连追求狂怪的米芾也觉得此画“怪怪奇奇无端”。

2. 《竹石图》（眉山三苏祠博物馆藏珂罗版复制品），画旋转怪石两块，一大一小，大石两旁画两丛竹子，竹子蜿蜒，稀萧，大有枯淡、萧瑟之感。

3. 《老梅图》（眉山三苏祠博物馆藏拓片），图中画怪石两峰，两峰间长出一老梅，树干遒劲，苍老无任何枝丫，而且梅梢已经折断消磨，只在折断处抽出一支新芽，画花两三朵，可谓奇特枯怪也。

4. 《梅花图》（眉山三苏祠博物馆藏拓片），画枯干一枝，老干上长出一新枝，开花数朵，给人以沧桑的感觉。

苏轼的绘画作品流传本身就很罕见，从其窥视八九不离枯怪的草木，显然对枯木有一种特别的感情。

（二）从文学作品来考察

首先我们可以从苏轼的诗词中看到诸多枯木之类意象。

苏轼在《司竹监烧苇园，因召都巡检柴贻勗

左藏，以其徒会猎园下》中写到：

“官园刈苇留枯槎，深冬放火如红霞。枯槎烧尽有根在，春雨一洗皆萌芽。”①

诗中的“枯槎”就是老树的枝杈。从上文的“官园刈苇留枯槎”显示了一种惨淡的感觉。提到“枯槎”的还有《和子由木山饮水二首》其一的“蜀江久不见沧浪，江上枯槎远可将。”②同时在《和子由木山饮水二首》其二中写到：

千年古木卧无梢，浪卷沙翻去似瓢。

几度过秋生藓晕，至今流润应江潮。

泫然疑有蛟龙吐，断处人言霹雳焦。

材大古来无适用，不须郁郁慕山苗。③

以上诗文写了一个木假山的形象，千年的岁月洗礼，随波逐流，形状象水瓢，苔藓横生，大有枯怪的特征。

我们再看《游灵隐寺，得来诗，复用前韵》，其中有：

“乔松百丈苍髯须，扰扰下笑柳与蒲。”④

在《塔前古桧》中有：

“当年双桧是双童，相对无言老更恭。庭雪到腰埋不死，如今化作两苍龙。”⑤

以上二诗中描绘出了老松的年代久远，树上藤蔓缠绕，更显古松的枯涩，好像虬龙一般的刚铮，一“恭”字表达出苏轼对老松的崇敬之情。以及《游武昌寒溪西山寺》中的：

“今朝横江来，一苇寄衰朽。”⑥

还有更为精彩的《铁拄杖》对枯干的描绘：

“柳公手中黑蛇滑，千年老根生乳节。

忽闻铿然爪甲声，四坐惊顾知是铁。”⑦

在这首诗里东坡把千年老根做成的拄杖描写得坚贞铿然，如曲铁盘丝，可见其喜爱程度。我们再来看他的一首回文诗：

“峽南江浅红梅小，小梅红浅江南峽，窥我向疏篱，篱疏向我窥，老人行即到，到即行人老，离别惜残枝，枝残惜别离。”⑧

诗中提到了残枝，寄予了作者深厚的离别之情。以上只是苏轼诗里的部分提及枯木意象的，还有诸多，此处不再赘述。这些意象是苏轼的不同情感的倾注与凝结。除了诗，在苏轼的词《满庭芳》里也有关于枯木的描写，如：

三十三年，今谁存者？算只君与长江。

凛然苍桧，霜干苦难双。闻道司州古县，云溪上、竹坞松窗。江南岸，不因送子，宁肯过吾邦。 攔攔，疏雨过，风林舞破，烟盖

云幢。愿持此邀君，一饮空缸。居士先生老矣，真梦里、相对残缸。歌声断，行人未起，船鼓已逢逢。⑨

词中的“凛然苍桧，霜干苦难双。”表达了苏轼对霜里的桧树的凛然风貌大加赞赏，绝无二异。

其次我们还可以从其文赋作品、杂谈、题跋中得到类似的信息。且看苏轼《墨君堂记》：

然与可独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贤。雍容谈笑，挥洒奋迅而尽君之德。稚壮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势。风雪凌厉以观其操，崖石荦确以致其节。得志，遂茂而不骄；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独立不惧。与可之于君，可谓得其情以尽其性矣。⑩

这段话是苏轼对文与可画竹的赞论。字里行间充满着对竹子枯老的不尽喜爱。同样在《净因院画记》中写到：

与可之于竹石枯木，真可谓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挛拳瘠蹙，如是而条达畅茂，根茎节叶，牙角脉缕，千变万化，未始相袭，而各当其处。合于天造、厌于人意。盖达士之所寓也欤。⑪

这里是对文同竹石枯木图的评价，把画图中枯木的“挛拳瘠蹙枯老”之态写得淋漓尽致，合乎自然之道，透露出深深的恋爱之情。又有：

而余亦善画古木丛竹，因以遗之，使置之苑中。⑫

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释之萧然，如叶脱木。⑬

以上两则表现了苏轼的直接观点，喜欢画古木，对木叶有一种情结。还有：

蜀中多桧木，读如欹仄之“欹”，散材也，独中薪耳。然易长，三年乃拱。故子美诗云：

“饱闻桧木三年大，为致溪边十亩阴。”凡木所芘，其地则瘠。惟桧不然，叶落泥水中，辄腐，能肥田，甚于粪壤，故田家喜种之。得风。叶声发发，如白杨也。“吟风”之句，尤为纪实云。筇竹，亦蜀中竹名也。⑭

这则是苏轼对家乡桧木的描写，桧木样子古怪，可叫怪木，写出了桧木虽为散材，不足为用但也可以做柴火、庇荫、叶可以肥田。

雪斋清境，发于梦想，此间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饮村酒，醉后曳杖放脚，不知远近，亦旷然天真，与武林旧游，未易

议优劣也。何时会合一笑，惟万万自爱。^⑩
段中的古木乃真天然也，可见苏轼对古木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上面从苏轼的画、诗文辞赋以及散文题跋等方面分析了苏轼对枯木的态度，事实是明显的，那就是苏轼具有枯木情结，而且是相当浓郁的枯木情结。

二、苏轼枯木情结原因分析

（一）家庭环境的陶冶

苏轼的浓厚的枯木情结不是偶然的，从小家庭环境的熏陶起了很大的作用，父亲苏洵给了儿子苏轼巨大的影响。苏洵是一个收藏大家，作品数量和质量可与公卿匹敌。他除了收藏有百余品高质量的画作外，还兼收并蓄一些奇异的东西，如木假山、怪石、枯藤做的酒杯等。苏洵曾有《木假山记》记载了木假山的经过和象征意义。苏洵《藤樽》诗“枯藤出幽谷，蹙缩似无才。不意犹为累，剜中作酒杯。君知我好异，赠我酌村醅。”苏洵好怪异，朋友只要有奇特怪异的东西都赠与苏洵。苏轼在这样的影响下，必然潜移默化地对枯木有一种审美与喜爱。事实也是如此，苏轼在后来的记忆里提及了父亲所藏木假山的情况，自己也是十分喜爱木山，有《木山并序》为鉴：

吾先君子尝蓄木山三峰，且为之记与诗。诗人梅二丈圣俞见而赋之。今三十年矣，而犹予千乘，又得五峰，益奇。因次圣俞韵，使并刻之其侧。

木生不愿回万牛，愿终天年仆沙洲。
时来幸逢河伯秋，掀然见怪推不流。
蓬婆雪岭巧雕镂，蛰虫行蚁为豪酋。
阿咸大胆忽持去，河伯好事不汝尤。
城中古沼浸坤轴，一林瘦竹吾菟裘。
二顷良田不难买，三年杞木行可樛。
会将白发对苍巘，鲁人不厌东家丘。^⑪

二诗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木山的喜爱。不仅如此苏轼还为家里的怪石做了纪念，如《咏怪石》：“家有粗险石，植之疏竹轩。”^⑫而且苏轼小时候就对奇形怪状的东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注意搜集。“轼年十二时，于所居纱縠行宅隙地中，与群儿凿地为戏。得异石，如鱼，肤温莹，作浅碧

色。表里皆细银星，扣之铿然。”^⑬可见苏轼从小在父亲苏洵的影响下已经对怪异的木石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贯穿于生命的始终。

（二）文人气格的凸显

中国文化的传承与主体构建几乎可以说与传统文人息息相关，传统文人扛起了中华文化传播的大旗。传承过程中，各个朝代、阶段虽有变化，但实质却未曾改变。那就是“达、退”这种处世观。“达、退”造就了文人雅士追求的境界：“淡泊与趣远”之心，进而到“反常求异”的境地。早在西晋的司马氏统治时期就出现了赫赫有名的“竹林七贤”。他们逍遥畅快，饮酒赋诗，态度消散，俨然怪异。不妨举一例：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⑭

在当今开放的人看来也是几乎难以接受的，除非是当代所谓的人体艺术。显然刘伶是要采取一种领异众人的方式，达到反常独特的目的，同时也是对统治者的一种藐视。宋代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得好“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几乎把文人精神概括得淋漓尽致，那就是儒家主导下的道家与禅宗的凸显——“忧”。在“忧”的基调下，我们无不发现文人诗文的萧瑟荒逸。杜甫《登高》有“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的忧郁美，落木寄予了诗人无限的哀思与历史、人生的反省。绘画上有元代倪云林的荒寒枯树、冷寂清江与萧瑟烟山，诸多例子不胜枚举。总之文人性致对于枯、怪草木显然是最青睐的。苏轼作为传统文人，可谓亦官亦文。在儒家忠君治民的主体思想下，道家与禅宗又成为精神解脱的一剂良药，因此“达、退”升华下的“忧”的文人情节更为凸显。事实也是如此，他无不以忠君爱民为追求，在大起大落中完结了自己的一生。正是这种忧的情节让他沾染了不少萧瑟、淡远以及求异的意趣。因此在他的诗文、杂感、题跋中反复出现枯木、怪木、衰草就非常合理了。

（三）人性魅力的折射

苏轼能够千古流芳，其政治上的坎坷与其独特的人格魅力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苏轼一生为官，先后辗转出任过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颍州、扬州、定州地方官员，也出任过兵部尚书、礼部尚书，中书舍人等朝廷命官，可谓大起大落。但是在最艰苦的时候他能保持一种操守，那就是独立的人格，坚持自己的政见。我们不妨看看：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实行新法（史称“王安石变法”），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当“王安石变法”失败，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五年的杭州当太守。按照现今的人看来，苏轼简直是不识时务，与政治格格不入，就连苏轼自己也承认。据明人曹臣所编《舌华录》载，“苏轼一日饭后散步，拍着肚皮，问左右侍婢：‘你们说说看，此中所装何物？’一婢女应声道：‘都是文章。’苏轼不以为然。另一婢女答道：‘满腹智慧。’苏轼也以为不够恰当。爱妾朝云回答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捧腹大笑。”苏轼的一笑是大加赞赏朝云的回答，同时也对自己的性格颇为得意。其实在苏轼的文章中也若隐若现的透露出他的不合适宜，在《前赤壁赋》中有“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其中的“遗世独立”体现出他的戛戛独造，不以庸俗官员为伍的节操。又有“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此词乐观旷达，表明了苏轼的独立，宁愿艰苦也不改志迎合的操守。苏轼始终保持特立独行的姿态，坚持自己的政治见解，用司马光的话说，是“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用林则徐的话说，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苏轼在《咏怪石》一诗中，借夜梦怪石，听其自道身世的手法，赞扬其“意欲警惧骄君悛”、“万牛喘汗力莫牵”、“雷霆凛霜我不迁”的节操气概和“雕不加文磨不莹”的天然本色，可谓是以怪石自况。苏轼作为四朝老臣，对仁宗、英宗、神宗、哲宗都上书

直言朝政之弊，进行过尖锐的批评，正如《咏怪石》诗句所言，为使君王有所警惧，对政治错误能够悔过，不畏“雷霆凛霜”。回过头来再看苏轼的《古木竹石图》中的枯木盘旋怪异，与一般的木叶相去甚远，而特节独立，俨然是作者自己操守的一种体现。苏轼的自题画诗说得最透彻“枯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枒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写向君家雪色壁。”在错综复杂的宋王朝政治斗争中饱尝仕途的滋味，愤懑不平之气交织于心，发诸毫端，其实质就是借枯木怪石以泄胸中盘郁，表明自己的态度。还有诗词文中的枯木、古木、衰草、老藤等又何尝不是苏轼自己对人生沉浮、思想独立的一种写照与折射呢。

（四）狂禅之风的影响

唐末五代至两宋佛界兴起一股狂禅之风。给当时的文人士大夫思想注入了新的因素。禅宗主张“自心是佛”，因而，初期禅宗强调“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内见自性不动”，（《坛经》）把自性放到了高于一切的位置。同时，初期禅宗也反复指出“自性本净”的道理，人人都有佛性，“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獐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坛经》）到了马祖道一和石头和尚的生活时代，二人进一步强调“平常心是道”，把“自心”进一步具体化，把佛性与日常用事联系起来，强调了自心对个人欲望的顺从，“要困即困，要眠即眠”。无意中，又把自心与个人的随心所欲联系起来。有德山宣鉴才讲出了一席即令今人也目瞪口呆的话来：

这里无祖无佛，达摩是老臊胡，释迦老子是乾屎橛，文殊、普贤是担屎汉，等觉妙觉是破执凡夫，菩提涅槃是系驴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疮疣纸，四果三贤，初心心地是守古塚鬼，自救不了。^⑩

在这股狂禅之风的吹拂下，禅僧和世俗文人的诗文绘画，大多强调心灵对外物的决定作用，心为物宰而不为物役，通过直觉，顿悟而超越外物，进入绝对自由的人生境界。即禅家所谓的“识心见性，自成佛道”，“即时豁然，还得本心”。传统文人思想与禅宗在很大程度进行了融汇，文人与寺僧存在诸多交往与联系。苏轼作为文人的典型代表，喜好交游，同僧人的交往颇为密切。有史料可查的有嵩禅师、大觉禅师、辩才法师、宝月大师、海月长老、圆通长老、秀禅师、佛印

禅师、小本禅师等名僧。其中的佛印喝酒吃肉，行为狂放，《禅林僧宝传》卷二十九有语评：“佛印种性纵横，慧辨敏速。如新生驹，不受控勒。”苏轼常与之喝酒啖肉，性渐近也。苏东坡与天竺辩才法师交游后，也在在诗中有感而发道：“乃知戒律中，妙用谢羁束，何必言《法华》，佯狂啖鱼肉。”^②

正是这种怪异的修禅方式不免对苏轼这样一位道路坎坷，亦儒亦禅的人起到催化作用。这种以见性成佛，不管方式的狂放思想，让苏轼把大量的枯木、怪草移入诗文，融进画里就不足为怪了。只要能达到明心见性，表达心思，枯怪丑异又有何妨。枯木成为明心的中介与物质手段。

三、苏轼枯木情结的价值解构

以上从苏轼产生枯木情结的表现以及原因进行了阐释，下面再对苏轼枯木情结的价值作阐释。

（一）苏轼枯木情节是“比德说”的具体表现

“比德说”在我国源远流长，《诗经》已经广泛采用比兴手法。“比德”就是把人的某种精神品格转移到某个物像上，让其物具有人的某种德行。“比德”具有极其丰富的道德人格内涵和较强的伦理色彩。“比德”的哲学基础是我国独特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哲学观、人生观。“比德”的本质实际上是人的个性的确证与实现，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苏轼的文学作品、绘画作品中一系列的枯木形象怪诞不羁，如果我们单纯把他作为物象——枯木、衰草等来看待显然是非常有限的，也是非常肤浅的。苏轼的枯木物象承载着更多的作者自身的生命意识与本体观念的东西。可以说一系列的枯木意象是苏轼内心信念的物质外化，是苏轼个人情感德行节操在枯木上的外化，透过枯木衰草我们依稀看到了苏轼的坚倔性格。以苏轼的《古木竹石图》为例，画中的枯木树干接近末端突然弯曲一周然后重新伸向天空这种盘结是苏轼的独立人格以及节操的显现。“身世际遇的坎坷曲折与现实的严酷冷漠，自然使苏轼对世俗的美视而不见，在那种雅致的、和谐的、悦目的美中苏轼找不到自己，也无法实现自己，只有

那狰狞的、丑怪的枯木怪石，以其极不和谐的形貌宣示着大自然狂野的力，才让苏轼能够找到自己、确认自己，真正实现心灵对物态天趣的深刻领悟，让自我狂躁的生命与宇宙自然中奔流竞逐的生命合一。”^③至此苏轼的德操与枯木融汇为一。

（二）苏轼枯木情结是“反常”与“审丑”基础上对“坚实美”的体认

应该说苏轼的枯木物象是一种反常与审丑的意识活动。在这种活动中充分注入了一种对坚实美的追求。借用周裕锴先生对苏轼怪石的评价：“坚姿在苏轼有关怪石的诗文作品中，‘坚姿’一类的人格美要比秀色来得更为重要，怪石不仅具有美学价值，也蕴含着伦理学的意义。”^④这里虽然是谈怪石，其实质与枯木有异曲同工之妙。拿苏轼的画来说，在北宋时代，精准、艳丽的院体画是其大宗，相比而言，苏轼的画中的枯木可谓是一种反常，也是一种丑陋的物象，让人看了，似乎有一种抑郁感。但是通过这种抑郁的紧张的力量，我们发现的是一种人格力量的坚实美。这种美不是华丽的炫目的形式美，而是时代与历史积淀下的一种坚实的人性美。不妨再举一例，“柳公手中黑蛇滑，千年老根生乳节。忽闻铿然爪甲声，四坐惊顾知是铁。”在这里苏轼把手杖的那种怪态、奇特表现得淋漓尽致，可谓十分丑怪。但是这种丑怪承载着“铿然”的厚重、铁的坚实，显得那么的美丽和让人兴奋。

（三）、枯木情节是苏轼萧然平淡中蕴含的热血涌动

枯木、衰草等物象于一般人看来，显得萎蔫无生气，萧瑟淡远。如果仔细品味苏轼心中的枯木物象会发现其具有一种历史沉淀剥蚀后的沧桑，具有一种无比的坚实的美（上面已谈及）正因为这种剥蚀赋予了枯木更为深邃厚重的生命意识，那就是一种蓬勃的无限的热血涌动的激情。苏轼在诗文辞赋中大量引用枯木意象，显然这是一种十分正常的现象，前面已经谈到受中国人文精神所影响。枯木蕴藏了苏轼无限的哀愁与沧桑之感，在苏轼坎坷的仕途生活、苦闷的心境下，无疑枯木与之同病相连，形成强烈的共鸣，并且寄托了无限的忧思。比如前面已经引用的“今朝

横江来，一苇寄衰朽”就表现了苏轼心境与枯萎的芦苇的若合一契，从而达到我与物俱化的不辨你我。又如“离别惜残枝，枝残惜别离”句，这里残枝的萧瑟，投合了苏东坡那种与人惜别的无限忧思，可谓跃然纸上。总的说来，各种枯木衰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苏轼的酸涩与萧然平淡。但是仅仅看到枯木的这一层义境显然是不深刻的，更不利于认识苏轼的人格价值。我们知道苏轼思想里本质上是儒家的，消隐遁世的道释思想只不过是暂时的调节剂，起到平衡心里的作用，那种积极入世的热血涌动才是其终极归宿。像《古木怪石图》就构建了一个荒寒简远、韵味无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那似乎随时将旋转滚动的怪石，扭曲紧张的树干，仿佛触角般伸向天空的树枝，甚至那寒风中瑟瑟抖动的衰草，都让人们感觉到生命的亢奋与躁动。那些原本毫无生气的枯木、怪石，经旋转式构形，一下子皆具有强烈的运动感。枯树的盘旋扭曲，怪石的回形纹理犹如苏轼身体的血液系统，在沸腾涌动，具有坚强蓬勃的生命力。仿佛寒冬里的最后蕴蓄，等待春天的抽芽，那种强烈的蓄势，为爆发的生命力提供了无限的力量，不免让人心潮澎湃。且看“官园刈苇留枯槎，深冬放火如红霞。枯槎烧尽有根在，春雨一洗皆萌芽。”这里深冬的枯槎放红，绚烂如朝霞，只要根在，春雨一来，又焕发生机，爆发强大的生命力。又如“泫然疑有蛟龙吐，断处人言霹雳焦。材大古来无适用，不须郁郁慕山苗。”表达了东坡的奋然与昂扬，一句“不须郁郁慕山苗”是何等的乐观与宽博，表现出积极的人生态度。

四、小结

苏轼对于枯木寄予深厚的感情，也即情结。在这种情结中，苏轼与枯木俱化，让其为“我”代言，以此达到情感的宣泄与价值的实现。可以说枯木情结是苏轼整个人文精神、政治主张的一个终极展示。

论文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6、220、220、323、393、1049、1064、2605、421页。

⑩《苏东坡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第680页。

⑪唐圭璋主编《唐宋词鉴赏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73页。

⑫、⑬、⑭、⑮、⑯、⑰、⑱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5、367、365、558、2551、1092、1604、556页。

⑲《世说新语》。

⑳《五灯会元》卷七。

㉑陈晓春《苏轼绘画艺术管窥》，四川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㉒周裕锴《苏轼的嗜石兴味与宋代文人的审美观念》，《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1期。

（四川省眉山三苏祠博物馆）

（上接48页）

面对失败，苏轼只能用旷达的胸怀来面对得失荣辱。苏轼的重阳诗词常常表现悲秋的主题，往往通过对家人的怀念以及对自身命运的感伤升华悲秋的主题，既表现了苏轼效命时世的渴望和生不逢时的悲伤，也凸显了苏轼透彻达观的人生态度和旷达不羁的乐观情怀。

论文注释：

①杨海明《唐宋词中流行的“季节病”——谈词中“佳人伤春”和“男士悲秋”》，《辽宁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

②（元）脱脱等著《宋史》，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0818-10819页。

③（唐）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581页。

④张振玉译、林语堂著《苏东坡传》，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3页。

⑤杨海明《从苏词看苏轼的人生感悟及处世态度》，《山西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⑥莫砺锋《漫话东坡》，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123页。

⑦（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300页。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2007级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苏轼与青神陈公弼父子情缘

吴梁红

内容提要：本文以苏轼诗文和历史文献为依据，梳理苏轼与陈公弼、陈慥父子的交往和情谊。

关键词：苏轼 陈公弼 陈慥 情缘

作为眉山青神人，我特别关注苏轼与青神王弗、王闰之堂姐妹的姻缘以及他与陈公弼、陈慥父子的情缘。

苏轼初出仕途，在凤翔任职三年，和太守陈公弼相处并不愉快，可他却在位上死前为他写了《陈公弼传》，成为他一生不可多得的传记之一。而陈公弼的儿子陈慥则在他第一次贬谪黄州时“白马青盖”相迎，诗酒唱和，七到黄州。苏轼也为他留下了《方山子传》。笔者认为陈氏父子和他们的独特情谊在苏轼仕途的关键时期对他的精神影响颇为深刻。

陈公弼名希亮，字公弼，眉山青神人，为人寡欲清白耿直，面目严肃冷峻，不露喜怒之色。他自幼丧父，与其两个侄子都考中了天圣八年进士。为官几十年多为司法官员，平叛治乱杀豪强颇有政绩，曾任长沙、粤都、临津县令，房州、宿州、滑州知州，开封府司隶，江东路、河北路提点刑狱，判三司户部勾院兼任开拆司，京西路、京东路转运使，凤翔府知府等职。他与苏洵是旧交，对苏轼严格得不近人情，常对他写的公文反复涂墨数次才改定，令年轻而初入仕途的苏轼忍无可忍。但这都是为了历练年轻气盛而喜怒兼形于色的苏轼，提高他的韧性和耐性，希望弥补其性格缺陷。

苏轼有首著名的《客位假寐（因谒凤翔府守陈公弼）》诗：“谒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岂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同僚不解事，愠色见髭须。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苏轼诗集》卷四）

这首诗描述了苏轼初入仕途在凤翔做签判时拜谒老太守陈希亮（字公弼）受到冷遇的情形。时年27岁的苏轼作为皇帝赏识的才子委派到任半年，受到百姓和同事认同，却被新任太守陈公弼“压制”。以致自负的苏轼中秋也不去参加例行宴席，于是被罚铜八斤。

第二年凤翔久旱不雨，苏轼率众祈雨得雨，曾率性而作《喜雨亭记》，后陈太守疏浚东湖，筑凌虚台，命他作记。于是苏轼作《凌虚台记》。该记文采飞扬，以民之喜忧为喜忧，但此文多有借

机讥讽太守之意，可太守还是让人将其刻在碑上，从而肯定了苏轼的民本位思想。这对初入仕途从政的苏轼来说，更是奠定了他从政为民的终生信念，是一次深刻的从政思想教育。

在苏轼有了不少官场体验后，为去世的老太守作《陈公弼传》中憾然写道：“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

也是在凤翔，苏轼结交了陈太守的第四个儿子陈慥，他字季常，从父命没有出仕为官，跟随父亲来到凤翔，伺候父母的衣食住行。他谈吐文雅，性情豪爽，是酒徒兼侠客式的人物，与苏轼一见如故。苏轼曾向他学习格斗、射箭等武艺，且日有长进，这为他后来在密州训练军士、组织民兵抗敌打下了基础。

元丰三年，苏轼谪黄州，至岐亭。有白马青盖来迎，乃故人陈慥也。其时他隐居于黄州之岐亭，自称龙丘先生，又号方山子。其时苏轼留五日赋诗而别。

陈慥妻子柳氏很凶妒，苏轼有诗云：“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东狮子指柳氏也。

苏轼被贬黄州，五到岐亭，陈慥七到黄州，足见其情谊之深厚。苏轼初贬黄州45岁，1080年1月25日初到岐亭，陈慥以“白马青盖”隆重迎接；1081年1月苏轼二往岐亭，道上见梅花，作《岐亭》（之二）诗；同年12月，苏轼第三次去岐亭，住静庵，与之雪中赏梅并作诗（《岐亭》之三）；1082年12月，苏轼第四次去岐亭，作《岐亭》之四；1083年6月，陈慥妻亡故，苏轼作慰疏，11月第五次前往岐亭。在此期间，陈慥则七次到黄州。1084年4月1日，苏轼自黄州迁汝州，留别雪堂，作《满庭芳·归去来兮》。陈慥等送至九江。陈慥还独自在九江守候至六月，等苏轼从高安返回九江后才依依分手，苏轼作《岐亭》之五诗赠之。

陈慥等人的深情厚谊给了贫病和余悸交加的苏轼以极大的慰藉，使得苏轼能重新站起来，并始终以这些在危难之时给予他精神营养的布衣贫民为立政的根基。可以这么说，苏轼既是一个根植于百姓的艺术家，也是一个忠诚于人民群众的为政者，其民本民生的思想至死不改。

（眉山市政协文史科）

故园望断 峨眉横绝

——苏轼《寄黎眉州》赏析三题

山流水

胶西高处望西川，应在孤云落照边。
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翠扫雨余天。
治经方笑春秋学，好士今无六一贤。
且待渊明赋归去，共将诗酒趁流年。

一、情景素描

游子的眺望是思乡的惆怅，抛洒在如洗的碧空，浸透在如血的残阳，回旋在如画的常山；游子的眺望是落照的憧憬，搭乘小舟的孤云，穿透天空的渺茫，抵达故乡的跫音。

在这样的季节，在这样的雨后，在这样的天空，在这样的時候，有这样的奇观：白雪皑皑的瓦屋山在天空闪耀成天麻、山药和冷笋的森林，翠色欲流的峨眉山被天空渲染成秀色、峨眉和乡思的烟云。

执政“断烂朝报”的戏语，击碎了《春秋》经典的光环、解经学者的梦想、“奋厉当世”的理想和“六一居士”的贤明。理想与现实碰撞成为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渊明赋归”的向往、山水田园的理想和饮酒赋诗的风流，酝酿、演绎、变幻为诗意的栖居。

二、文本分析

此诗作于熙宁九年（1076）春天，苏轼知密州时。

《寄黎眉州》表现了浓浓的思乡之情、思归之意。“寄”，寄赠之意；“黎眉州”，名錞，字希声，渠江（今四川广安）人，熙宁八年，他以尚书屯田郎中出知眉州，所以称“黎眉州”。苏轼《眉州远景楼记》云：“太守黎希声，先君子之友人也。”他既属苏轼长辈，又为忘年之交。《东坡志林》云：“希声治春秋有家法，文忠公喜之。然为人质木迟缓，刘贡父戏为黎檬子。黎以为指其德，不知果木中真有是也。一日联骑出，市人有鬻之者，大笑几落马。今吾谪海南，所居有此木，霜实累累。然二君皆以登鬼录，坐念故友之风味，岂可复得！”黎檬子即柠檬，文中的伤感、怀念之情跃然纸上。

一二句望乡：站在密州的高山之巔向西眺望，故乡应该就在那太阳落山的云朵下边。眺望故乡，令人肠断。胶西：古郡、国名。此指代密州。据《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一云：“汉文帝十六年分齐立胶西国，都高密。”又，“后魏永安二年，分青州立胶州，取胶水为名也。隋开皇五年改胶州为密州。”西川：宋代十五路之一，治所在益州（今四川成都），眉州在其辖境内，此处代指故乡。

三四句回忆：春天雨后，空气如洗，白雪皑皑的瓦屋山和翠色欲流的峨眉山出现在故乡的天空。峨眉横空，超绝古今。瓦屋：山名，今属眉山市洪雅县，国家级森林公园。《輿地纪胜》卷一四七云：“瓦屋山在荣经县东一百二十里，形如瓦屋。”峨眉：山名，今属比邻眉山的乐山市，四大佛教名山之一。《水经注》：“峨眉山去成都南千里，秋日清澄，望见两山相峙，如峨眉焉。”

明曹学佺诗云：“双峰缥缈谁画眉，挂在长空不可尽。”

五六句联想：现在，执政的王安石“尊经”却嘲笑《春秋》经，再也没有像欧阳修那样的伯乐赏识、重用我们了。黎錞以《春秋》受知欧阳文忠公，著有《春秋经解》。这时王安石执政，他素不喜《春秋》，说那是一本古代的“断烂朝报”。欧阳修以“藏书一万卷、集采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自号“六一居士”。他曾以“文行苏洵，经术黎錞”向英宗推荐。

七八句抒怀：姑且等待我像陶渊明那样弃官归隐，与你一道在眉州饮酒赋诗来度过余年吧！晋陶渊明弃官归隐，作《归去来兮辞》，这里作者以此自况。流年：《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指像流水一样逝去的光阴。

《纪评苏诗》卷一四评此诗云：“悬空掷笔而下，起势极为超拔，三、四接得有力，后半亦沈着。”颇为中肯。

三、心理透析

故乡是心灵的母亲，她的怀抱、她的温馨、她的慰藉无可替代。如《司马温公诗话》云：“范景仁年六十三致仕，一朝思乡里，遂径行入蜀。至成都，日与乡人乐饮，散财于亲旧之贫者。遂游峨眉青城山，下巫峡，出荆门。凡期岁，乃还京师。”范镇如此，苏东坡亦如此。

读此诗，扑面而来的是浓重的故乡情结，峨眉成为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一个向往，如“每逢蜀叟谈终日，便觉峨眉翠扫空。”（《秀州报本禅院乡僧文长老方丈》）“已泛平湖思濯锦，更看横翠忆峨眉。”（《法惠寺横翠阁》）“东望峨眉小，卢山翠作堆。”（《出城送客，不及，步至溪上，二首》其二）“君不见峨眉山西雪千里，北望成都如井底。”（《雪斋》）“先生一去五百载，犹在峨眉西崦中。”（《题孙思邈真》）“公家列屋闲峨眉，珠帘不动花阴移。……百岁风狂定何有，羨君今作峨眉叟。”（《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观，将老焉》）“当年入蜀叹空回，未见峨眉肯再来。”（《送贾讷倅眉二首》其一）“我家峨眉阴，与子同一邦。相望六十里，共饮

玻璃江。”（《送杨孟容》）“但见玉峰横太白，便从鸟道绝峨眉。”（《双石》）“峨眉向我笑，锦水为君容。”（《次前韵寄子由》）“当时半破峨眉月，还在平羌江水中。”（《送海印禅师偈并引》）

在密州任上，苏轼思乡、思归的原因何在？

客观原因有三：因为仕途的挫折坎坷，因为故乡的亲朋好友，因为故乡的山川风物。

其一：治经方笑春秋学，好士今无一六贤。南宋陈善说：“唐文章三变，宋朝文章亦三变矣。荆公以经术，东坡以议论，程氏以性理。三者要各自立门户，不相蹈袭。”以经术名世的王安石却笑弃春秋，使春秋学者黎錞怀才不遇；以变法名世的王安石却轻蔑变革，使力主变革的苏东坡怀才不遇。所以，再也遇不到像欧阳修那样的伯乐了。

其二：且待渊明赋归去，共将诗酒趁流年。弃官归隐眉山，还因为故乡有忘年之交的黎錞，大家可以一块饮酒赋诗，以安度余年。

其三：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翠扫雨余天。弃官归隐眉山，还因为故乡山清水秀，尤其是瓦屋山与峨眉山令人神往。李白诗云：“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

主观原因是理想受挫，退避独善。苏轼兄弟科考得意，名震京师，仁宗高兴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欧阳修《与梅圣俞书》云：“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但是，平步青云的苏轼却遭遇了王安石变法，这就是他的宿命。既然不能致君尧舜、奋厉当世，何不退避归隐、独善其身呢？

（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

《天涯守望 ——苏东坡晚年的海南岁月》前言

阮忠

东坡也许没有想给我们留下一个巨人的身影，而是以性情驭才学，真诚地面对外部世界和自我的内心世界。他一生博学多识，对社会充满了激情与关爱，甚至与政治上的对手、宋神宗时代政治革新的领袖王安石也是不错的朋友。但政治革新引发的新旧党争最终把“不合时宜”的他彻底边缘化了，丝毫都不顾及他的个人意愿。东坡边缘化的极端是流贬儋州，孤悬海外，名为琼州别驾却不得过问公事，做了火热政坛的局外人。

这实在不是东坡的福份，让他所具的不凡政治才干只能内敛而难以发散；这又是东坡的福份，让他的不平转化为创作的潜能和新的生活。东坡长于化苦为乐，笑面人生，谪黄州则安于黄州，贬惠州则乐于惠州，并把这份特有的安乐延续到身处最偏远的儋州。并不因他难以为人企及的才学与遭际的巨大反差而陷于怨恨的苦海，抑郁不振。这种人生境界贯穿着他的一生，从而淡化了他初赴儋州时深感天涯无归路的没落情怀，以“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①的泰然，开始了晚年在儋州的岁月。

东坡被贬惠州的时候，自以为是人生的最后归宿。他“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②的表白，虽然可以视为浪漫诗情而不是心态的纪实。但他在惠州白鹤山建了新居，并让儿孙在惠州聚集则是真切地想把惠州作为栖息地。晚年的他实在是不想再四处漂泊，也无意于在政坛上做弄潮儿。然而他的贬谪命运没有就此终结，从海北赴海南，离惠州迁儋州，一海之隔带来不同的地域和人文环境，使他在走出人生艰难的境况下重新进入艰难人生。这是他不曾想到的，但他却在快乐地承受。

儋州三年的东坡，生活方式相当简单：读书、饮酒、交往、写作，除了儋州的乡亲之外，朋友满天下的东坡多守孤寂，虽说有小儿子苏过相伴，孤寂总还是存在。因此他曾有过“苦行僧”之叹。不过，他善于把自我融入当地的人群中，成为儋州乡亲的朋友，以致有“我本海南民”的诗篇。而且，他以诗歌架起通向陶渊明的桥梁，让陶渊明成为自己的“伴侣”，并以诗达成彼此心灵的高度契合。儋州对于他来说，固然是流贬之地，何尝又不是陶渊明式的“田园”？这块“田园”足以净化他的入世之心，消解曾经有的以及正在遭遇的痛苦，他仍然是那样爱恋着生活。

在这样的时候，东坡对亲情的倚重如旧，尤其是对苏辙、他习惯称的子由。二人是兄弟，是诗友，相居两地的诗歌酬唱，是精神的沟通、情感的宣泄，同时意味着对方是各自的心灵靠山。只要有兄弟在，血就总是热的。当东坡与世长辞，苏辙真的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终日默坐走向人生的尽头。因此，东坡活着的时候，无论子由在何方，终有子由，这也该是东坡的幸事了。也因为子由，东坡在儋州才多了牵挂，也多了诗兴，那么东坡有一子由，也是儋州的幸事了，不然怎会留给儋州那么多美妙的诗篇？

尽管是在天涯海角，东坡一刻没有停止的是他的思想。在他身上，最明显地体现了北宋儒、道、释三教融合的轨迹。东坡在思想上，奉儒为主流，这牵引了他人生的最根本的方向。他曾自愧不能像陶渊明那样退居归隐，是他奉儒之后对社会政治的关怀超越了陶渊明，当然也是他的政治才华远在陶渊明之上。所以他曾经锐意地入仕，投身社会变革而不知退缩。但在他的思想深处，

道家的自然、道教的求仙、佛教的修行都有一定的位置。当他失意于儒学进取的时候，能够静下来获得属于自我的心灵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感受着岁月的飘然而逝，适性独行，无所羁绊，人生的潇洒和旷达都在其中。

东坡北归，对海南的依恋和内移的愉悦都是有的。他从儋州到常州的路刚好走了一年，这一年的一路上，让他密集地感受了亲情、友爱和人生的悲痛，而他本想在常州颐养天年的，到常州之后来不及进入这种生活状态，就在重病中告别了人世，把不尽的哀伤留给了后人。东坡之死，是一盏智慧之灯的熄灭，他那充盈的智慧之火不再燃烧，终为憾事。殊不知，“灯”是可以熄灭的，但“智慧”永恒。从此以后，人们在诗、文、词等诸多领域看到了不朽的东坡身影，在品味他人生的同时，也领略着他那淡泊博大的胸襟。满眼都是好人的东坡，也让后人对他有“好人”的评说。这一平凡的字眼和他死后获得的哀荣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但这一评说，也许是东坡最希望得到的。

东坡让我们有太多的话想说，但这里还是得打住。因为我们正悄然推开一扇大门，大门内是儋州时期的东坡世界，那里有东坡人生的最后华章。

论文注释：

①苏轼：《苏轼诗集·独觉》，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284页。

②苏轼：《苏轼诗集·食荔枝二首其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94页。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阮忠著《天涯守望——苏东坡晚年的海南岁月》
南方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
定价：42.00元

（上接30页）

绍圣元年，诏责宁远军节度，惠州安置的苏东坡在虔州祥符宫拜过九天采访使者，观观妙法像之后，乞得一签，签中说：“平生常无患，见善其何乐。执心既坚固，自励勤修学。”这道灵签明示苏东坡为大善之人，但往后的日子还必须自强自励勤苦修学。苏东坡为了感谢圣明的启示，特书《庄子·养生主》一篇，致自励之意。并发大愿说：“敢有废坠，真圣殛之。”殛，即为诛杀之意。

当苏东坡经过广州的时候，天庆观道士何德顺告诉他广州有女仙降临一事。苏东坡有感于人世多神仙所为奇异之事而俗人昏昏不觉，故作《记女仙》一文以警世人。文中强调：“神仙之有无，真不可以意度也。”

在广州，苏东坡慕名观瞻了安期生得道升天之所。安期生为秦汉时期的千岁翁。秦始皇东游，曾与其交谈三日三夜，临行赐金璧值数千万，安期生皆封置不动而去。安期生与汉人蒯通友善，曾给项羽献计献策，但项羽不能用。项羽封安期生、蒯通官爵，皆不肯受，自此退隐深山。苏东坡遗憾自己未能见到安期生，故作诗自嘲：“而今只有花含笑，笑道秦皇欲学仙。”

当年九月二十七日，苏东坡平生第一次游览罗浮山。罗浮山为道家胜地，道书称其为“朱明耀真之天”。晋代的葛洪、单道开皆得道于此。

苏东坡在罗浮山，听说有一官吏游览山中之时，得见路途之中有道观数十间，一道士据槛而坐，见官吏不起。那官吏大怒，使人诘之。人至其处，则道人及楼观皆不见。苏东坡感叹罗浮山凡圣杂处，能见此奇境者，必有前缘。然官吏自己却一无所知……

谪居惠州，苏东坡与罗浮山冲虚观邓守安道士往来密切。时间稍长一点不见，苏东坡要么托人送去好酒佳茶，要么请邓道士到惠州一叙。邓守安道士是苏东坡谪居惠州时期给予他精神安慰最多的道家之友。

当苏东坡真一酒酿造成功之时，苏东坡特请邓道士前来惠州拜奠北斗真君。

当苏东坡痔病复发，痛苦难堪之时，邓道士嘱其远离鱼肉腥酸之味，以清淡食物调养。

（未完待续，东坡赤壁风景区管理处副研究员）

无冕学者，苏学大家

——孔凡礼苏学研究概述

石钟扬

一 新的学术生涯：整理苏轼诗文集

“四人帮”粉碎后的第一个春天，孔凡礼在《光明日报》上惊喜地看到一则关于古籍整理的简讯。一天，他在平安里的电车站遇到中华书局编辑刘尚荣，互相来不及寒暄，就谈起中华书局的新动向。刘尚荣的母亲住在西四北八条，离孔住地（西城育德胡同）不远，过了两天，孔到那里去找刘，因为刘几乎每个礼拜天都要回家看母亲。刘尚荣带来一份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出版部门共同拟订的文学古籍出版规划。看了这规划，他精神为之一振，想先试着整理宋代一两个中小作家的集子，先练练差不多僵化的手笔。在刘面前，他没有说得那么具体，只是说想做点什么。其实中华书局并没有忘记这位治学特别严谨的老朋友。没过几天，刘尚荣就转达中华书局经过研究的意思，希望他担当起整理苏轼著作的任务；并说鉴于苏轼著作多，诗文集分开整理，先诗后文，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中的两种，是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制定的“八五计划”及“九年规划”中的重点项目。这实在大大超出他的意料。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当然是中华书局对他的莫大信任，

他知道这项任务极为艰巨。第一，苏轼是北宋时代的文学巨匠，唐宋八大家之一，眉山三苏的中坚，诗文浩如烟海，内容纷纭复杂；第二，仅就标点而言，苏轼诗文不像李杜诗集、或韩柳文集都曾有过句读本可供借鉴。这种项目通常需要组织一个班子，集体攻坚；而今由他独立完成，该是何等艰巨。但艰巨正是锻炼自己、提高自己的好机会。况且，他素来喜爱苏轼作品，自己就拥有万有文库本《苏东坡集》、四部丛刊初编影元

刊本《集注分类东坡诗》、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文革”前他在北京图书馆读书时也搜集了一些苏轼的相关资料，准备搞《苏轼资料汇编》。这些有利于苏轼诗文集的整理。

不过，他还知道当时整理古籍没有稿酬，只有三十套样书相赠。对此，他全不计较。一九七七年三月底，孔凡礼开始点校《苏轼诗集》。一开始他就想如何才能使经过点校整理的《苏轼诗集》具有鲜明的特色和长久的生命力呢？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决定首先从汇校上下工夫。

历代流传的苏诗版本很多，有大量异文。苏诗是我国古典文学宝库中的珍贵遗产，为了全面继承这份遗产，他想把历代主要的苏诗版本的异文，用汇校的方式，全部记录下来，为研究者的深入探讨提供一些方便。他把这个想法告诉该书责任编辑刘尚荣，刘表示同意。

他使用的校本有宋刊本十一种，元、明、清刊本各二种。还有包括金石碑帖在内的其他大量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资料。宋刊本十一种中，价值最高而又最难得的是每半叶十行的《东坡集》、《东坡后集》和影印宋景定补刊的施元之、顾禧注《东坡先生诗》三十四卷本。

这些是前辈苏诗学者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稀世珍宝。有的善本藏在台北、日本及美国。当时与海外的文化交流，还不能与今日相比拟。但刘尚荣在中华书局强有力的支持下，辗转得到了这几种珍宝。为利用这些有利条件贡献出一部精美的《苏轼诗集》，他恨不得一口汲尽西江水。三夏，蜗居小屋内暑气逼人，他挥汗如雨，手不停披。三冬，他回太湖老家过春节，在那间堆满柴草、光线阴暗的百年老屋里，呵冻挥毫。他在跟时间赛跑，真是分秒必争，“适伴东坡忘客至”，正是他校书的写照。

校勘古籍是异常艰难的工作。往往开始工作是精力充沛，校着校着精力不济，该校的地方就漏掉了。有时贪图校勘速度，也会出现漏校现象。这样，一校以后，觉得需要再校一次。二校以后，还不放心，于是决定三校。有的地方还要四校、五校。有时花几天时间，只校出三五处异文，他仍视为不小的收获，心里甜滋滋的。自己拥有的和中华书局提供的版本，在北京陋室或在太湖老屋伏案精校都好办。最让他为难的是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孤本：宋黄善夫家塾刊《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宋刊《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等。“文革”前，他拿着中学的介绍信，就能领取北京图书馆善本室或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阅览证。“文革”后，这些单位不向中学开放，他必须从中华书局开介绍信才能进北图，而且一张介绍信只能看一种或少数几种书，那时北图善本室有位许女士，对工作极端认真负责。她看到孔一而再、再而三地校读一部书，就严肃地说，如此频繁地使用，会影响书和胶卷的寿命。孔只得硬着头皮去看书，有时不得不隔几天再去。当看到书单上还是他借过的那些书时，她立即沉下了脸。刘尚荣了解这苦衷后，几次亲自登门以中华书局的名义求情，局面才稍有缓解。

这样，以清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为底本校勘苏诗；全部苏诗，孔凡礼读了五十遍以上，写下了七千多条校勘记，囊括了现在能见到的苏诗十七种善本的全部异文。孔本《苏轼诗集》以信息量大，资料翔赡，校订精审，收诗最多成为苏诗研究史上难得的精品。

煌煌大观的《苏轼诗集》刚刚脱手，孔凡礼又转而整理起《苏轼文集》。历史上第一部专收苏轼诸体文章的是明万历年间茅维刊行的《苏文忠公全集》，这个文集在清代以《东坡先生全集》为名，多次刊行。书中偶有他集互见的篇目，有重复的篇目，讹、脱、衍、异文较苏轼诗集多得多，他以茅本为底本，用九种宋刊、明刻善本通校，用金石碑帖、宋人别集、方志年谱等参校，用《宋大诏令集》、《历代名臣奏议》等备考，还参酌利用前贤校订成果。总之将传统的本校、对校、他校、理校诸法综合利用，录存了大量有参考意义的异文，对重出疑伪篇目也有恰当处理。加上后面提到的志在搜罗无遗的辑佚和对苏轼重要著作《艾子》的肯定并收入，孔本《苏轼文集》堪称

苏集定本。

《苏轼文集》前人从来没有全面校勘过，其工作量远较整理苏诗艰巨。此外，还有比苏诗更多的考疑、辑佚工作要做。

孔凡礼以六、七年之功，翻阅了宋代和宋以后各类著作三四百种，从其中一百一十多种中辑得苏轼佚文四百多篇，而成《苏轼佚文汇编》，附于苏轼文集之后。辑佚虽不能说像是“大海捞针”，可也不是一枪就能打一只鸟。所需要的是对苏文全盘了然于心，而处处做有心人，首先是从苏轼同时代作家作品中找线索，再充分利用类书、金石碑帖和地方志，才有可能有意外收获。

孔凡礼乐此不倦，他把辑佚的过程视为一首美妙的诗章。

孔凡礼的一个学生郭小栓，性格温和，孔很喜欢他，两家住得很近，往来方便。郭毕业后在国子监首都博物馆工作。一九八一年冬季的一天，郭给孔老师一张参观历代碑刻展览的入场券，展览是北京市文物商店举办的。在宋代碑帖中展出了苏轼给文同（与可）书简的一部分。孔准确地记得《苏轼文集》的底本——《苏文忠公全集》中只收了三篇《与文与可书》，而眼前展出的，仿佛不在其中。于是他拿出随身携带的小本本，隔着玻璃柜，一字一字地抄下来。回家一对，果然不见于底本，他大喜过望。第二天他带着纸笔和老朋友翁荣溥一起去了博物馆，通过郭小栓，经反复请求，博物馆领导终于同意在博物馆内抄录苏帖全文，馆方给了他们三个小时，并由郭小栓找一个地方，老哥俩动手抄起来，苏字有行有草，一时辨认不清的字就依样画葫芦。（孔庆幸当时社会风气尚好，如果是一切向钱看的今天，不知花多少钱才能办成这事）。后又听说博物馆有位研究碑帖的秦公，摄下了苏帖全文。从郭小栓那里知道秦公住城南潘家巷。一九八二年夏日，孔去拜访秦，见他住在大杂院中的一间小屋里，却处之泰然，他也十分喜爱东坡诗文书法，于是有了共同语言。孔提出借他所拍摄的东坡帖胶卷用一周，秦慨然同意。在秦的陋室喝着白开水，真如饮玉液琼浆，孔凡礼感激不已。借回胶卷，孔仔细核对辨认，从而辑出苏轼书简二十多篇，经考证，这是西楼帖，汪应辰刻于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共三十卷，久佚。清初出现十卷，宣统年间影印行世。这次展出的则是残卷的另一部分，

出于原刻本，没有想到，这些经历八百多年风风雨雨的珍品，又能重见天日。此时孔凡礼陶醉在诗一样的美妙境界中。

孔凡礼锐意穷搜，继《苏轼佚文汇编》附《苏轼文集》行世后八年，复得苏轼佚文一百多篇。成《苏轼佚文汇编拾遗》二卷，再后近十年，复得苏轼佚文十二篇，成《苏轼佚文汇编拾遗补》一卷。这是继茅维之后，苏文辑佚的最大成果。

清初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书》卷十收有苏轼给友人公弼郎中的一封短简，这个公弼是谁？孔凡礼遍查苏轼全部著作、同时代人著作及地方志等，没有搞清楚。苏轼此简作于宋神宗熙宁八年，苏轼当时在密州（今山东诸城）。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一日，孔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朱靖华、诸城市博物馆前副馆长任日新、诸城市史志办主任邹金祥结伴到九仙山中寻访苏轼遗迹。攀山途中，孔谈到石刻题名之类话题，任日新若有所思，拿出一个普查文物的记录本，其中记有在距九仙山深处十余里的大石棚的题名碑，其中有一则为：“褚士言公弼，口中立子达，壬寅四月同游。”孔凡礼不由得老夫聊发少年狂，大呼：“不虚此行！”原来“公弼”是褚士言的字。壬寅乃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距离熙宁八年（1075）不过十三年。再查《苏轼文集》卷六十二《密州请臬长老疏》提到褚郎中，此公弼即褚士言无疑。大约可以说，如果孔凡礼不到这深山来考察，“公弼”是谁的公案，也许就永远无法解开。因为任日新虽抄下了这个题名碑文，并不知这个题石与苏轼有何联系。大石棚太峻峭，一般人视为畏途，将来即或有路可通，也未必有人熟悉苏轼交游达到孔凡礼的程度，而去仔细考察这个题石碑文。那天，孔凡礼以七十一岁之躯，攀山越岭，的确极累极累，但心里非常愉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吃了大苦，却破解一大迷，不由得诗性大作：

几费功夫踏铁鞋，九仙深处豁然开。

千年石刻分明在，笑与任翁醉一回。

他与任日新等相约回到诸城后要举杯共醉。

李之仪（端叔）与苏轼关系密切，而李的晚辈周紫芝又与李关系密切。周不及见苏轼，但周可能从李或李一辈人中了解到苏轼的故事，转而对苏轼有所评述。于是他细心阅读周的《太仓稊米集》，果然从中发现不少关于苏轼的资料，特别是卷七《夜读〈艾子〉书其尾》一诗，更为珍惜，他以这首诗为主要依据，撰成《艾子是苏轼的作

品》一文，发表于《文学遗产》一九八五年第三期。《艾子》是否是苏轼所做，自宋以来无定说。从孔文之后遂成定论。学术界以为这是苏轼研究史上重大贡献，这不仅考定了《艾子》的著作权，更为苏轼寓言研究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孔凡礼在整理苏轼诗文集之初，重校勘与辑佚而轻标点。心想，标点嘛，圈圈点点，核对引文勤点就行，算不了大事。在标点苏诗注文时，他核对了全部十三经引文，大部分前四史引文和其他书，发现了一些问题，并改正了底本上的一些错误，自以为差不多了。后来不断发现这方面的疏漏，才如服了清凉剂，真正认识到标点的分量。诚如鲁迅所说，“标点古文”，“自误事小，误人可似乎不大好”。苏诗注文涉及到天文、地理、历史、典章制度、文学、技术、宗教、考古、音韵、训诂、方言、动植物、矿物等等，领域广阔无边，远不是翻翻十三经、前四史所能了事。鲁迅曾说翻译果戈理《死魂灵》时“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孔凡礼点校苏轼诗文时，岂止是冷汗不离身，而且是无夜不失眠，真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苏轼诗集》出版之后，语言学大师吕叔湘审读了部分篇目，发现了一些问题。例如《苏轼诗集》卷二十《初到黄州》“老来事业转荒唐”注文：“李台虾言韩昭曰：‘韩八座事业，如拆韃线，无一条长者。’”本意是李台虾说韩昭其人如何如何。“韩八座”就是韩昭。孔原在“李台虾言”的“言”字后，加一冒号，整个意思就变成韩昭自己说自己了，岂不荒谬。

还有《苏轼诗集》卷二十九诗题：“昨日韩丞相言王定国，今日玉堂独坐，有怀其人。”而孔在“相”后加逗号，“国”字后却没有逗号。按这样标法，“今日玉堂独坐”的是王定国。而事实是，“今日玉堂独坐”的是苏轼自己，怀其人乃怀王定国。孔把整个意思弄错了。

得到吕先生的指点，孔凡礼佩服得五体投地。透过这两例不仅说明他功力有待提高，而且功夫也还没有做到家。事非经过不知难。吕先生点拨的意义远远超过标点本身。从此以后，孔就更加小心谨慎，更多地翻阅典籍，且勤于思索。

说起勤于思索，孔凡礼还从启功先生那里得到过有益的启示，《苏轼诗集》卷十九，元丰二年作于开封御史台狱中的诗句：“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启功说“世世”与“来生”不

对应，应是“此世”或“今世”。根据启功的提示，孔从宋景定补刊施元之、顾禧注《东坡先生诗》找到了依据，因改“世世”为“今世”。

经过多年毫不懈怠的艰苦实践，孔凡礼点校的功力与功夫都有长足进展，到点校《苏轼文集》时，就顺利多了。孔凡礼将这不断实践不断总结提高的过程，比作航行在河道中，经过反复勘察，能隐约地感到暗礁险滩在哪里，从而为扫除这些障碍做出努力。

孔凡礼点校整理的《苏轼诗集》（八册，一百六十四万字）、《苏轼文集》（六册，一百八十万字），作为国家“八五”计划、“九年规划”重点图书项目，由中华书局分别于一九八二年、一九八六年出版，后又多次修订重印。海内外学界广为称誉，视为近百年来苏轼研究最有价值的成果之一。二十多年来，两书常印不衰，就是它强大生命力的证明。

二 更上一层楼：编撰三苏年谱

后来的实践证明，孔凡礼的痛苦选择换来的确实是学术研究的极大自由。

早在一九七七年点校苏轼文集之初，孔凡礼就注意到从北宋以来就不断有学者为苏轼编年谱，有传下来的，有没有传下来的，传下来的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然而它们大都篇幅短，已不能满足当代学者研究的需要。比较详细的年谱——清代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其中臆测、疏漏、错谬之处也很多。为推进苏轼研究的深入发展，亟待有部科学完备的苏谱出现。孔凡礼于隐隐中觉得这历史使命责无旁贷地落到自己肩头，于是他在点校苏轼诗文集时同步编起了《苏轼年谱》。

基本路子还是他当初研究陆游总结出来的“两全两账”法，先编《苏轼交游录》，当初《陆游交游录》涉及到六百多人，已够复杂了，而苏轼的交游面更广，涉及到一千三百多人，按人头立户，逐一记下各自的名、字、号、谥、生卒年、籍贯、科第、传记出处、与苏轼的特殊关系，并按姓氏笔画做了索引，便于检索。

同时编《苏轼编年录》对苏轼生命的六十六年，逐年乃至逐月逐日排列。经过排列，初步理

出头绪，分清真伪、正误，提出一些深层次问题进行思索与考察。

为了这纵横两账，孔凡礼以近十年之功，遍览《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皇朝文鉴》、《宋会要辑稿》、《宋诗纪事》以及宋、金、元诸多方志、类书、笔记、碑帖、总集、别集六百多种，其中不乏世所罕见的珍籍孤本。到一九八八年变成二百万字的《苏轼年谱长编》。然后经两次全局性的梳理归类，去粗取精，剔伪存真的评审考订，到一九九四年整理成一百三十多万字的初稿。此后，再度删繁就简，精益求精。局部增删与改动是随时都有，直到二校还在不停地改动着。终以百万字成书。

这部历时二十年四易其稿的《苏轼年谱》，以“信而全”著称：“信”，指引用史料准确可靠，读者、学者可以放心地使用；“全”，指占有资料全面，细大不捐。因而它能纠正历代久负盛名的苏轼年谱的种种失误，也能纠正《苏轼诗集》、《苏轼文集》的疏漏，并再度补充苏轼佚作百余篇。孔氏有很高的写作技巧与驾驭资料的能力，提纲挈领，点面结合，文笔生动，引人入胜。这样，孔编《苏轼年谱》篇幅虽大，但仍简于王文诰《苏轼总案》，而系事则详于王编；考订之精，为学界所共识。仅看其首尾就知此话不虚。譬如开头记述苏轼的名、字、号一项，一般年谱通常只说“公姓苏讳轼，字子瞻一字和仲”（见傅藻《东坡纪年录》），但孔编《苏轼年谱》卷一除列出“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或谓小字同文，行九二”外，还列出了“苏东坡、东坡居士、老泉山人、铁冠道人、戒和尚、玉局老、眉阳居士，雪浪斋。人称无邪公、仇池翁、毗陵先生、泉南老人，水东老人，东坡道人、海上道人、苏仙、坡仙。赐谥文忠后，人复尊称以文忠”等十八个字号，并列详细出处，便于读者查阅。孔氏还对一些曾被人误解的字号进行了驳正。

再从孔编《苏轼年谱》的末条看，卷四十有云：“撰《遗表》，道潜（参寥）欲刻之，简道潜，嘱勿刻。”关于苏轼撰《遗表》事，诸年谱皆未见记述。此亦足证孔编《苏轼年谱》的详瞻和超前。撰《遗表》之制，在宋以前及宋代有之。乃谓朝廷官员临终前预作奏文，就朝廷兴革事宜提出建议，于身后上之朝廷以备采择，表示尽忠。苏轼自知将不久人世，而在病中预作“遗表”。据与道

潜第二十一简（见《文集》卷六十一），知轼之《遗表》曾在若干亲知内传阅，道潜读《遗表》后，乃至简苏轼，欲刻上之。而轼复简嘱道潜云：“千万勿刻，无补有害也。”孔氏按云：“苏轼此表，当一如以往奏文，披肝沥胆，原意自欲上之朝廷，后或以朝政日非，表文触忤权要，不独于个人，于子孙、于友人均不利，遂改变初衷，不欲上之，不欲传于世，故嘱道潜勿刻。苏轼临终前，当就此吩咐诸子，诸子遵行之，其文遂不传。”此条史迹，过去多不被学者留意，而被孔氏通过孔编《苏轼年谱》加以保存，有填补空白之功。

孔编《苏轼年谱》一九九八年二月一经中华书局出版，立即在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有的学者称它为自成体系，超越古今的新型年谱。有的学者誉之为二十世纪写得最好的一部年谱。一九九九年十月，《苏轼年谱》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从点校苏轼诗文集，到编撰《苏轼年谱》，在孔凡礼学术研究历程上无疑是一次重大飞跃与升华，显示了他令人刮目相看的学术研究能力。

一九九六年初，当孔编《苏轼年谱》正在中华书局付排时，孔凡礼立即着手编撰《苏辙年谱》。苏辙是苏洵幼子，苏轼之弟，不仅与乃父乃兄一样在文学史上享有盛名，而且是官居副相的政治家。与苏轼相比，自宋至今研究苏辙的著述较少，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则尤其如此；作为苏辙研究的必备书《栾城后集·颖滨遗老传》、《宋史·苏辙传》、南宋孙汝听《苏颖滨年谱》、今人曾枣庄《苏辙年谱》都较简略。而孔编《苏轼年谱》对他与苏辙的交往也不可能文必录，只能择其要而记之。而苏辙的郊游仅苏轼的十分之二三。经历也相对单纯些。如编《苏辙年谱》，就可以把他们兄弟间交往不受限制地全部记录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讲，编《苏辙年谱》既是研究苏辙的必要，又是苏轼年谱的延伸和补充，对苏轼研究仍有重要意义。

历时四年，到二〇〇〇年元月，孔凡礼用书两百多种（其中如灵岩寺石刻拓本等，是难得的珍贵资料）撰成五十万字的《苏辙年谱》。交学苑出版社付排，竟经过了五校（一般书校不过三），每一校都有新资料加入，同时请中华书局沈锡麟审阅，并从格式上作了规范化编辑加工；刘尚荣作特约编审，刘本就著有《苏辙佚著辑考》，又是孔编苏轼诗文集及年谱的责任编辑，对苏辙很有

研究，又熟悉孔凡礼著述的路数，因此对孔编《苏辙年谱》中偶有系年不妥、事实脱漏、引文重点不突出、佚文出处不详尽乃至标点体例都作了过细的核对、补充和改正工作。这样又磨合了一年半时间，到二〇〇一年六月由学苑出版社出版。中华书局《书品》二〇〇二年第一期有书评，认为《苏辙年谱》有四大特点：1.谱主形象，丰富多彩；2.资料详实，论据充足；3.考订严谨，辨正细密；4.详略适宜，写法新颖。

年谱之作虽是以编年体裁记载个人生平著述，但它不同于履历表、升官图，也不同于诗文作品编年目录，它理应全方位描绘出谱主的风采。孔编《苏辙年谱》（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可谓成功的范例，值得称道。

苏辙作为文学家，继欧阳修之后，与兄轼一起成为文坛领袖。苏辙作为政治家，在“乌台诗案”与“元祐党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苏辙年谱》旨在为文学家苏辙立传，却又无法回避他曾积极参与过的政治角斗。必须在二者之间找到恰如其分的契合点，以求不偏不倚，全面周到，否则无从下笔。孔编《苏辙年谱》成功破解了这道难题，不仅勾勒出文学家苏辙的人生历程与诗文创作的轨迹，而且查清了政治家苏辙在关键时刻的几次精彩表现。《苏辙年谱》向读者展现出苏辙形象的各个侧面，给人以丰满的立体化的感受。这也使《苏轼年谱》更具有可读性，更容易被一般读者所喜爱。

一方面，我们看到编撰者据《栾城集》、《栾城后集》、《栾城三集》等，将苏辙大部分诗文作品予以编年，在详注出处后，或摘引诗文中的名言佳句，作画龙点睛的评论；或概述诗文大意，却不加注释赏析，以省篇幅。书中对苏轼与苏辙的唱和，有详细周全的记述，对苏辙与黄庭坚、秦观、张耒、诗僧道潜等从相识、订交到酬唱聚会的文学活动，也有正确可靠的实录。文学家苏辙的创作道路与交游，他的才华与成就，他的心态与时局的关联，均历历在目。

（下转 67 页）

海外苏学专家剪影

——第九届苏轼学术研讨会侧记

徐丽

一九九七年，苏轼诞辰九百六十周年。九月十六日，苏轼的家乡眉山县举办了第二届东坡文化节，全国苏轼研究学会也在眉山召开了第九届苏轼学术研讨会。学术研讨会的召开，眉山三苏祠博物馆是承办单位。这次学术会规模较大，共汇集了国内苏学专家和海外苏学专家近百人，并同时召开了全国三苏遗迹遗址联谊会。研讨会期间，我在会务组接待苏学专家和全国各遗址地的代表。一日三餐、研讨会、观看演出和外出参观，我都全程陪同。这次盛会虽已过去十多年了，但给我留下的记忆仍是非常深刻，尤其是有几位来自海外的苏学专家，他们的生活趣事，令我难忘。

和蔼可亲的王保珍

王保珍是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这次学术会她是带着学生衣若芬一起来参加的。听别人说，王保珍老师没过几年就退休了，所以，一九九七年之后，就很少再参加国内的学术活动了。学术会的几天，我与王老师的接触并不多，只是留有一些印象。王老师五十多岁，胖胖的，白皙，按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很富态。衣着讲究，每天都施淡妆。其实她的衣着打扮，跟我平时接待中所见到的台湾旅行团中的游客差不多，很难把她与学者的身份联系在一起。当然，与国内女学者们更是不一样。学术会结束后，王老师的学生衣若芬想去参观乐山大佛。也许王老师是要等学生一道回台湾，所以，她决定借机在三苏祠多呆两天。这样，馆里就安排我陪同王保珍老师了。

王老师是位和蔼可亲的人，总是笑眯眯的，说话轻言细语，很温柔的。我们用了近一个下午

的时间将三苏祠仔仔细细地走了一遍。在启贤堂里，王老师指着有关“苏轼研究在海外”的陈列版面，很兴奋地对我说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因为我们这个版面介绍的海外苏学专家中就有王保珍老师。她说她的朋友来三苏祠参观时看到了陈列中有她的名字，回台湾后告诉了她，还要求她请客吃饭，以示庆贺。王老师说自己能被列在海外著名苏学专家名单中，非常高兴，这顿饭理所应当是要请的，并且是丰盛的一餐。

第二天的早餐，王老师说想到街上去吃，还想逛逛眉山城。我告诉了她眉山的一些小吃，如叶儿粑、凉粉、酸辣粉等。我还问王老师，吃过云南的过桥米线没有，并给她讲了过桥米线的传说故事。王老师对故事很感兴趣，这样，我们就决定去吃米线。离三苏祠很近的上大南街有两家米线店，东端附近有一家辜姓云南过桥米线，还有一家王砂锅米线。最终我们选择了砂锅米线，因为砂锅米线是清汤的，煮得烫烫的软软的，更能适合王老师一些。吃过早餐，我们就开始逛街，逛了几家商店后，王老师说，想买些眉山地方特产。我们来到地方特产柜台，王老师看着眉山出产的名酒类，尤其是以三苏命名的酒特别喜欢，于是就决定给她的先生买两瓶带回去，以分享她这次来眉山的收获。王老师上飞机只能带两瓶，很遗憾不能多带。买完酒之后，我们用了更长的时间逛书店，只要是有关三苏的书籍，她全部都买了，她说这次来眉山收获很大，可算是满载而归了。

王老师买了许多书，这次来开会又收到许多专家学者赠送给她的书，整理行李时，房间的床上堆了一大堆，可能有三十本左右。王老师说怕是行李超重了，带着不方便，请我帮她把书邮寄

到台湾去，我爽快地答应了。王老师给了我五十元钱的邮费，她说用水运挂号邮费应该差不多够。王教师走后没两天，我把书拿到邮局去寄时，才知道眉山没有开通水运邮寄业务，而一般的邮寄至少要二个月，邮航空的费用又是水运邮寄的三倍，怎么办呢？最终我托一位在成都工作的亲戚找到能办理水运邮寄业务的邮局，再将书籍送到成都办理邮寄，邮费刚好差不多。因为上述的原因，王老师在她预想的时间里没有收到书，便打电话到馆内询问。当她知道原因后，表示非常抱歉，并表示她真诚的谢意。这件事，虽然给我带来了一点麻烦，但最终还是将接待任务划上了圆满的句号，我也很高兴。

不苟言笑的内山精也

这是一位 30 多岁的青年日本苏学爱好者，据说他当时还在北京的一所大学里攻读硕士或者是博士。我为什么一开始就对他留下印象呢？那是因为他会议报到来得最晚的一位。那天，会务组负责人告诉我们，说有位日本来的参会人员要中午才能到，让我们等他来了，报到手续办完后立即到眉山宾馆午餐。这样，我与另外一位负责报到的人就在馆里等。快到中午 12 点，他来了。当时的内山精也，一身笔挺的灰色西服，锃亮的皮鞋，头发也打理得整整齐齐，虽然提着行李箱和公文包，看起来依然很帅气。按现在的时尚语就是酷毙了、帅呆了。一点也不像是学生，更像是日本电视剧《血凝》中看到的明星三浦友和。从内山精也来到报到处，到我们带着他到眉山宾馆，他脸上的表情始终是严肃的，没有一丝笑容。我认为，笑容是一种友善的表现，也表达着谢意。当时，我们对他的举止不太理解。到了宾馆后，他很有礼貌地点头鞠躬向我们表示了谢意。会议第三天是参观三苏遗迹中岩寺，会务组为大家准备了清凉油、风油精、藿香正气水等防暑药降温。我拿着药到每辆车上，去看看有谁需要。当我走到他的座位边时，他还是刻板严肃而礼貌的对我说了声谢谢。直到会议结束的那天，情况才有所变化。当天，许多专家学者都到宾馆大堂退房，取机票等办理自己的事情，我正巧碰见内山精也提着行李准备离开，他看见我，笑着向我点头。这是我几天来第一次看到他的笑容，我也用笑容

回敬了他，并祝他一路顺风。后来，我才听说，在待人接物这种礼节的习俗中，日本的民族习惯，自有与中国不同的地方，尤其是对待女性。如果说对陌生女性随意地笑，那是一种轻蔑，相反，对待女性严肃认真，则表示一种尊重。看来，内山精也对我们是十分尊重的，最后的笑容就用入乡随俗来理解吧！

入乡随俗的保苜佳昭

也许我用入乡随俗这个词来形容日本学者保苜佳昭并不十分合适，从他在学术会议几天发生的有趣的事来看，还没有找到一个更恰当的词汇，但我只想把事情记下来。保苜佳昭，个头不高，戴着眼镜，看上去十分斯文，有两件事情给我印象深刻。先讲第一件，在东坡文化节期间，也就是学术会议的第二天晚上，文化节组委会安排了一场文艺晚会，晚会在部队礼堂举行，我领着苏学专家们坐车前往。会务组有专人在前面领队，我的任务是在最后收队，保证苏学专家们顺利进场入座。当时保苜佳昭走在队伍最后面，我和另一名工作人员当然就跟他身后，入场后也就坐在他旁边。晚会由云南歌舞团演出，那些充满云南少数民族风情的音乐舞蹈让场内响起一次又一次热烈的掌声，每一位观众都被深深地感染了。可就在这时，报幕员报出了一个新的节目，舞蹈《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我一听这个节目名，非常吃惊，吃惊的不是节目，而是我身边有一位日本学者。“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高亢的音乐声一直在耳旁响着，台上的八路军战士挥舞着大刀，变换着各种舞姿和队列跳着、舞着，日本鬼子则小丑式的在台上上窜下跳。舞蹈跳了几分钟，我和旁边的同事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去看保苜佳昭当时的表情，我只感觉他端坐着身体，一动不动地直到舞蹈结束。这种情况，至今我都感到滑稽可笑！因为演出快要结束了，我们则赶快出场在礼堂门口等待专家学者看完演出，然后送回宾馆。

第二件事情更有意思，保苜佳昭可能不是第一次来四川了，对四川的饮食习俗有一些了解，居然知道眉山有两道地方特色菜，甜烧白和咸烧白。在会议闭幕的那天，他向会务组负责人说，

甜烧白他已经品尝过了，希望今天能品尝一下咸烧白。会务组负责人即向馆长做了汇报，这种小小的要求应该可以得到满足。可宾馆没有这道菜，怎么办呢？馆长让司机开车到其它饭店去找，看看什么地方有就买一份回来。可司机出门不久就回来了，说没有找到。难道眉山城里真巧今天就没有一家饭店有这道菜吗？会务组负责人与司机再次开车到城里去找，很快，一份冒着热气、散着香味的咸烧白摆在了保莉佳昭面前。虽然我当时没有看见他享受美味时的表情，但我想他应该是十分满意的。眉山人尽地主之谊的热情他总会体会到吧！

（四川省眉山三苏祠博物馆）

（上接 64 页）

另一方面，孔编《苏辙年谱》并未放松对苏辙政治活动的考辨。如元丰二年七月纪事，编者根据《孔氏谈苑》等资料，揭示了苏辙从驸马都尉王诜处获得御史台弹劾苏轼的绝密情报后，心急如焚，当即走价（派遣仆役），快马加鞭赶往湖州，向苏轼通风报信，令苏轼就逮时在告（因故休假）而由祖无颇权州事，故轼与妻子诀别稍得从容。这都显示出中年的苏辙在政治斗争中的明智与果断。又如孔编《苏辙年谱》援引的苏辙在元祐年间的一系列奏章（包括多篇佚文），又让读者觉察到“洛蜀党争”中，蜀党出头露面的精神领袖虽是苏轼，埋头苦干又卓有成效的中坚其实是苏辙。他攻击政敌，抓住要害，联名上疏，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又展现出晚年苏辙的历练与党争的残酷。

《苏轼年谱》、《苏辙年谱》相辉相映。前谱略者，后谱详之；前谱缺者，后谱补之。分而观之，各成佳制；合而观之，珠联璧合，苏氏兄弟的年谱完工之际，孔凡礼即着编撰苏氏兄弟的父亲苏洵年谱。苏洵年谱甫成尚未来得及出版，他又应北京古籍出版社之邀，编撰三苏年谱。换一个聪明的畅销书写手，或许可用玩变形金刚的方式，将前三谱重新组合一番，交付出版社。不过，若那样，孔老就不成其孔老了。孔老是在前三谱的基础上，又耗了四年时间，对三苏的生平、交游、著述以及他们之间的故事再次做了全面考察，从头重新写了一部《三苏年谱》。《三苏年谱》吸

收前三部年谱的长处，而省去了前三部中若干重复部分，更增补了许多前人未知未用的新资料，又有许多新的发现和独到见解，同时也订正了前谱中的若干疏失。

孔编《三苏年谱》二〇〇四年十月由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共二百二十万字，精装四册。一经出版，好评如潮。有学者称之为“迄今为止三苏行实研究的最高成果”。中国人民大学朱清华教授则从“奥由博洽，学富志大”、“事明有效，论定有证”、“钩稽慎微，绳墨者章”；“增扩补缀，精益求精”等四点，称道《三苏年谱》为前无古人，惠及学林的巨著。

从一九七七年至今二十八年来，孔凡礼以苏轼为主题的三苏研究，著述五部二十二册约七百多万字，外加数十篇论文，构成了他三苏研究的庞大工程。尤其是三苏年谱系列，是层层攀高，一部比一部更精彩，而总体风格为新颖、详尽、扎实、可信。从而奠定了孔凡礼在“苏学”史上的十分重要的地位，深受海内外学者的尊重和敬仰。

（石钟扬《无冕学者孔凡礼》节选，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系教授）



2010年1月8日下午，“首届中国广州从化苏东坡国学论坛”在广州从化“碧泉大酒店”举行。（王莉如拍摄）

日本苏轼研究述略（二）

（日本）池泽兹子

二 《四河入海》的版本

据前人研究，《四河入海》有如下版本①：

东福寺藏书 全 50 册。中缺卷 7 下、卷 21 上、下共 3 册。经过前人研究，此书已经断定是编者笑云清三亲笔稿本。苏诗原文旁边附上训点（按日文的文法读汉文），每页都填写许多注释。从中可以看出是经过推敲的。在第 50 卷的结尾有笑云清三亲笔的跋文和伊纳贤淳亲笔的后跋。

两足院藏书 全 25 卷 50 册。从纸质可以判断是在室町末期抄写的。此书没有苏轼的原文。

古活字版 全 25 卷 100 册，庆长元和年间刊行。现在收藏在国立国会图书馆、宫内厅书陵部、东洋文库、内阁文库（两部）、大东急纪念文库、蓬左文库等。有《抄本大系别刊·四河入海》12 卷（勉诚社，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书的影印本），和《抄物资料集成》第 2、3、4、5 卷（清文堂出版社，宫内厅书陵部藏书的影印本）。

三 《四河入海》的苏诗注者和讲苏诗的人

江西龙派与《天马玉津沫》

江西龙派是临济黄龙派的僧侣，法讳是龙派。还有木蛇、续翠等名字，这些名字都是来自他住过的两寺庙。别号晚泊老人，室号豨庵。俗姓是千叶氏一族的远藤氏。祖先胤赖曾受下总东庄的禄，因此一姓东。江西龙派是胤赖的六世孙东师氏的第二子。

江西龙派擅长四六文，连同太白、昙仲、信仲一起被称为“四天王”。他又善于作诗。当时心田的讲说、太白的四六、惟肖的文章、江西的诗被称为“四绝”。江西的著作有《江西和尚语录》、《续翠诗稿》（一名《木蛇诗稿》）、《豨庵集》、《江西和尚疏稿》、《江西和尚四六之讲》等。他注释

东坡诗的《天马玉津沫》本文已经佚失。他作的诗收在横川景三的《百人一首》和文举契选的《花上集》里。

惟肖得严

惟肖得严是临济宗焰慧派的僧侣。法讳是得严，道号惟肖。另外有蕉雪、歇即道人、山阳备人的称号。他的法讳和道号来自《尚书·说命》的“说筑傅严之野，惟肖”。少时他的父亲战死，在备后护国寺的草堂得芳里出家。

他曾先后担任摄津长乐寺住持、南禅寺前堂首座乘佛、栖贤寺（诸山）住持、万寿寺（五山）住持、南禅寺住持。晚年专心写作和讲学。永享九年（1437）四月二十九日 78 岁去世，塔在双桂轩。

惟肖得严在学术和艺术方面受到绝海中津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四六文的作法方面他和太白真玄、昙仲道芳一起学习，成就很大。惟肖还听过义堂周信讲《三体诗》，以藏海性珍为师学韩、柳文和苏轼、黄庭坚的诗。听过法灯派的子晋明魏（花山院长）亲讲《庄子》。其中惟肖特别精通东坡诗。值得注意的是，惟肖亲身受到清溪、天锡、天祥等黄龙派尊宿的教诲。清溪通徹是梦窗疏石的门生，以前在黄龙派寒潭惠云会下。天锡訾畴也是黄龙派放牛光林的法嗣，天祥一鳞（一庵）也是该派龙山德见的法嗣。放牛、龙山都是一代文豪。这样，惟肖得严跟着很多老师，广泛地学文学经籍，以博学多识驰名。特别是他对中国古典的正确理解、自如地运用中国古典的创作活动，令人惊叹。

他的著述有《东海瑞华集》。佛门弟子有无二得乘、器之得璉等人，学艺弟子有希世灵彦、瑞溪周凤、存耕租默、邵庵全雍。跟玉畹梵芳、昙仲道芳、鄂隐慧齏、仰之令岱、鼎甫崇镇、元璞慧琪、大荫宗松等人有交往。他的作品收在横川景三的《百人一首》和文举契选的《花上集》里。

瑞溪周凤与《胜说》

瑞溪周凤是临济宗梦窗派的僧侣。法讳是周凤，道号瑞溪，地名叫泉南。另外号卧云山人、竹乡子，刻楮子、羊柔僧。《四河入海》中的《日本坡诗讲谈师》说：“北禅师讳凤字瑞溪，号刻楮子，或号卧云。作《脞说》。”

瑞溪周凤生于泉州堺（现在大阪府堺市），俗姓伴。应永六年（1399）大内之乱时，他的父亲去世。后来他进京投靠外祖母，随后投靠同父异母的家兄。深受相国寺大智院的严中周噩的熏陶。严中周噩是春屋妙葩的嗣法，严中是曾经跟义堂周信学外学，善于作诗文，精通《三体诗》，是所谓“五山文学的正嫡”。后被提升为景德寺住持、相国寺（五山）第50世住持、相国寺开山塔宗寿院塔主、相国寺鹿苑寺塔主（前后三次）、相国寺寿德院塔主、北山鹿苑寺住持。宽正元年（1460）他在寿德院北禅轩退休，专心著作。宽正二年至三年注释东坡诗写《脞说》。死后赠兴宗明教禅师的谥号。

他的法嗣有希宗友派、默堂寿昭、春英寿芳、景甫寿陵、景甫寿睦、寿文等人。瑞溪周凤从严中周噩《三体诗》和东坡诗。据《坡诗脞说》书尾的自述《刻楮子瑞溪脞说叙》云，他曾师于蕉雪翁（惟肖得严）和赖云（严中周噩），学东坡诗。从惟肖得严、天章学四六文。

瑞溪周凤的著述有《卧云日件录》2卷（原日记已佚，只存永禄十年（即1567年）维高妙安亲笔摘抄的《卧云日件录拔尤》）、《卧云梦语集》、《坡诗脞说》25卷（在尊经阁文库），补遗1卷。还有诗集《卧云稿》、四六文集《瑞溪疏》（一名《竹乡集》）、摘抄各种书的《刻楮集》200卷、去关东旅行时候的《入东记》1卷（已佚）、《温泉行记》1卷，收集外交文书的《善邻国宝记》3卷。文集已佚。

瑞溪在15岁的时候听龄中梵呢讲东坡诗，在23岁的时候在胜定院考祥轩听西胤俊承讲杜甫诗，还听叔玠慧瓘讲《史记》列传。他也曾经跟江西龙派学。可以说是说瑞溪周凤继承五山文艺的两大流派，以绝海中津为鼻祖的建仁友社和以义堂周信为鼻祖的相国寺友社的传统。

跟瑞溪周凤学文笔的人有横川景三、景徐周鳞、绵谷周颀，并跟滕刚长柔、南江宗沅、季琼真榘、文叔真要、维馨梵桂等人有交往。他的诗收在横川景三的《百人一首》和文举契选的《花

上集》里。

太岳周崇与《翰苑遗芳》

《翰苑遗芳》是太岳周崇（1345—1423）的著作，25卷。太岳周崇是临济宗梦窗派的僧侣。道号太岳，外号全愚道人。他是阿波（现在的德岛县）人。俗姓一宫。他在阿波的补陀寺默翁妙诚里为童僧。跟随默翁迁到临川寺，在临川寺受戒得度。后以圆觉寺黄梅院塔主义堂周信为师，学诗文学艺，取得了很大的收获。他还以东福寺的梦严租应为师，学外学，听履中元礼讲《金刚经》。

他先后任等持寺主持十刹、相国寺（五山）第10世的住持、相国寺鹿苑寺塔主、天龙寺（五山）第46世住持、南禅寺（五山之上）第71世住持。深受足利义持的信任。

他的法嗣有竺云等连、竹香全悟、牧庵妙忠、子巩全固、钝中全锐、无绩全功、怡中全顺、惟审景念、龙岗桂肃、景彭景鉴、息进文建、鹤庵景绍、平仲中衡、明允等洵、同文景恣、逸才景骏、实中景允、大安周有、梵诞、妙僧等。有观中中谛、绝海中津等师兄，惟中通恕、西胤承等同学，惟肖得严等后进。

太岳周崇精通《汉书》，不断地讲《汉书》。因此他的门弟里有《汉书》的专家竺云等连（他被称为“连汉书”）。他曾写《前汉书抄》，可惜已经佚失。他还讲东坡诗，注释东坡诗，写成《翰苑遗芳》，大部分在《四河入海》里引用。《翰苑遗芳》是深受后人推重的东坡注。万里集九在《天下白》的序中说：“《芳》《脞》《翠》之三部，乃坡集之日月星也。”关于该书，仓田淳之助氏的研究功不可没。他在《苏诗佚注》的《施注与〈翰苑遗芳〉》中说，它在《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王十朋注）的基础上加上《注东坡先生诗》的注（施注），再搜集赵次公（西蜀赵氏次公，字彦材）的单行本里王状元本未收的部分而作的。现在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里收藏的《翰苑遗芳》是25卷（6册），分别是1490年和1491年的抄本。他还编有和、汉、竺年表《三国一览和运图》。（未完待续）

注释：

①中田氏、铃木氏、阿部氏的上揭书。

（日本中央大学教授）

苏东坡的政治人生（四）

雷金贵

第四章 国如是 君如此 东坡无奈

10 就这样弱了兵弱了将弱了民

依靠兵变起家开创北宋的宋太祖赵匡胤，好像也不鼠目寸光，为了长久地让天下姓赵，的确想得长远，他把自己的兵变作为镜子，为防部下起而效之，像他轻轻巧巧夺了后周天下一样，也被人轻轻巧巧把他赵氏的天下变了。这一点，宋太祖的老母亲很清醒，后周把天下传位一个乳臭未干的娃娃，才让赵匡胤钻了空子，老母亲要赵匡胤发誓，今后的皇位不能传给儿子，而是要传给其弟弟。这个说法，很有争论，说是宋太宗为了给自己弑兄篡位披上合法的外衣，而威逼宰相赵普伪造的，不管是真是假，把天下传给一个小娃娃，是没有名堂的。因为宋朝天下来得不正当，宋太祖于是事事处处，都积虑处心，他出台了宋王朝独有的基本国策：“弱其兵、弱其将，以弱其民，以强君主一身”和“重文轻武，守内虚外”。虽然这是符合他自照镜子的结果，但是实质上是慢性自残的。

杯酒释兵权，是赵宋王朝“弱其将”的一个非常的典型。一顿酒宴，酒酣耳热间，宋太祖就让那些把他拥为天子的将军，乖乖的交出了兵权，以“散官”身份，乖乖的回家养老。赵匡胤好像很智慧，其实是奸诈式的很愚蠢，君不信臣，臣何以忠君呢？君臣不亲，由此而始。

君臣关系上，宋太祖开了很坏的头，如苏东坡所批评，“上下不亲”。

缴获了这样的兵权，还不足以稀释宋太祖的忧虑，为了防止将军们拥兵自重，他创造了在文臣中选任武将之举措。明明是马嘴，却硬要将其

安放到牛头上，这个治军之策，一直延续到宋之灭亡。面对西夏契丹的挑衅，所谓大宋，何以一败再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因素。金戈铁马的战争，刀刃相见，挥剑而起，人头落地，张弓搭箭，心脏沾血；兵对兵将对将的战场，绝不是现代战争，可以端坐在电脑前，儒雅地指挥，可以兵不血刃，决胜千万里之外。古战场上，旌旗猎猎，将和士，都要跃马横刀，都要冲锋陷阵。所以大宋的将军，无论北宋或者南宋，大多很悲壮，杨家将的故事，岳飞的报国无门，他们都有一身军事工夫，却被软弱的皇帝制肘着。

宋太祖有他堂皇的理论，也是他从自己的镜子里照出来的——一百个文官都是贪浊的，其结果，也比不上一个武将作乱强，文官贪的是钱，是权，是色，而武将作乱，要变的是天下——虽然荒谬，但是他确实没有忘记自己这样一面镜子。而且实行的是“将与卒不相习”的治军之策，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这将如何号令呢？这兵又听从谁呢？

如果“弱其将”是害怕武将们造反，那么“弱其兵”就是自残手足。

苏东坡毫不留情的批评说，宋王朝庞大的军队，没有固定的将帅统领和教习，饱食皇粮，饱用皇饷，却无所事事，“终日嬉游廛市间”，常年累月，不穿甲衣，不操兵器，还骄惰成性，至于荒唐到“卫兵入宿，不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之粮食，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宋之兵士，是终身制的，没有退役之说，这样的军队，自然是“弱兵”了。真要强大了，威武了，那是“天方夜谭”。史说，其驻守边防的兵士，竟然“有不能披甲上马者”，有的居然“驰走挽弓不过五六斗，每教射，皆望空发箭，马前一二十步即已堕地。”

北宋兵源，原本有律可依的，即是三丁抽一，然则依律者只有极其少数，绝大多数，招募的是破产的犷悍农民。“可以利百代者，惟养兵也。”

这是宋太祖的理论基础：“不收为兵，则恐为盗。”这是官吏们对宋太祖理论的活用。兵之招募，且无限额，搞得多的，上头有奖励，于是乎，留守乡间从事农业生产的，多为老弱之人，朝廷又严禁民间教习武艺，更严禁私家藏用兵器，民就这样被弱了。

在宋皇帝看来，这样弱了兵，这样弱了将，这样弱了民，就消除了赵氏天下的威胁，而太平无事了，而子孙长久了，而天下永久的就姓赵了。这不但只是宋皇帝的一相情愿，而且他看不到，如此这般，其实是极端愚蠢的自掘坟墓。

皇帝看不到，或者看到了，但是死要面子，自己的娃儿，都是又乖又好的。所谓皇帝，都是以天子自居的，都是把自己看作无所不能的神仙的，自己岂会有错，更不会自己掴自己的耳巴子的。大臣们或者有看见的，也有刚直之士，如包拯，如王禹偁，如欧阳修，如范仲淹，为北宋号脉处方，但是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声中，多已屈膝成性了，多明哲保身了，混到朝廷官员的地位，很不容易的，要到皇家头上去动土，是鸡蛋去碰石头，是胳膊去拎大腿。范仲淹的教训，让许多人都学聪明了，“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的范仲淹，于仁宗庆历三年，得命行“庆历新政”，却是昙花一现，参与者，都被革职外调。金口玉言的皇帝，这样出尔反尔，这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只能让许多人见风使舵，做墙上芦苇，是皇帝自己的恶劣做派，扰乱了朝纲。

11 此三者存亡之所出

年轻锐利的苏东坡，把北宋的近忧和远虑，看得明明白白，看得清清楚楚，看得入木三分。苏东坡穿透其太平假象的表面，一针见血，当面向皇帝直指关乎社稷存亡的三大祸患——“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此三者，存亡之所出。”

皇家挥霍无度，又没有养鸡下蛋放水养鱼发展经济之策，还要供养庞大的军队和官吏队伍，进少出多，造成朝廷财政亏空，而天下常患无财，此为一患。

澶渊之盟，软弱的宋皇帝，开了北宋拿钱购

买边境安宁的先河，边境却并不安宁，战要吃败仗，守又守不住，而天下常患无兵，此为二患。

官吏队伍庞大，却没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奖惩制度，鱼龙混杂，而天下常患无吏，此为三患。

苏东坡居然不给所谓的大宋和堂堂的皇帝留下一块遮羞的布。

苏东坡总是不善于包裹自己，更不善于圆滑自己。

还是要走进历史。

在“重文轻武”的名义下，北宋广开科举，录取儒士，意图以文治国。必须承认，北宋的人文治国的愿望，十分的良好，北宋的目的，十分的积极，但是这个政策，演变成了被皇帝和朝廷滥用的权力，以及一些有着话语权的重臣要员，在其中把水搅得更浑，最终导致其官吏队伍的完全失控。

说一件让苏东坡无可奈何的事情。已经是北宋元祐三年（1088），苏东坡奉诏与吏部侍郎孙觉、中书舍人孔文仲，主持当年的举人考试。和宋代历次的科举考试一样，也要锁院的。朝廷的有关部门和权重之人，就开始运作各种“免试”之人，各种奉旨核准的“特奏名”者，和享受恩荫者，居然超过千人之众。苏东坡和另外两位主考官，都是痛斥“天下之患，无过官冗”者。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他们的职责只是主持考试，录取多少，他们只能遵旨执行，他们把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殿试时能够将这些享受特权而免试的人大量的黜落。但是他们太天真了，此次考试是四千七百多人，他们上奏礼部的进士只有五百人，而到放榜时赐进士诸科及第出身者，竟然达到一千一百多人，超过正式考中者一倍还要多。国家考试，就如此成了儿戏。

北宋科举儒士，名目用得很烂，比如进士，就有“赐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而且其屡考不中者，也可以“特赐本科出身”。宋太祖时，每次科举，录取儒士也就二三十人而已，后来激增，宋真宗咸平三年，录取的儒士竟达一千八百多。苏东坡考中进士，同登进士榜者达八百七十七人。而且就从那一年起，只要通过礼部考试，就高枕无忧了，不会黜落一个。放在现在，或许不多，但是以当时之生产力水平、小农经济或许都谈不上的自然经济结构、州郡和县不过一千五百多的政权结构，已经是泛滥形势

了。

科举入仕，也算选人任人之手段罢，却居然还可以“恩荫”——宋皇帝把自己的权力或者“仁慈”用到了极点——赏赐那些上了一定品级的官员的子孙，甚至亲戚，入仕做官，很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宋仁宗庆历七年，靠恩荫做官的，竟然超过千人。史说，恩荫做官，已经是当时的最大官源，有了中央六品以上、地方五品以上者，每三年都可以恩荫子孙一人，甚至六人。

但是，苏东坡在颍州任上，特意申请过恩列，却没有被批准。苏东坡不是为自己子孙申请，他是要把属于自己的恩列，转移给一位有功人员。事情是这样的，苏东坡到任后，了解到颍州的地盘上，有几股黑恶势力，打家劫舍，为害乡里，前任虽已剿灭大半，但头目在逃，依然结伙为盗，而且竟然在大白天，横行于市镇，民愤极大。苏东坡了解到汝阴县尉李直方，是打击邪恶势力的能手，就把抓捕头目的任务交给了他。且说，如果抓到了这个头目，他就奏请朝廷奖励，如果抓不到这个头目，就奏请朝廷免他的职。这个李直方，果然是个有勇有谋的人，他经过精心的调查和部署，一举抓获了在逃头目。苏东坡向朝廷奏请，朝廷的官僚们搬出规矩来，说李直方虽然抓住了盗贼头目，但没有抓到一半以上的盗贼，不符合奖励条件。大宋的律例，只讲人数，不讲首从。苏东坡也无可奈何。到苏东坡积累起来的资历可以按恩列升迁一级，苏东坡奏明朝廷，自己不享受这个恩列，请求把这个恩列转移给李直方，但是朝廷不允。

表面来看，宋王朝好像做得很聪明，用这种手段，笼络官员人心。其实很蠢，这样让为数众多的死鱼眼珠，堂而皇之的成了“珍珠”，而真正的“珍珠”，反而成鱼目。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套上绳索。

恩荫还不算，居然还有“进纳”之官，用钱用粮买得官职。权力都商业化了，权力就不可能公平了，就只能去投机。

包拯作过统计，按当时的规定，用吏不过五六千就足够了，实际的官员数量乃三倍其多，“而又三岁一开贡举，每放仅千人，复有台寺之小吏、府监之杂工、荫序之官、进纳之辈，总而计之，不止于三倍。”

好像栽萝卜，如此庞大的官吏队伍，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坑，可以栽插得下去，所以一个坑边，

春夏秋冬里，三百六十五日里，守候着四五个萝卜，等待栽插。不仅如此，而且十个官人中，并不晓得自己居官何职者，居然有八九个人之多。长此以往，蔚然为北宋官场的一大怪异景观，是否写得进现在的吉尼斯纪录，待考。

苏东坡指陈时弊，不是书生意气，为讲求文章的对仗或者文采。行于可行，止于当止，属于自然而然。胸无成竹，胸无丘壑，不知其行，也不知其止。成竹与丘壑，是生活的积累。苏东坡踏上仕途，已经积淀了相当的社会经历，可谓厚积而发。在蜀中老家，从小放过牛，种过松，上过学堂，家母程夫人，教授过许多史记文章，又游学于当年蜀中多处名寺书院，中岩寺有他的唤鱼联姻、栖霞寺有他的手书连鳌山、大佛寺有他的载酒亭，而且又有在凤翔签判任上的亲身经历，他对百年承平的北宋的把脉，已然穿透表象，直指要害。

苏东坡后来遭遇文字狱，有一条罪状叫讪谤先帝，善于以史为鉴的苏东坡，其实在凤翔任上的《思治论》里，就已经冒了天下的大不韪了，他对澶渊之役留下的养虎为患，及其守内虚外的政策，批评得毫不留情。后来北宋被捧得鸡飞狗跳而至于灭亡，南宋被挤得苟延残喘而至于灭亡，无情地证实了苏东坡的预言，对契丹、西夏之策，是“而不得其要领”，最终让赵宋王朝灰飞烟灭，而且北宋的最后的太上皇和皇帝，狗一样，被押上了北去的囚车。

12 让北宋的历史说话

再次走进历史，让历史说话。

宋太祖微服夜访，说的是一个雪夜，赵匡胤和赵光义，夜访宰相赵普，史家用的是赞美笔调，就事说事，确实让人赞叹。但是说到他们商议的大计，就是要不要攻打太原，却是为大宋天下埋下了祸根。他们共同议定，不打太原，调兵削平南方各国，名曰“虚外安内”。

由是，北宋王朝，一直被契丹（辽）和西夏侵扰得不安宁。

祸根要追溯到五代后唐，石敬瑭恭请契丹主出兵，为其夺取了后唐天下，建立了后晋王朝。石敬瑭为表示忠心，尊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皇帝”，自称“儿皇帝”，并慷慨的将燕云十六州礼

送契丹，还“岁输金蕃三十万”。割去燕云十六州，后果很严重，整个中原地区，失去了长城的屏障。

后周世宗亲率兵马征讨契丹，意图收复燕云十六州，在已经收复瀛、莫两州后，世宗患病，不得不班师回朝，不久而逝。赵匡胤就在此时兵变了天下，他若挥后周百战之兵而追穷寇，完全有可能收复燕云之其余十四州，但是他们却自动放弃这样的机会，采纳了宰相赵普守内虚外之策，调兵征剿南方，想以重金赎回燕云十四州。

所谓赵氏大宋，从此种植了软骨的种子。

现在，有人将宋太祖的重金政策，赞美为和平政策，我不以为然。自己家的东西，被败家子非自愿送人了，那东西当然还是自家的，而采取非正当手段索要了人家的东西，归还人家的东西，应当是无条件的。本身是自己的东西，还要自愿拿钱去赎买回来，很没有志气。而且那不是一般的東西，是两万多平方公里土地的主权。你现在实力不够，你可以养精蓄锐，而且你必须向对方义正词严，那东西我早晚必须无条件收回的，你必须表明你的态度。

赞美者说，自澶渊之盟后，北宋与契丹，至于宋仁宗时代，将近百年没有大的冲突，是为和平发展的证据。这里有个漏洞，北宋每年给契丹数十万的银子，人家当然很安逸；而且后来，还发生一件事，我在后面要说，北宋的缺钙，让人气得要死。最要命的，是契丹用这些银子，把西夏一天天喂大了，成为他骚扰北宋的打手。西夏。一会儿降宋，一会儿降契丹，反复无常，没有契丹背后做主，小小西夏，岂敢如此反复。西夏由此而不断扩张，由此而称帝，后来北宋也要向西夏纳岁币，不仅如此，西夏主的生日，北宋还必须去孝敬。更要命的，是神宗皇帝，就气死于西夏之事。

所以苏东坡批评朝廷，边事不得要领。

苏东坡是把宋太祖以来的所有宋皇帝，全都批评了。

苏东坡的批评，是有事实的。后来，宋太宗亲兵灭亡北汉后，挥师围攻契丹的燕京，却大败而归。宋太宗本身不会打仗，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却自己画战阵图，而且要将军们只能按他的战阵图作战，打败仗是必然的。太宗且从此丧失了跃马扬鞭的勇气，杨家将的故事，穆桂英挂帅

的故事，就在这样的背景里演绎了。

问题是，那些将军们，为什么就不敢有自己的主张呢？

这就回到了杯酒释兵权的根源上。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将军们为什么要有自己的主张呢？

“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为之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为可惧。帝王合当用心于此。”软骨的宋太宗，居然也有了自己的软骨理论，和宋太祖的理论自然是一脉相传的。

北宋屡战而败，契丹和西夏，由是而放肆，而猖狂，北宋边境，由是而日不宁，夜也不宁。

真宗景德元年，契丹圣宗和其母，亲率大军，深入宋境，一路横扫，直逼澶州城下。

黑云密布，风满楼庭，宋廷上下，顿时惊惶失措，未战而欲逃，或请“幸江南”，或请“幸蜀”。幸而有刚直的宰相寇准，气概英雄，力主出战，并逼迫宋真宗御驾亲征。宋军在寇准指挥下，难得地打了大胜仗，宋军如若一鼓作气，乘勇而追穷寇，完全可以收复燕云诸州，甚至可能一举而剿灭契丹。但是同样软骨的宋真宗，在主和派的策划下，竟然与契丹签订了屈辱的“澶渊之盟”——结契丹为兄弟，尊契丹主之母为叔母，每年向契丹供奉银两百万两，绢二十万匹。

四十年后，苏东坡才七岁那年，契丹不派一兵一卒，只派了使臣入宋，强行要求仁宗皇帝归还后周世宗收复的瀛、莫二州。仁宗皇帝欲要派人使契丹与之交涉，廷臣如云的所谓大宋，一个二个，竟然都做了缩头乌龟。最后是富弼两次受命出使，皇帝都只生软蛋，大臣硬得起来才怪，结果是每年再供奉银两百万，绢十万匹。

所谓养虎为患，宋王朝以自己的软弱，而表现得淋漓尽致。

苏东坡所指“而后重之以西羌之变”者，乃西北之西夏，这只为患之虎，完全是宋王朝的软骨喂大的。

古代，黄河河套地区，游牧的党项族，乃羌族的一支。唐朝时候，黄巢起义，攻占了长安。党项族的首领拓跋氏，帮助唐朝镇压了黄巢，被封为夏国公，并赐李姓。其时，其地盘还小得很，仅有夏州而已，到宋朝仁宗皇帝时，其势力范围不断扩张，在大宋的眼皮底下，占据了丰饶的凉州、甘州，在仁宗皇帝当朝已然十七年时，称帝

建国，史称西夏。北宋与西夏的战争，从仁宗初年开始，一直打到庆历四年，宋军一次又一次地战败，西夏一点一点地扩张，最终以北宋屈让而告终。宋仁宗庆历四年（1037）四月，大宋王朝在吃了一次次败仗后，册封西夏之李元昊为夏国主。由此，宋之西北之地，拱手而让，堂堂大宋，每年向西夏供奉银两五万两、绢十三万匹、茶叶两万斤，这还不够，但凡节日，西夏国主生日，北宋还要乖乖的送上银两两万两、银器两千两、绢帛二万三千匹、茶叶一万斤，作为寿礼。

输岁币而求和，而灭自己威风，而长契丹西夏嚣张，乃宋太祖“创举”的守内虚外代代传袭的必然。

苏东坡对这个恶果和根源，看得很清楚。

看苏东坡的政论文章，纵横着历史，明鉴着古今。

苏东坡是渴望和平的，苏东坡是渴望所有的百姓都安居乐业的。但是面对西夏契丹的肆意挑衅，苏东坡主张要拿出骨气来，把战与和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能一味的拿钱买所谓安宁。

然而软骨的宋皇帝，却只想苟且偷生。

把北宋之安内虚外，称为和平发展，是用堂皇的口号为北宋遮羞。国和人一样，得活出自己的尊严。家屋是人的核心利益，打进你的家门了，还要缴出家里财物与之讲和，人就活得很屈辱了。领土主权是国家的核心利益，一次又一次地被侵犯，一点一点地被蚕食，却只能输岁币而求和，国家就活得很窝囊。

13 苏东坡只能无可奈何

君如此，国如是，苏东坡只能无可奈何——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
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
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江城子·密州出猎》

苏东坡写这首词，正当不惑之年，他从杭州的通判，调任了密州的太守。

密州，是苏东坡豪放词的发祥地，一批气

冲霄汉回肠荡气的词章，如明月几时有，如十年生死两茫茫，开端了特立独行的东坡词。在此之前，苏东坡留给我们的文学遗产，多为诗歌。东坡词的诞生，不是偶然的，其时，新法已经强力推行了七年，种种弊端，目不忍睹，联系苏东坡给当权者的奏章，联系苏东坡冒大不韪而废除手实法，联系苏东坡吃野菜的现实，实为必然。

历史的教训，现实的疼痛，燃烧着苏东坡心中的火。所以，虽然是初入仕途，但是苏东坡却把稳了北宋的病脉，并向很是赏识他才华的仁宗皇帝，开出了疗治大宋沉疴的药方，那实在是一副重药。

当时是，庞大的军队——宋太祖打天下，才二十多万，到真宗时，几近百万，到仁宗时，超过一百二十多万。庞大的官僚队伍，包拯的统计是三十年剧增了三倍，而且，“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北宋王朝“创举”的输岁币以买边境安宁的“守内虚外”政策，每年向契丹、西夏输银数十万两、绢数十万匹、茶叶数万斤，以及皇家无度的开支。苏东坡在上书仁宗皇帝的《论场务书》中直言不讳：“朝廷自数十年以来，取之无术，用之无度，是以民日困、官日贫。”

危机四伏的现实，不仅苏东坡深以为忧，他的前辈王禹偁、欧阳修、范仲淹、包拯等等，皆在真宗、仁宗朝时，不断的为北宋号脉处方，改革思潮，云涌风动。

最著名的是王禹偁和范仲淹。

宋朝的第三任皇帝宋真宗刚刚坐上龙椅，王禹偁就在《上真宗论军国大政五事》中，直言：“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此所以尽取山川之利而不能足也。”

真宗皇帝也开明了一时，采纳了王禹偁们改革弊政的建议。其一，改革行政方式，设全国为十五路，各路设转运使，监察各州、县官吏，掌控各路财赋，转运使直接向朝廷和皇帝汇报各地民事隐情。其二，免除了五代以来的民间欠税。其三，释放后宫女子。其四，禁止官员进献所谓珍禽异兽祥瑞物品。

（下转 77 页）

我与“苏学”

——《苏轼研究论稿》后记

王文龙

早在少年时代，我的心扉上就刻下了苏东坡的名字。我家是书香门第，祖居古老集镇，由于父亲谋生在外，每当春节前夕，便由我执笔书写春联，并且少不了写上“苏才郭福，姬子彭年”之类传统的吉祥语。从母亲所作的解释中，我对苏东坡的名字早已如雷贯耳。再加上讽诵《千家诗》，其中苏东坡的诗句自然成了咀嚼玩味的材料。我曾想，这位苏东坡一定是中国古代第一等大才子，他也一定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的！——这大概就是融化在我的血液中的“苏学”最初的文化“基因”吧？

到了中学阶段，开始接触到苏文、苏词，不觉为苏东坡的才华和文采所倾倒。高中时翻阅家藏的《古文观止》，东坡的赤壁二赋已能成诵。又读夏承焘先生等选注的《唐宋词选》，对苏词的部分杰作也已烂熟于心。不知为什么，我读东坡作品，似乎总能唤起一种异样的感觉，如饮醇酒，如品香茗，真有几分飘飘欲仙了。说来也奇怪，连偶尔一见的“苏学”论文也施展了最初的魔力，竟让我爱不释手——所有这些，或许预示着我在向“苏学”的门墙靠拢了。

可是，我在大学读书时，对于出现在古代文学课程中的大文学家苏东坡除了开初涌起过似曾相识的感觉外，并未特别留意，虽然我对苏氏的了解已远远胜过从前。因为第一，我就读的学校层次（专科）和专业（师范），已注定我只能为中学教育尽瘁一生；第二，当时整个国家都已陷入困境，好像谁也提不起研究的兴趣。不过，后来

有一件事对我还是有所触动。当我在中学执教鞭二年多之后，就读于北方名校的昔日同窗好友胡俊林来信告诉我，他的毕业论文的选题是关于苏东坡的。这使我油然而生羡慕之心。我由衷期望着他的论文写作一举成功，仿佛也可以代我了却一桩心愿似的。然而曾几何时，文革狂飙突发，席卷全国，友人的苦心设计只成了一个破碎的梦。我也经磨历劫，未能幸免。没想到多少年之后，磨难已过，我却捡起了那个残梦，并将它放大了，使它成形了，虽然至今未能将它剪裁成无缝的天衣。让人欣慰的是，友人后来在大西南供职于与我所厕身同一类型的高校，在研究方向上虽有点“移情别恋”，但1997年在东坡故乡举行的一次年会上，我们还是携手走进了“苏学”的殿堂。这已是后话。

我真正与“苏学”结缘，还要追溯到国家与学界都已面貌一新的1982年。其时我已受命入高专任教数年，一个偶然的时机，老同事樊德三同志获取了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将在当年秋召开年会的信息，并很快与远在四川成都的学会大本营取得了联系。我与德三兄一拍即合，各自精心准备论文。当德三兄接到我二人与会请柬，并有劳他办好一切手续之后，才到南京大学与正在那儿进修的我相约同行。果然不负所望，这次在黄冈举行的盛会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浓厚的学术气氛深深地感染了我们，久违的学术争鸣也使人耳目一新，学界德高望重的前辈则显示了良好的风范。可以说，是“苏学”把所有与会学者紧紧联

系在一起，初入门庭者如我，第一次感受到“苏学”的辉煌与尊崇。尤为令人感佩的是，我与德三兄同学会诸公素昧平生，而我们向大会提交的论文（连同少数会友的佳作）竟然在近百篇论文中脱颖而出，被收入由学会编定的《东坡研究论丛》。这本是很平常的事情，但对初出茅庐的我来说，无异于一种激励：我的“苏学”入门的答卷合格了！

随后，我在南京大学进修期间撰写的“长篇大论”《东坡散文艺术探微》，在下一度年会上又有幸入选仅有十余篇论文的《东坡文论丛》。由此一发而不可收，尽管有时不免瞻前顾后或左顾右盼，写点别的东西，但苏轼研究作为我全部研究工作中的一条主线，一直没有中断。对此，其他我不敢妄论，而情有独钟庶几近之。可能有人要问，你为何长期沉浸其中，乐此不疲呢？

除了前文所述的因由之外，我想更为重要的是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先从客观方面来说，学会在每次年会之前便尽早下发预备通知，对与会者向大会提供论文有着明确的要求，尽管学会关于年会研究重点的设定，同个人研究计划的实施可以并行不悖，因而个人对研究课题的选择拥有广阔的空间。所以身为会员，必须首先埋头于论文写作之中，以此赢得名正言顺的“入场券”，届时又可以借机展示个人的最新研究成果。不用说，会议中学者间的切磋、交流（有时有争论），是第一要务；众师友的学术造诣及所长，亦足可取法。彼时彼地，感受着独立的学术精神，呼吸着自由的学术空气，便觉得是人生一大快事。此外，对随着会址轮番更换的历史文化名城的考察，以及对与创作和人生轨迹密切相关的东坡遗迹的寻访，也往往给与会者增添了巨大的吸引力。我先后应邀12度参加“苏学”年会（详见论文篇后括注），无一例外地认真准备并向大会及时提交论文，其间凡是由学会或东道主（承办年会的地方）编选的论文集，拙作均忝列其中。至于我们的研究客体本身有着极其丰厚的文学内涵和文化内涵，为人们提供了无尽的研究资源，我在《前言》中已有所述。这里略作补充的是，多年前应三苏博物馆的约请，曾赋四言诗一首，命曰《东坡赞》。诗云：“伟哉东坡，文坛巨星；诗开一代，碧海掣鲸；词标一帜，豪气干云；文轶韩欧，随物赋形。艺事其余，亦足超群；书画两绝，远播芳馨。沾溉百世，启人创新。照我中华，万古长明。”这里

主要从文学着眼（兼及艺事）观其大概，而与其全部文化内涵尚相距甚远。

再从主观上来说，我在入门之后对苏东坡的认识仍然经历了一个从比较偏狭到逐步深化的过程。随着认识的逐步深化，研究思路在逐步拓宽，研究方法也在作相应调整（参见《前言》），自然也与东坡走得更近，以至透过作品，渐渐看清了他的音容笑貌，看到了他内心的喜怒哀乐，从而不断激发起作为研究主体的我内在的兴趣和热情。比如，我在对东坡的文学研究中发现，不管是诗、词，还是散文，除了少量超一流作品之外，其实还有数量相当可观的精品力作，它们差不多同样是“味无穷而炙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的。这样，我在有关研讨与写作中，就有可能打破有人眼光往往只盯住少量“名作”的局限。再比如，经过较深入的钻研，我发现了东坡在诗学方面的卓越建树，于是将它分解为诗歌美学、诗歌创作论和诗歌鉴赏论等几个板块，进行专题研究，而后分别加以概括、分析和综合，企图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中国诗学史上光彩夺目的苏家旗帜。在这过程中，我不仅收获了一个又一个研究成果，而且收获了如愿以偿的快乐与满足。到后来，我不知道苏轼研究是否已快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只觉得不止是欲罢不能，也不止是一往情深了。

这里我还想特别提到九十年代师友们有意促成和援引的几件往事。一是在九十年代前期，我虽在此前已写出了几篇小有影响的“苏学”论文，但还谈不上有何突破性进展，当时主政我校中文系的德三兄敦促我上一个省级科研项目。我左思右想，忽然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将东坡诗话编纂、注释和评论三者合为一体的项目。德三兄拍手称好，上报审批也一路顺风。我夙夜匪懈，付出了整整三年的时间 and 精力，终于取得了预期的成效。我在东坡诗学研究方面能有所建树，主要凭借这一项目所奠定的较坚实的基础。二是九十年代中期，四川大学教授、时任学会秘书长的张志烈先生来函嘱告我，托我“加盟”由他出任主编的大型项目《苏轼全集校注》中的文集校注。我虽自知工力不足，资料又较缺乏，但多年来志烈先生对我信任有加，又面对参编如救火的紧急情势，加之分配给我的部分以尺牍为主，相对难度较小，不由我不勉为其难。待我应允后，又承志烈先生惠寄清人王琦《苏诗总案》这一重要参考资料（当时孔凡礼先生的《苏轼年谱》尚未问

世),并多方加以指导,助我实多。后来总算如期完成了任务,虽间有未至,而此心无愧。三是九十年代后期,黄冈师范学院教授、老友饶学刚先生出面,诚邀我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老专家朱靖华先生(领衔)以及饶氏“父子兵”通力合作,共同打造《苏轼词新释辑评》这一崭新工程。出于与前次大致相似的原因(手头资料及熟悉程度均胜于前),不容推辞,于是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学刚先生平日于资料搜集用力甚勤,在这方面为我提供了颇多助力。由于出版方催稿甚急,书稿不免留下了一些缺憾(后在反复校稿中有所补救),但我们还是精诚合作,将苏词全集以全新的面貌推到了世人面前。此次经我诠释的苏词有百首之多,或多或少地融进了个人的心得体会,在某种程度上享受到了自由发挥与再创造的快意。以上后两个项目的完成,使我感到心中底气较足,因而写起《论东坡尺牍的文献价值》、《东坡词阅读札记》、《从东坡词看苏轼的人生思考》、《论苏轼的以学问为词》等文章来,就觉得近乎胸有成竹了。上述三件往事,都使人难以忘怀,中心感戴,胡可胜言!同时使我领悟到,我投入并完成几个项目的过程,其实是不断学习与积累、强化研究基础的过程;当然也是与“苏学”的缘分不断加深的过程,其结果只能是“永以为好”了。

(有删节,江苏盐城师范学院教授)

(上接74页)

真宗坐天下的头十年,即其咸平、景德年间,史为“宋之治世”,那个时候,有宋才刚刚走过了四十四年的历史。人到四十,乃不惑年月,做出一番成就,也是必然的事情。

到宋仁宗庆历三年,宋朝已经走过了八十四年,仁宗皇帝治理天下,已经二十一年,是他执掌四十年天下的中期,朝廷内外,英才荟萃。同时,内外矛盾,日益尖锐:其外,契丹、西夏,越来越嚣张,其内,冗官、冗兵已经压得北宋气喘吁吁,积弱积贫,已然尽显,仁宗皇帝遂想大作为于天下,以振大宋之衰微,遂下诏,令朝廷以及各级官员,上书议政。

欧阳修建议仁宗皇帝展开三项革命——

革“朝廷不慎号令”之命,再革“不明赏罚”之命,三革“不责功实”之命。并提出了改革:“兵、将、财用、御戎之策、可用之臣”的具体措施,意图大刀阔斧,改革弊政。

范仲淹主张精简官僚机构、建立严格的任官制度、鼓励农桑、整顿武备等,被皇上采纳,并受命行之,史之所谓“庆历新政”。

王禹偁,范仲淹,其革新主张,虽然都是皇帝批准了的,但是一旦涉及了既得利益者,那是包括皇家和百官在内的庞大群体,自然只有夭折。而“庆历新政”,更是昙花一现,只推行了半年多,范仲淹一千人,被攻击为“朋党”,皆被免职外调。“庆历新政”,首先就拿官吏队伍开刀,捅破了一个大马蜂窝,垂垂老矣的仁宗皇帝,不想自己给自己制造麻烦,自己吐出的口水,又自己舔回去了。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范仲淹,把一颗忠君爱民的心,掏给天下。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的一声长叹,一千多年了,依然荡气回肠。匡时济世,范仲淹们是探路者;革弊图新,范仲淹们是薪火种子。

到仁宗皇帝末年,即仁宗嘉祐五年以后,包拯、东坡之父布衣苏洵,以及王安石、苏东坡等,又掀起了北宋新一轮的革新浪潮。

总有人要走上前台。

历史不然要窒息。

(未完待续,眉山市广播电视局副局长)

从眉山东坡到蓬安相如

——在司马相如研究会 2009 年年会上的发言

金生杨

各位领导、专家：

大家上午好！今天应邓郁章副会长邀请，有幸在此就眉山东坡文化研究与建设的经验，来谈谈对司马相如研究的一些启示。

一、眉山东坡文化研究与建设的成功经验

苏轼研究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司马相如研究在很多方面是不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但眉山在打造东坡名片方面值得蓬安借鉴。

苏学似海，内涵十分丰富，成为眉山市东坡文化建设的最大资源。苏轼在文、诗、词、书法、绘画等方面都是一流的，在经学、史学、子学方面，苏氏父子也有很多很重要的成就，也可以算是二三流的。所以，对苏学的研究领域广泛、资源丰富。虽然司马相如的成就也是多方面的，但因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较东坡研究来说，就显得十分局促了。

眉山有三苏祠，乃四川乃至全国、全世界都知名的旅游景点，成为眉山苏轼研究的重要支持点与不竭动力。

眉山市政府大力打造东坡名片。眉山市委宣传部等领导组织考察团，开展了“东坡足迹万里行”活动，沿着东坡的足迹进行考察，搜集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并编印成精美的图文并茂的宣传册。“经济唱戏，文化搭台”，眉山市复建远景楼、扩建三苏祠博物馆、新建三苏纪念馆等；定期举办东坡文化节，要求全民背诵东坡作品，知东坡，懂东坡；开拓东坡民俗文化、发展东坡旅游等；将东坡诗词故事艺术化，编成能唱的歌、能表演的歌舞剧、或装饰或实用的艺术品（如竹工艺品上打造东坡故事、东坡形像）、录制东坡电视专题片等等。

苏氏宗族的大力支持。苏氏后裔遍布各地，人数众多，经常回眉山拜祭，对眉山东坡文化建

设、研究大力支持、赞助。

眉山经过大量努力，依托三苏祠，将影响于世界的苏轼研究会永久会址、常驻机构落户于眉山，并成立有独立编制的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政府资助，设置专门的研究人员独立从事苏轼研究。借助苏轼研究会及其定期举办的中国苏轼学术研讨会、编辑赠阅《苏轼研究》内刊、建设更新三苏祠博物馆网站、接待来访参拜等，大力促进东坡文化的研究与宣传。

著名苏学专家、大批苏学学者、爱好者支持、推动。以曾枣庄、张志烈为代表的川籍苏学专家极力推动眉山东坡文化研究的深入与东坡文化的开发利用，而与省外、海外大批的苏学专家学者相呼应。苏氏游历广泛，仕宦之地多，各地都有景点、爱好者，历代都有追慕者。苏轼自己晚年总结一生，也对黄州、惠州、儋州之业念念不忘。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成为苏轼研究永不衰竭的动力。

二、蓬安相如文化研究与建设的建言

下面再以眉山东坡文化研究与建设为鉴，就蓬安相如文化研究与建设谈谈个人看法。

首先，要全面深入研究，扩大研究视域。要将司马相如生活的历史背景、区域文化背景作深入的研究，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历史环境，尤其是怎样的区域文化背景造就了一代文杰司马相如。要将司马相如与汉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关系问题梳理清楚，才能深刻而准确地认识司马相如、研究司马相如。要认真清理司马相如的历史影响，作学术史的深入研究。

换种角度来说，司马相如的研究可以借鉴眉山市“东坡足迹万里行”的模式，对司马相如一生的游历作全面深入的考察。要对司马相如的作品、相关的记载、历史上的产生的影响等一切资

料作详尽的梳理，而不仅仅局限于他本人流传至今的几篇赋文。只有扩大视域，找全资料，才能更好地开拓研究领域，促进研究的深入，扩大相如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因此，包括经史子集、哲学艺术等各个方面的资料都要搜集，特别是文学艺术方面，如小说、戏剧里的司马相如或其相关内容，都要有资料的总结。单是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就涉及到无数的资料，就有无可限量的挖掘研究空间。就此而言，司马相如的研究是可以持久深入，做大做强的。

此外，就我所了解的情况而言，司马相如在哲学思想方面成就很大。古人称“文以载道”，无道不成文。司马相如之所以有那么高深的赋学造诣，首先源于他有深邃的哲学思想。扬雄就以为“长卿赋似不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而司马相如“控引天地，错综古今”，称“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表明他深究天人之际。司马相如的赋有着深厚的黄老道家思想内涵，也有着秦汉流行的方术气息。他的赋以谏为主，极尽夸张铺饰之能事，实以物极必反，望统治者由于虚乌有而回归现实。但统治者未达其意，这并非司马相如之错。司马相如又是一位易学大师，曾从临邛胡安学易，而早于文翁传教。

司马相如在小学方面也颇有成就，作有《凡将篇》，而与犍为文学、成都严遵、临邛林闾、郫县扬雄，共同传承并弘扬了巴蜀固有的小学传统。正如刚才有学者所言，在司马相如的赋作中，也存在着不少方言方面的成果，故能从其方言的使用来看其籍贯等问题。又如在巴蜀民风民俗方面，司马相如是造成巴蜀好文的重要原因之一。巴蜀文风的开启在司马相如，其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其次，蓬安的司马相如研究应当依托地方政府、企业，依托旅游、消费。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关键在于持之以恒地努力，尤其是关于司马相如文化的研究与当代化建设，使其名实相符，最终实现“实至名归”。眉山市打造东坡文化的经验证明，地方文化的建设，尤其是文化产业的建设，主要依靠地方政府、企业的努力才能实现。借鉴一下，蓬安就应当加强司马相如文化的研究与宣传，使全民知司马相如、懂司马相如，并在适当场合灵活运用相如文化。同时，要加大力度进行古城遗址、司马相如遗迹的保护、开发、

利用，考古发掘、恢复重建，乃至挖掘相关主题，新建相关景点、园区等等，拓展相如文化。此外，借鉴眉山东坡文化建设，开拓司马相如民俗，创制相关的文艺节目，摄制相关的电视专题片，研究开发相关的工艺品等等。《相如长歌》的展演与成功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单单一个司马相如爱情故事就可以开发出无数个工艺品来。

再次，要大力培育相如文化的爱好者、研究者、创作者。司马相如是一位激情四溢、卓有才华的文化家，他的文学艺术、哲学思想、爱情故事、历史影响都足以吸引众好的崇拜者、研究者、爱好者。目前司马相如研究面临一些困局，首先是前面所讲的研究领域、研究素材上没有得到极力的开拓，其次就是还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远不如东坡文化的群众基础好。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宣传，举办相关的文化活动，通过教育，大力培育相如文化的爱好者、研究者、创作者。创作是在爱好、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当今的文化建设除了继承传统文化之外，就是要大力创新。经过努力，完全可以创作出一大批的以相如为主题的文化成果出来，而实现的前提显然是要培育相如文化的爱好者、研究者。

最后，要甩开包袱，解放思想。此前的司马相如研究将重心放在了司马相如“生在蓬安，长于成都”上。这是基础，当然是必要的。经过20年的努力，这个立足点已经稳固了。因此，我们现在就应该树立起“宣传相如即宣传蓬安”的思想。试想，苏轼科考之后便离蜀外处，他的一生活活动基本都在蜀外，如果没有自信，眉山的东坡文化就不能够树立起来。正因为眉山是东坡文化的根，所以它可以立足，为世所公认。司马相如的根在蓬安，而真正对司马相如展开全面讨论与研究的也是蓬安在主导，因此要自信如此，而全面深入地开展相关的研究、创作。同时，我们还要树立“相如文化可深入到方方面面”这样的观念。相如主要是文学家，但相如的成就、相如文化不局限于此。只有从方方面面都去考虑、挖掘，相如文化才会结出硕果，而相如文化本身也可以在各个方面体现出来。

以上是本人就眉山东坡文化研究、建设来谈的有关蓬安相如文化研究、建设的一些浅见，不当之处，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西华师范大学教授）

儋州市东坡文化研究会成立

本刊讯（韩子）2010年1月8日，苏东坡诞辰973年，儋州市东坡文化研究会成立了。

儋州市政府副市长蒙晓灵到会讲话。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以及江苏徐州、常州，山东诸城、蓬莱，河南郟县，河北栾城，湖北黄冈，陕西凤翔等东坡遗址发来贺信。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张志烈等苏学专家，以及全国各地网友发来贺诗80多首。

大会选举陈茅为会长，韩国强为常务副会长。

苏东坡居儋三年，关心民生疾苦，倡导汉黎团结，敷扬文教，对儋州文化，乃至海南文化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1996年，东坡居儋遗址——东坡书院被国务院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于苏东坡的影响，东坡文化已成为海南西部旅游的品牌。

1987年12月举办纪念苏轼贬儋890周年活动、1995年7月举办中国第8次苏轼学术研讨会，为儋州东坡文化研究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儋州市东坡文化研究会的成立，将推动儋州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设，将形成东坡居儋的思想、创作和生活的研究力量，将积极开展市内、市外学术交流活动 and 宣传普及活动。

民办馆会，情聚从化

——纪念苏东坡诞辰973年活动

本刊讯（流水）2010年1月8日，由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从化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东苏氏联谊会主办，广州从化苏东坡纪念馆承办的“首届广州从化苏东坡国学论坛暨纪念苏东坡诞辰973周年”活动在广州从化温泉镇举行，80多位苏东坡后裔与苏东坡研究者共聚一堂。

上午，纪念苏东坡诞辰973年寿苏活动在从化苏东坡纪念馆举行。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副会长、四川省眉山市政协主席苏灿代表主办方讲话，广州从化苏东坡纪念馆终身馆长苏巨汉代表承办方讲话，广州苏氏联谊会会长苏醒宣读祭文，最后由与会嘉宾向苏东坡塑像敬献花篮。在活动现场，除了展示了苏东坡当年曾经用过的端砚及流放惠州时登岸踩过的石阶等文物外，还展示了国内20多位书画名家以苏东坡为主题所作的书画作品。

下午，首届“中国广州从化苏东坡国学论坛”在碧泉大酒店举行，论坛由东坡国学馆馆长苏醒主持。苏灿副会长作《论苏东坡的民本理念》主题发言后，北京大学教授、苏氏总族谱执行主编管成学先生，陕西宝鸡文理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陕西苏武文化研究会会长苏振武，世苏总会顾问苏振勋，四川眉山三苏祠博物馆馆长杨常沙，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秘书长惠启光等作了主题交流发言。

民办从化苏东坡纪念馆，以民办的方式举行如此规模的寿苏纪念活动，在全国尚属首次。